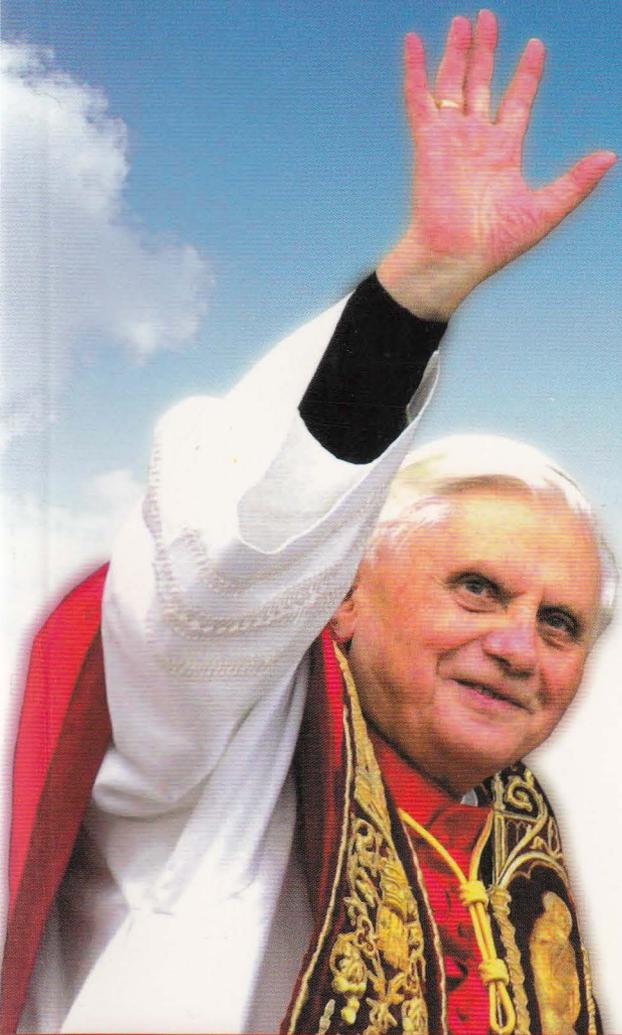


一次我問他，導向天主的路能有多少條？  
我實在不知道他怎樣回答。  
他能答說：只有一條，或能有多少條。  
他沒有讓我等很久就作答了：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條。

——Peter Seewald



# 地上的鹽

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立場與態度

拉辛格樞機 · 口述

房志榮 譯



拉辛格樞機／口述

# 地上的鹽

基督紀元第三個千年前夕  
與記者 Peter Seewald 談基督信仰與天主公教

房志榮／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Cardinal Ratzinger

*Le sel de la terre*

Le Christianisme et l'Église catholique  
au seuil du III<sup>e</sup> millénaire  
Entretiens avec Peter Seewald

Traduit par Mark Fang, S.J.

Copyright © 1997 by Flammarion/Cerf

Chinese copyright © 1998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 目錄

信理部部長拉辛格樞機致譯者	
房志榮神父的信 _____	1
中文版《地上的鹽》導言 _____	3
前 言 _____	7
天主教信仰：記號和言詞 _____	9
第一章 生活剪影 _____	37
出生和聖召 _____	37
年輕的教授 _____	52
主教和樞機 _____	71
部長和他的教宗 _____	77
撮要 _____	97
第二章 天主教會的諸多問題 _____	103
羅馬的左右為難 _____	103
教會現狀 _____	110
德國的情形 _____	130
衰退諸原因 _____	138
教會的失誤 _____	144

# 目錄

幾個批評的主調	153
1.不能舛錯的信理	154
2.噩耗代替了佳音	156
3.我們是天主的子民	159
4.神聖權威與弟兄友愛	162
5.獨身	165
6.避孕	171
7.墮胎	173
8.離婚者重婚	174
9.女性的晉秩	177
第三章 在一個新紀元門口	183
兩千年的救恩史——還沒有救贖嗎？	183
淨化、世紀交替、斷層後的諸多考驗	192
為第三千年來臨的「人文新春」	196
教會發展的一些重點	200
1.教會、國家和社會	200
2.大公主義和統一	203
3.伊斯蘭	204
4.猶太教	207
5.來一次新大公會議？	212

# 目錄

6.教會的未來——未來的教會	213
7.中道的再發現及新興教會的諸異象	218
8.「潔、潔、潔」：精神革命	224
9.拜賜教會世界的一些新機運	228
10.真正的世界歷史，時間的滿全	232

## 信理部部長拉辛格樞機 致譯者房志榮神父的信

梵蒂岡城

1998年9月16日

尊敬的房神父！

因了過去幾個月我的負荷沉重，直至目前我才能針對下一個千年裡基督信仰在中國的未來寫下幾個感想。我給予這些思想一個「導言」的形式，並希望整體上多少回應您的構思。我既非先知，只好由過去出發，從那裡吸取靈感而嘗試對未來作一投射。（以下是四頁《地上的鹽》中文版導言）

衷心問好並祝禱天福！

您的

+若瑟樞機拉辛格

## 中文版《地上的鹽》導言

誰以基督徒胸懷想到中國，一段悲慘的歷史難以抗拒地會映入腦際；方濟·沙威在上川島上等著一個信徒，把他帶到中國去，好能在那裡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如同不久以前在印度和日本作過的一樣。這一位大聖人的多方長途跋涉，像是萬民使徒保祿傳教旅程的翻版。保祿的傳教之旅建立了地中海一帶——即未來的歐洲——的異邦人教會，將之投入亞洲世界的脈絡裡，這樣終於完成了基督交託的使命；把祂的訊息傳至天涯海角。這裡凸出一個不尋常的對照。保祿在其小亞細亞的行程中常遇到新的阻礙，給他指出，這條路或那條路不是聖神所選的路段。謎底在夢中解開；他看見一個馬其頓人，向他喊說：到這裡來援助我們！方濟·沙威深信，在他內心也很逼真的聽到中國的聲音，喊著要聽福音。可惜他的「馬其頓人」，那個要為他開啓中國大門的人，始終未到，而方濟在未能完成任務的悲哀中去世。中國的時刻顯然還沒有到。

其間基督的喜訊已多番觸及這個碩大的民族：聶斯多利（景教）教士第七世紀曾深入中國；方濟會士於十三世紀再度來到中國，甚至建立起北京總教區。但這兩次都未能使福音長久扎根。步武方濟·沙威的後塵，耶穌會士們再度向中國挺進，一瞬間好像亞洲的智慧要與基督信仰攜手互助，而中國可說由上而下，透過該國的智者，會被引向基督王國。但這一希望落空了，也許不只因了禮儀之爭，也許因為手法太大膽，以致未能達到凡夫俗子的心，而信仰之為物最後還是在於簡樸。十九世紀的宣教因與歐洲大國的強權政治掛鉤而受累。從此基

督信仰正式被視為一件歐洲的事，傳教顯示為歐洲殖民主義的一部分，其企圖是要全世界接受歐洲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然而傳教士們的犧牲精神確實深具說服力，結果雖然不會有過大規模的中國歸主運動，教會卻靜悄悄地在成長：許多殉道者的作證指明，基督的喜訊如何深深觸及人心。

當基督信仰及由之而來的教會在輕聲地茁壯時，於十九世紀中葉突入的歐洲文化或歐洲的粗野，卻給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帶來日益增長的危機，終於在政治結構的危機上具體地表達出來。其時發生一件惹人注意的事：歐洲的自由文化固然震撼了中國的宗教和道德傳統，但其本身未能給予任何答案。日本曾經按照自由異議的模式漸漸使自己改頭換面，中國卻未能憑這些前提重新塑造自己。另一個歐洲「產品」：馬克思主義，似乎要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各種自由派的嘗試，及慢慢長大的基督信仰同時予以肅清。在毛澤東的言和行裡，馬克思主義好像成了中國貨。毛給予尋找人生較好秩序的問題以清楚而強硬的答覆。他自封是科學的代表，而建起一個支配生命全部領域的國家與社會秩序。中國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路，並成了應用社會主義的模範國。同時教會顯得「過時了」：教會好似是屬於過去時期的。中國在其歷史的路上可以說已跳過了這一時期。

這其間馬克思體系的自我矛盾使表面的科學準確無誤全然解體。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揭露了烏托邦許諾的無政府和毀滅性的面孔。另一方面經濟的內在需求跳出了國家的全面控制，並要求重新與自由方案對話。在這一次新的醞釀過程中宗教會扮演一份角色嗎？或者只是一些經濟的法制在塑造著這個世界，像極端的自由主義想說服我們的那樣？這一自由主義其實跟馬

克思主義一樣也是唯物主義，雖然採用另一種方式。基督信仰在中國還有希望嗎？中國本身有一個希望嗎？

一個留心的觀察者會越來越清楚地看清：人不只靠餅生活。經濟不是一切。馬克思學說的極權主義所以失敗，正是因為它不肯承認宗教的不可替代性：人常追求無限，任何純物質的解決不能令人滿足。馬克思學說的第二和第三代理論家完全承認，一天有人在，一天宗教不會停止。問題只是：基督信仰會是一個長存永駐的答案，並且在中國不僅能為少數人所了解，所生活，還能成為塑造整個中國的一股力量？將會出現一個亞洲的、中國的基督宗教，就像它由猶太人走向異邦人後出現了一個希臘和拉丁的基督宗教，就像古代之末出現了一個德國的和斯拉夫的，一個歐洲的基督宗教，後者較晚也塑造了美洲大陸？

誰信基督，會深深相信，基督宗教的確有此潛能，並深信在世界社會自我建立中，它會達到其使命的一個新階段。它有一股內在力量，給予個別文化的精神向度一個新形式和生存能力。只須回想一下古代結束時地中海一帶所發生的事，就不難發現，那些古教和古文化的遺產不是靠哲學家 and 皇帝們所從事的革新努力得以存活下來，而是在基督信仰裡接受了新形態，才得以成為持久的遺產。基督宗教不會把中國豐富的遺產挪到一邊，卻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危機之後，會反過來成為一股力量，讓這遺產活下去，並繼續開花結果。在各種轉變的過程中，基督宗教所提供的不是破壞和斷層，而是繼續前進的生命力。當然不該把基督宗教的這一新機運想像為一種行軍的速戰速決。快速奪取的也會快速地消逝——這一點可在毛澤東所創

建的世界相對的短命存活上顯示出來。不必著急，持久的東西長的慢，輕微、有耐力，甚至在多種的煎熬之下。中國教會的這一緩慢成長，它的這個芥菜子形態，正好對稱爲「那棵大樹」，天上的飛鳥會在這棵樹上築巢。

當方濟·沙威無奈地敲中國的大門時，基督信仰的時刻爲中國尙未到。但所有的輕聲腳步，那些使信仰在神州大地慢慢前進的腳步，並不徒然，而是緩慢成熟之路上的階段。爲何這樣緩慢？爲何如此延遲？天主知道。爲我們來說，第四世紀米蘭的主教聖安博所給的答覆有助於繼續思考下去。當時地中海一帶的人也曾問過：如果基督信仰確是天主拯救世界的真正工具，爲什麼它到的這樣晚呢？安博答說：「誰這樣埋怨，也該埋怨收穫的時期：莊稼成熟的這樣晚。他們該埋怨葡萄的收成，要到年終才成熟；他們該抱怨橄欖樹，是最晚結果實的」（書信十八）。第「十一小時的工人」並不比第一小時的工人有更微小的使命。收穫是按照果樹的性質整年攤開的；先是草莓和櫻桃，後有穀物，然後有葡萄，最後年終才有橄欖。後者因此就不那麼重要？不那麼珍貴？同樣天主的收穫也有它的潮汐和道路，在這些路上成熟的整個歷史常是收穫的一部分。在此意義下我們基督徒會忍耐地等待——欣喜地意識到，最珍貴的果實、葡萄和橄欖，來的最晚，而正因此把一年的全部禮物，連同它的潮汐、太陽和雨露、黑暗和光明，都匯集於自身了。

羅馬，於 1998 年舉揚十字架慶日（9 月 14 日）

若瑟樞機拉辛格

## 前 言

一個羅馬的冬天。聖伯鐸廣場的行人穿著外氅，撐著雨傘，你來我往，穿梭而過。咖啡室裡有人喝茶，我則到羅馬公墓(Campo Santo)上墳，那裡連貓也寒瑟逃竄。

週六樞機照常上班，我們打算即刻出城，到 Frascati 附近的一座前耶穌會別墅(Villa Cavaletti)去。司機已在人行道上等著，他的賓士汽車是幾年前信理部在德國某一機遇買下的。我帶著一個很大的行李，像要周遊世界似的。門終於開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滿頭銀髮，外表脆弱，邁著小步走出來了。他身著黑衣，帶著羅馬領，提著一個簡樸的小箱子。

我離開教會已很久了，理由多得很。從前，只要你在宗教建築裡坐下，馬上就會被積累數世紀的熱心話灌耳而入。現在可不同了，斬釘截鐵的意見已在動搖，一切傳統都像幾千年的老人，了無生機。有人認為宗教應就合人的需要，另一些人則想，基督宗教已過時了，已與我們的時代不合，失去了操作的效用。離開教會不是一件小事，要想回來，那更不簡單。天主真的存在嗎？真天主的話，我們還需要教會嗎？教會應該像個什麼樣子——如何能再度發現它的面貌？

樞機沒有打聽我的過去，也沒有問我的現況。他沒有要求把我的問題預先給他，以後也沒有要作任何增刪。晤談的氣氛是緊湊而嚴肅的，但有時這位「教會親王」顯得輕鬆有趣，將一隻腳擱在沙發墊上，簡直像一個讀書學生。他中斷了一次，退下深思，或許是求聖神給他啓發適當的言詞吧？我不知道。

拉辛格樞機特別在其故鄉被視為教會的戰士及爭議性人

物。無論如何，很多他早期曝光的分析和評估日後果然成真，多次連細節也幾乎不漏。這位出身巴伐里亞鄉村，家世簡樸，聰明絕頂的人，對教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所受的損失，所演的悲劇，其痛心疾首，是少數基督徒能與之比擬的。

一次我問他，導向天主的路有多少條？我實在不知道他怎樣回答。他能答說：只有一條，或能有多條。他沒有讓我等很久就作答了：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條。

**Peter Seewald**

慕尼黑，1996年8月15日

## 天主教信仰：記號和言詞

樞機大人，聽說教宗有點怕你。有人說，他曾問過：天哪，關於這點，不知拉辛格樞機要說什麼？

（拉辛格，開心的樣子）也許他要幽我一默吧。但他一定不怕我！

你見教宗時，有特別的禮節嗎？

沒有。

你們先祈禱嗎？

沒有，我得坦白承認，有點可惜，我們並不先祈禱，而是同時在桌旁坐下。

進去時握手嗎？

是的。我先等，然後教宗進來，我們握手，靠桌坐下。接著是一小段個人的談話，還碰不到什麼神學問題。一般情形，我先提出一些請求，教宗提出他的問題，然後兩人重新對談。

你們表達的夠具體嗎？

那要看討論的題材。有時他很想知道的是我們說什麼。比方，該如何接受英國教會成員（回歸）天主教。為實行此點，必須找出一些法律形式。這一方面，他很少干預，他只說：「你們要心胸大方。」但到底要怎樣進行，他就不太管了。另

一些題材卻使他極感興趣：一切與倫理有關的事，諸如生命倫理、社會倫理，整個哲學領域，一切與哲學有關的問題。此外，有關教理及信仰道理的整個領域，都是他本人非常關心的事，這一方面，我們的交談真是很豐富的。

在此情形，你穿什麼服裝？

黑長袍，按照傳統，見教宗須穿長袍。

教宗呢？

他穿白長袍。

你們用什麼語言交談？

我們用德文。

不用拉丁文？

不。

有一位胡得派基督教團體的虔誠訪客曾稱你「若瑟弟兄」。你感到不恰當或不尊敬嗎？按照教會的習慣，樞機應被稱為「可敬者」(Eminence)呀！

沒有，我覺得「若瑟弟兄」很美。這不是我們說話的樣子，但我們現在正在大談使基督徒合一的弟兄情誼——1960年我曾寫過一本小書，談基督徒的弟兄關係——可見，這正好碰到多年以來我嘗試著反省的一個主題。

樞機該應付的是一些較高的要求，我是說，比對一位神父或一位總主教期待的更高？

樞機也是信徒，神父和主教，是在教會內負有責任的人，讓福音傳開，各種聖事得以慶祝。坦白的說，我不贊成用較高、更高一類的字眼，而寧願說：樞機該應付的是一些非常特殊的要求。堂區神父，或鄉間本堂也有沉重的負擔。他該了解堂區的信眾，在各種情況中陪伴他們：在生病中、苦中、樂中、紅白喜事中，總之，在一切危機和喜慶中。他該努力與信眾一同相信，使教會這隻船順利地航行。

每天要跟天主打交道不是很勞累嗎？最後不會感到疲倦麼足嗎？

跟天主來往為我是一個需求。就像我們每天需要呼吸，需有陽光，需要吃飯一樣。我們每天也需要友誼，需要跟某些人物交往，同樣跟天主來往是支持生命絕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假設天主忽然不在了，我的靈魂真不能再呼吸了。可見跟天主來往不會生厭。厭倦的發生可能來自某些熱心神工，或某些熱心誦讀，但與天主來往本身不會令人生厭的。

為天主和為教會操勞不見得會自動地使你在各方面變得更正直、更溫和、更有智慧、更有信仰……

可惜這倒是真的。研讀神學不會自然地使人變得更好。神學課程能有些貢獻，如果不僅對理論感興趣，而也嘗試對人對世界在整體上有更好的了解，並且隨即構成一種生活方式。可

是神學本身是理性操作，特別當人以科學的嚴謹認真讀神學時。神學能影響我們做人的方式，但並不一定能使人本身變得更好。

**耶穌能有些要求連樞機也答覆不了嗎？**

一定是有的，因為樞機跟別人一樣地軟弱，而他所佔的地位，伴隨著許多責任，也許給他帶來更大的困難。就說天主十誡吧，是綜合在最大的誡命，即愛的誡命中。樞機就無法完全守好這些誡命，因為愛是不容易的，要想愛主、愛人，並且愛的像天主聖言所要求的那樣，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關於這一點毫無疑問，歷史也充分地證明，有些樞機在這方面能脆弱到什麼程度。

**所以真愛人有時為一位樞機也不容易。**

不論怎樣，你一定知道，愛人不能籠統地去愛。很自然地，有些人令人反感，跟他們來往會感到很困難。有時也會懷疑真是「人之初性本善」嗎？或者要問，造物主是否大意了些，使得這個受造物現在變得越來越危險，不值得再去愛他？正是在這時刻應該轉過來說：有些人我不認識，因此我不該對他們下判斷。另一些人，我應該讓他們按照他們的樣子處世為人。至於我認識的那些好人卻不斷給我確定一件事，就是造物主很清楚他所作的是什麼。

**你辦告解嗎？你有一位聽告解司鐸嗎？**

是的。我想這為大家都是需要的。

樞機也能作錯事嗎？

有時發覺是有過錯的。

你有時也會像別人一樣，感覺被拋棄、被超過或感到孤獨？

是的。正是在我目前的地位上，我的力量遠遠達不到我應該作的程度，差的很遠。人越老，越體驗到自己的精力連為完成最重要的功課都不夠。已太弱了，已無助了，或已達不到許多情況的高度。這時只好向天主說：現在祢該幫我的忙了，我已支持不了。孤獨也是有的。不過我仍得說一聲：感謝天主，祂在我的路程上安排了那麼多好人，使我從來不致感到我是孤獨一人。

1981年以來，你是教廷信理聖部的部長。這不僅是梵蒂岡最老的一個部，也是多世紀以來以「考察聖部」為名的最可怕的一個部。你的工作在於維護公教信仰的純真，保護教會免於各種異端，有時也該責斥信仰上的缺失。難道這一聖部所表達的意見自動代表教會在道理方面的立場嗎？

當然不。我從來不敢把自己關於基督信仰的神學概念當做信理部的決定。我盡力站在幕後，把自己看作一個很大工作團體的協調人(moderator)。

我們可以說是以大圓圈的方式工作。首先我們跟全世界的

神學家通訊，讓他們給我們出主意。然後跟主教們及他們的服務圈接觸。此外，還有羅馬的神學家、神學委員會、聖經學委員會，跟所謂的諮議會。最後有樞機們組成的會議。只有透過這些大圈子，才能把要作的決議案逐步形成。

在樞機會議裡，諮議們關於重點沒有完全同意時，我們從來不作任何決議。因為我們說：假使在有權威的神學家中，關於道理的某些點，還有很清楚的不同意見，我們就還沒有一道更高的光，來聲明某一意見是可取的。只有大多數同意，即這一諮詢團基本上有共識時，我們才作成決議。

但是有些觀點你也可以發表你個人的意見。

當然。我教了很多年的書，現在我還用不同的方式盡力追蹤神學討論。我自然也有我自己關於神學結構的看法，也在個人的出版品裡表達出來。

有可能到了某一天拉辛格樞機會被迫自相矛盾嗎？就是說，一方面關於某一問題你說出個人意見，但以後你以部長身分又不能予以支持？

我想，過一段時間常有可能作一些修正。在討論中我會發現有些事我從前沒有看到。反過來，我不能否定我今天有的一個信念，就是用目前我能用的方法所獲得的一個信念，這是不能否定的。無論如何，繼續研讀能獲得進展，修訂從前的一個意見常是可能的。

你的許多忠告和聲明好像並沒有什麼效果。無論怎樣，

你沒有對準時代的逆流引發一場大的運動，或給思潮的取向一個明顯的轉變。不錯，你會自我寬慰，心想是天主循著神秘的路徑在領導著教會。但是眼看著辯論在原地踏步，論戰的水平一直在下降，不是令人喪氣嗎？同時甚至有人說，連信仰的內容也在下降了，而面對任何問題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有增無減。

我從未想像過我可以使歷史轉向。既然主耶穌以十字架為結局，我們就可看出天主的路不是很快指向可見到的成功的。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耶穌的門徒也向他提過好多問題：到底怎麼啦？為什麼毫無進展呀？那時他就用芥菜子，用酵母及其他比喻給他們作答，而給他們說，數字統計不是天主用來作評估的尺寸。不管怎樣，芥菜子及酵母所引發的效應是重要而有決定性的，雖然人一時無法加以證實。

準此，我深信必須避免以量衡量成就。我們不是一家貿易公司，可以靠數字作聲明：如今我們用了一個有效政策，可以越賣越多。我們完成一項服務而最後把它放在天主手裡。另一方面，也不能說，一切都是撲空。今天也見得到信仰的覺醒，特別是在世界各地的青年當中。

也許我們應該放下「教會聚合各民族」的圖像，因為很可能我們已踏入教會歷史的一個新階段，其組合跟過去完全不同：基督信仰無寧是在芥菜子的記號下生存，一個個小團體好像無關緊要，但卻活的嚴謹，與惡勢力搏鬥，在世上播下善種，向天主開放心扉。我發現這類運動確實不少，個別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當然不會有大批的回歸，不會有歷史典範的大

轉折，也不會來一個向後轉。但是信仰的臨現是有的，並且現的遒勁有力，它重新振作人心，給人活力和喜樂，這種信仰的臨在給世界帶來了意義。

儘管如此，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問：教會這艘船到底開不開，還值得上船嗎？

我深深相信是會開的。這艘船的確經過很多滄桑，但仍舊年輕。對這個時代所能作的診斷更使我們看清這艘船是需要的。只須設想一下：一旦這一時代的勢均力敵平衡消失，會發生怎樣的坍塌，和精神力量的下墜。

同樣可以發覺，教會及基督信仰，在最後這三、四十年的下坡路，對人們的心理失衡，方向迷亂，及我們所見到的倫理敗壞也負有一份責任。在這種權衡下，我敢說，即便這艘船不存在，也該發明一艘。它解答了人的很深需要，它停泊在人的所是，人的所需及人所該是的船塢上，以至於人既不會失去他的基本能力——我相信如此，人也就是一個保證，這艘船不會沉沒。

時下不容易想像，一種按照天主教信仰的生活，在可見的未來能被視為非常現代化的；即便從各方面看來，這種生活方式的確是一較好的選擇，最富自我意識，也是今天所能設想的最徹底方式。

人們總以為教會是一個老而僵化的系統，一直把自己關在不透水的船艙裡，日益僵硬，並在外面築起一道護堤，壓迫著

自己的生命。這是很多人的印象。反之，看到教會另一面的人不多，就是承認這裡可以遇到清爽、果敢、大方，和逃過單調生活習氣的方法。反而是那些把現代經驗活到盡頭的人倒看出這一點。

很明顯的，教會真是什麼，教會該是什麼，人們已失去概念了。這一信仰的各種記號和言詞的真實意義像是被一層濃霧所遮蓋。以佛教為例，誰也不敢設想，沒有教導和努力，可以輕易了解這一思想。

的確應該意識到，並該大覺大悟，我們已不再認識基督信仰了。比方在一座聖堂裡，多少畫面已不給我們說什麼；連它們代表什麼也不知道。為中年一代尚算熟悉的一些概念，如聖體龕等也成了奇怪的名詞。但是大家還認為他們知道基督宗教是什麼，現在要去找別的東西。

對基督信仰須生出一種新的好奇，希望真實知道她到底有什麼（葫蘆裡裝了什麼藥）。為使福音得以宣報，當務之急是教人擺脫磨損了的無聊感，老而脫落的舊知識，讓人對福音的富藏感到好奇，並教人們學習別把這富藏看成一些系統組織的擔子，卻以之為生命的瑰寶，非常值得加以認識。

我想用幾個字一下切入這個重要問題：天主教教會的「公」究竟何指？是一個特殊的系統嗎？是一種處理世界及其他事物的特殊方法嗎？在你的大作中我曾讀到下面一段話：「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個天主的受造物，所以一律平等，大家都以弟兄姐妹之誼相連，彼此互有責

任，都被召叫愛其近人，無論這人是誰。」這些話才是真正大公的嗎？

我希望是的。信天主是我們的造物主是天主公教的中心信仰。由此流出人人有人性，人的尊嚴均等的信仰。

要想把公教會的生活結構用一個格式撮要說出，我頗懷疑其可能。可以嘗試將其基本因素予以說明，但這裡要求的不只是一個純粹的認識，像認識一個政黨的黨綱一樣，還在於進入一個生命的結構，這涵蓋我們全部生命的方針。所以我想專靠話是說不出的，該是一種生活方式：如何進入這生命中，如何交換思想與理解的方式，那時便會發生互惠作用。

有些要點自然可以勾出：首先是信天主，甚至相信只有一個天主，祂認得人，與人交往，祂是可親近的，祂透過基督與人接近，跟我們一起創造歷史。最後祂變得如此具體，以致祂親自建立了一個團體。

不過我還得說，這一切只有當人走上路時，才會領悟。思想與生活是分不開的，不然的話，我想是不會了解公教會的。

要用公式說出這一切顯然是行不通的，但至少可以把那屬於信仰本質的精華說出來嗎？

以下諸項與信仰有關：我們信基督為生活天主之子，取了人體而成為人；我們信天主三位一體，天地的創造者；我們信這天主如此謙卑自下，能變得如此微小，以致關懷眾人，與人共創歷史，而接受這一歷史的容器、卓越表達此一歷史的地方便是教會。然而教會不是一個純粹人的機構——雖然不能否認

教會內有許多人性特點——而是信仰要求人跟教會在一起，並在教會內，聖經得以共同消化吸收，並予以生活化。

瑪竇福音說，「像這個小孩子那樣小的，在天國裡才是最大的。」（瑪十八4）

「誰弱小」的神學是基督信仰的一個基本範疇。我們信仰的出發點在於：天主的特別偉大正是在不用權力上啓示出來。這一信仰的首要原則是，長久下來，歷史的力量正是在「會愛的」人身上發揮出來，也就是說，這股力量是不能以權力的範疇來衡量的。天主爲現出祂是誰，故意在納匝肋和哥耳哥達的無能爲力中啓示了自己。因此，最大的不是那最具摧毀力的一一人間還是以毀滅的潛力爲最高權力的證據——，而完全相反，連那最小的愛的力量也比那最大的摧毀力更大。

你曾說過，基督信仰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事件。

這一點的確很重要。連爲基督自己，重要的不是祂曾散播了一些意念——這一點祂當然也作過——，爲作一名基督徒，重要的是相信天主曾進入這世界，祂曾有所行動，因此是一個行動，是一個事實，不僅是一群意念。

做爲一個公教徒最令你神往的是什麼？

使人神往的是，我們參加的是一個偉大而生活的歷史，只以純人性觀點來看，這已是很了不起的一點了。一個渾身軟弱、失誤連連的機構還能繼續生存，而我參入這個大團體的生命流確能知悉是在與所有的生者死者共融；在這團體中我對自

已生命的重點確能把握——這天主是面向我的——，這確定成了我生命的基礎，有此或生或死都可安然無憂了。

耶穌基督和跟祂一起的教會機構本身不是一個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的奧秘嗎？正如美國人所說的：「取捨聽便」(take it or leave it)嗎？

對呀，一定要有取捨的。但這裡的取捨可與我接受或拒絕一杯咖啡不同啊。這一決定要深奧的多，它會牽涉到生命的全部及我本身的最深層次。如果我把生命建立在無天主或反天主上，這是我可以做到的，跟我把生命建立在天主身上，其所呈現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這一決定概括我自身存在的整個方向：我對世界的看法，我企望自己是什麼，成為什麼。這不是我面對許多可能性的市場時任意作的一個膚淺決定，而相反，是生命的整個方針問題。

很多人在宗教裡首先看到的是一種精神支架，一種好機運，一個支援機構，弱勢和無知的人加入，是為了與自己、與世界達成協和。就如心理分析家榮格曾說：「各種宗教都是不折不扣的心理治療系統。教會有一些很有力的圖像可以把全部心理問題表達出來。」這就夠了嗎？這就是信仰嗎？

榮格所說，及以後德威曼(Drewermann)所重說的有一點是正確的，就是宗教本身有治療的力量，宗教能給人的憂慮及原始怕懼一些解答，並幫助人去克服。不過，如果把宗教只看做

一種心理治療的法術，或將之縮減為透過圖像尋求治療的門路，那時宗教就會不靈了。因為結帳到最後，發現這些圖形是假的，沒有治癒的能力。

可以確定的是，宗教有一個附帶的特點（治療），但這不是宗教的本質。何以見得？有一事實說明，宗教包含的更多：在人類生存的各時期中，心理治療的想法尚不存在時，卻無法阻止人舉心嚮往並永恒嚮往一個與人完全不同的存在，並且嘗試著跟他建立關係。

宗教的精髓在於人跳過自己，與信仰所稱的天主這個未知數之間的關係，也在於人有能耐超越一切可捉摸的，可衡量的東西之上而進入這個原始的關係。人就是在許多關係中生活，這些基本的關係——與父母、兄弟、姊妹等，調整的恰當，他的生活就美好，因為這些基本關係來自他最深的人性。但一切關係中的首要關係，即與天主的關係，如果調節不良，其他的任何關係也不會好。這個與天主的關係本身可以說就是宗教的特有內容。

所有我們認識的大文化都曾經或仍然以宗教為主要的共同因素。它們中好像存在著一種由各項道理相諧而成的交響曲，比如要求節制，防止自我中心和獨立自主。為什麼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平等呢？為什麼基督徒的天主要比印度人的神更好呢？又為什麼只有一個宗教能使我們得救？

這種說法出自啓蒙時代對各宗教歷史的研讀，但更早業已

浮現，而今天在仔細觀察各宗教本身後已不攻自破，因為準確地去看，宗教就不是平等的，它們間高低不齊，有些宗教明顯，是不健全的，可以對人起破壞作用（對人造成傷害）。

馬克斯對宗教的批評在某一程度上是對的，就是有些宗教和宗教行徑使人疏離。以非洲為例，那裡對多神的迷信為地方發展是一大障礙，難以建立現代化的經濟結構。如果我要到處對神有所防衛，讓一種非理性的怕懼掌握了我生命的全部情操，那時本該是最深自我處的那個宗教性便不得好好地活出來。在印度宗教的宇宙裡（印度教一詞 *Hinduism* 是一種錯誤的稱呼，它包括很多宗教）我們也看的出很不同的形式：有的很高尚純潔，呈現愛的特徵，但另有一些卻很殘酷，帶有致人於死地的禮典。

我們知道殺人祭神在一部分宗教史裡留下了可怕的痕跡；也知道政治宗教成了毀滅和壓迫的工具；連在基督宗教本身我們熟悉一些不正常現象。把巫士放在柴堆上燒的刑罰是日耳曼習俗的死灰復燃。中世紀初的福傳工作煞費周章地將它廢棄了，以後信仰變弱，中世紀末那個習俗便又復甦過來。總而言之，連神也是不平等的，有些神明的形象十分消極，如希臘的眾神明或印度教的一些神。在宗教史這一鐵的事實前，一切宗教皆平等實是不攻自破的想法。

能否設想有人在基督信仰之外藉其他信仰得救呢？

這是另一回事。一個人得到自己宗教訓誨的幫助而成爲更純全的人，或用一般的說法，他因這些訓誨中悅天主而獲得救恩，這確是可能的。不但可能，並且這現象一定很普遍。不過

由此事實引申論說，各宗教本身形成一個聚會，像一大場大音樂會，一個大交響曲，最後各宗教意義都相同，不分彼此，那就不對了。

有時候宗教反使人更不易做好人，連在基督宗教裡這也能發生，假如它採取錯誤的形式，小格局等。因此宗教的淨化在宗教史及各種信仰的宇宙裡常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以免宗教變成與天主親密交往的障礙，卻讓宗教有效地把人納入正軌。

我敢說，基督宗教，由基督的形象出發，所以能在宗教史裡證驗為唯一的真宗教，因為在基督身上，透過天主聖言，出現了真正的淨化力量。這股力量不一定常在基督徒身上活出來，但它為各種不可少的淨化立了標準，指出了方向，使得宗教不變成一個施壓和疏離的系統，卻真是一條坦途，把人引向天主，引向自己。

有很多人確實認為天主教信仰對世界有一個悲觀的看法。

在法國大革命中出現一種意識形態：基督信仰，因為相信世界有個終結，有一審判等，所以它本質就是悲觀的；相反，現代時期，因發現了歷史的規律是進步，本質是樂觀的。近來，我們看到這些對立都慢慢消逝了。我們見到現代時期的自信自恃顯然在下降，因為大家越來越看清楚，人的進步，也是可有諸多破壞的進步，人的道德倫理高度趕不上他的理智，而他的知識成了破壞性的知識。的確，基督信仰不認為歷史一定不斷進步，也不認為人類在本質上一直在改善。

當我們讀聖經默示錄時，就可看到人類是在兜圈子。常有一些可怖的事重現，然後消失，但又有另一些接踵而來。默示

錄也不預言，人憑自己在歷史裡建起救恩來。以為人的條件一定該變得更好，這種概念在基督信仰裡並不存在，但基督信仰含有一個確切信念，天主決不會讓人類沉淪下去，其結果是，人類最後不會一敗塗地，雖然今天有不少人認為，更好是人類沒有出現。

可見樂觀和悲觀的說法在此並不適用。基督徒，像所有有理性的人一樣，都能體驗到，有時歷史穿越重大危機，而我們今天也許正要承受其中之一。也可體認到，沒有一個內在的自動機械運作使歷史朝著積極方向發展，因此各方的威脅是很真實的。基督徒保持著最後一個樂觀的信念：世界是在天主手裡，因此即便像奧斯維茨那樣令人憎惡的殘暴，那些該使我們神魂顛倒的悲劇，也逃不出一個事實，就是天主比惡更強。

### 十字架——好可怕的象徵？

在某種意義下，十字架自然含有一種內在的恐怖，我們不該把它取消。它是古代所認識的最殘酷的執刑方式，不許用在羅馬公民身上，否則就使羅馬的榮譽受污。眼見人間最純潔的人，並且祂不僅是一個人，以如此殘酷的方式被執刑，首先會令我們對自己心生畏懼。不過我們也有必要畏懼我們自己，畏懼我們那種得意忘形的樣子。在此，我想路德說過一句正確的話：人首先該畏懼自己，才能繼續走上好的路線。

但是不要停留在畏懼上，而只是以之為出發點，因為由十字架高處向我們垂視的不是一個墮落的人、失望的人、人類可怖犧牲品中的一個，這位被釘者給我們的啓示，跟 **Spartacus**（公元前 73 - 71 年羅馬奴隸反叛較成功的一人，但終歸失

敗——譯者）及其失敗的黨羽所說的不一樣。現在由十字架上注視我們的，是一個讓生命由畏懼深處重生的慈善。注視我們的是天主自身的慈善，祂把自己賜給我們，交在我們手裡，並且跟我們一起背負歷史的恐懼。更深一點，這記號（十字架）揭發了人危險特質及其可憎的全貌，而同時也使我們看出天主更強，天主在其軟弱中更強，而我們是天主所愛的。這是一個寬恕的記號，連在歷史的深淵它也置放了希望。

今天多次有人問，怎麼在奧斯維茨之後還能談天主，還能做神學。我敢說，十字架幾乎已預料了奧斯維茨的恐怖。天主被釘了，且告訴我們，這個好像十分軟弱的天主正是以不可理解的方式實施寬恕的天主，祂好像不在，其實更強。

關於人和天主的真理往往顯得愁苦沉重。信仰只是為強者的嗎？多次人們也把信仰看成一個巨大的苛求。這樣如何能產生喜樂呢？

我倒把它說成另一個樣子：是信仰帶來喜樂。一旦沒有了天主，世界會荒蕪，一切都成煩惱，沒有一事能使人滿足。今天擺在眼前的，是一個沒有天主在日益消耗殆盡的世界，毫無喜樂可言。大喜大樂來自大愛，這是信仰的基本宣示。你是一個決無反悔的被愛者。這正是基督信仰首先是在弱者間及在受苦的人之間廣傳的原因。

當然，這一切也可予以馬克斯式的解釋：這種人只求安慰不要革命。但是我相信，在一定的意義下，我們已勝過了這類格式。基督信仰終於改變了主奴之間的關係，以致聖保祿能對一個主人說：不要虐待你的奴隸了，因為他已成了你的弟兄。

這樣我們能說，基督信仰的基本因素是喜樂。不是指庸俗娛樂的喜樂，在其背後能隱藏著一種失望，因為大家知道消遣每每掩蓋著失望。我所說的是真正的喜樂，一種在生活困難中仍然存在的喜樂，它使生命富有朝氣。按照福音的記載，耶穌基督的歷史是這樣開始的：一位天使給瑪利亞說：歡樂吧！耶穌誕生的那一夜，一群天使說：我給你們報告一個大喜訊。耶穌所傳的是佳音。可見，在基督信仰的核心常有這些字句：我給你報告大喜訊，天主在此，祂愛你們，這是永不會變的。

然而大部時間，不信總是好像比相信容易。這真是個吊詭：一方面，原則上信仰是不會消失的，人本是個宗教存有，另一方面，又須不斷為保持信仰而奮鬥。

說不信容易是相對的。所謂容易是指：解除信仰的束縛不難，也不難說：我不要這些麻煩了，這擔子為我沉重，我要把它放下。這種不信的第一個決定容易作出，但要如此活下去，可就沒有那麼簡單。沒有信仰活著首先就會迷失在虛無主義中，不久又要去找支柱。一個無信的生活是很複雜的。把沙特、卡繆等的無信哲學審視一下，就會昭然若揭。

信仰的行為在起點及在須接受時，也能是複雜的，但當信仰真碰到我時——「你可以高興」，也有它內在的十分輕鬆的一面。因此不該片面地強調困難的一面。不信的容易和信仰的困難是在不同的層面上。不信也有它的重擔，依我的見解，有更大的負擔。反之，信仰倒能使人輕快，這在教會的教父身上，特別是那些隱修士的神學上看得清楚，他們說：信要說的是，我們變得像天使一樣。我們可以飛，因為我們已不再有重

量。做一個信者就是做一個輕飄飄的人，已擺脫令我們下墜的重量，而能在信仰中翱翔飛躍。

### 一個好天主教徒和其他人有何區別？

天主教徒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樣是人，其中善善惡惡所有的等級都有，就像反過來，在所有的宗教裡都有些光明磊落的人，他們透過他們的「神話」（道理、傳說等——譯者）以某種方式觸及那大奧秘，並且找到做人的適當風格。我想。不該由「好人在哪裡」開始計較，而仍敢肯定地說：一個人真實地、忍耐地活出他的信仰，讓這信仰塑造他，一定會透過他的諸多失敗與軟弱得到淨化，而成爲好人。

### 天主教徒比別人更幸福嗎？

幸福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範疇。只須想想山中聖訓，即一般所說的真福八端。主耶穌好像開設了一座幸福的學校，祂向人類推銷的信仰宛如一種幸福的秘訣：「我給你們指點途徑。」但當我們再讀一遍時這座幸福學校又和一般人慣用的這詞所要代表的內容發生矛盾。

我們說某人幸福，是因他擁有足夠的財產，有各種資源來過一個舒適的生活。或者一個人心平氣和，一生所爲都很成功。但現在祂說：受苦的人是有福的，這就表示祂的幸福之道是吊詭性的，跟我們平常所懂的不同。祂所說的幸福不含享受、舒適，而真能讓人了解悔改是什麼：必須放棄慣用的標準——「幸福就是有錢、有財、有勢」。把這些東西當標準，一定會走入歧途。許給天主教徒的不是「外在的」福氣，而是

由與主共融而生的深刻的安全。在基督徒的生命裡，天主是幸福的最後一道光芒，這一事實就在此時實現。

但是天主在哪裡，何處可以找到祂？祂躲在哪裡？無論如何，說天主啟示自己得非常、非常的少，不過分。人們很失望，因為他們想天主不跟他們說話。祂毫無動靜，祂不發射電波訊號。

天主並不大聲說話，祂不一定要用大自然的災禍當做媒體——雖然天災也能成爲警告我們的方式；天主雖不大聲說話，但祂不停地在說話。當然，收聽者必須用發射者同樣的波長。而我們生活和思想的習慣方式有太多的寄生蟲干擾發射，使我們聽不到聲音。我們如此漠不關心，簡直辨認不出祂的聲音。但我還是要說，任何人，只要稍微留心一點，必能得到這個經驗，親自聽出來：現在祂是向我說話，這爲我是一個認識祂的機會。至於天災人禍，如果我注意聽，且有人助我解讀訊息，那正是天主介入。祂當然不大聲說，而是藉著記號，透過我們生命的境況和我們的同儕說話。某種驚覺一定是需要的，也不該讓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所控制。

天主教徒有權利懷疑，或者只好做一些偽君子或異端分子？奇怪的是他們好像把宗教真理與科學真理區分開來。他們接受達爾文而仍然上教堂。這種分裂本身是可能的嗎？但真理只能有一個：或者世界真是六天造成的，或者它是經過幾億年演化來的。

在我們這個方向迷失的世界裡，懷疑的氣氛會越來越大。我倒不在此即刻看到信仰的減退。我能坦誠地給自己提出一些困擾著我的問題，同時忠於天主，忠於信仰的核心。一方面我能嘗試解決那些表面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也能保持信心，給自己說，找出一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找不著的，仍然有解決的途徑。在神學歷史裡也有好多論點一時解決不了，可不該強加解釋，以清除疑點。

信仰也包括時間上的忍耐。你剛才所提的主題——達爾文、創造、進化論——是一交談的對象，這一交談尚未完成，用我們現有的工具一時也還不該打上句點。其實六天造世的說法倒不是現代科學關於世界起源的觀點與信仰有什麼糾紛的導體。因為由聖經本身也清楚地看出，那只是一個神學格式，無意平鋪直敘地道出創造的歷史。就是在舊約內部，也有不同的方式描述創造。在約伯及其他智慧書裡，有些關於創造的敘述清楚表示，連那時的古人也從未想過，要在那些書裡把世界誕生的經過像攝影似的拍出來。那裡只說了不能不說的話，為使我們領悟基本的事實，就是世界是出自天主的大能，世界是天主的創造物。至於怎樣繼續發展，那完全是另一個問題，對此聖經是十分開放的。反過來看，我想進化論大部分尚未走出假設的範圍，並且多次與幾乎是神話的哲學混在一起，必須加以批判性的討論。

許多人無法由他們孩提時的信仰跳到成熟的信仰。一個人讀過好多對聖經的批評，怎樣才能回歸純正的信仰呢？

他該知道聖經文本出生的複雜歷史與信仰本身無關。透過

各種聖經文本有另一件事且是更大的事與他切身有關。反之，透過這個文本產生的複雜歷史——雖然仍是假設性的——能看出如何一些聲明和事實在人的意識上留下了烙印，這些話和事不是人的意識發明的。我相信，當我們發覺聖經歷史內人的因素時，會更清楚看出不只有人的因素，那裡還有另一個「參事」（譯者按，即默感、協助等）的干預。整個技術領域和機械部分可以留給學術界——他們一方面也給我們帶來一些光照——，為即刻來到單純的信仰行為。相信，在這個絕無僅有的歷史裡，人實在不是唯一的建築者，而是其間發生了更大的事。

### 導向天主的路有多少？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路。因為就是在同樣一個信仰裡，每一個人的路還是十分個人的。我們有基督的一句話：我是道路。這樣說到底只有一條路，而誰上路走向天主，也就是走在耶穌基督的路上。不過話說回來，這並不是說，所有按照各人的良心和意志所走的路都是一樣的。只不過，耶穌這條唯一的路是如此寬廣，以致為每個人都成了個人的路。

有一句吊詭的話來自戴爾都良：「正因為荒謬，我才信。」聖奧思定信是「為了了解」。拉辛格樞機是為了什麼而信呢？

關於這一點，我毫不猶豫地站在奧思定的一邊。就像創造來自理性，並是可理解的，同樣信仰是創造的最後完成，因此是一扇門，讓人得以了解；這一點我深信不疑。因此，信仰就

是深入了解和認識。戴爾都良的那句話——他喜歡用極端的說法——當然也與他的整個思想相應，他是要說，天主顯示自己正是用與世界各種價值相悖的吊詭，如此現出祂是天主。但戴爾都良多少有點敵視哲學，我不大同情他的意見，而更接受聖奧思定的。

你也有一個格式撮要地說出信仰的本質嗎？

我不需要什麼新發明。我認為聖奧思定所說，較晚多瑪斯重說的，已經給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在「我信！」的時候，信仰的行為本身已包含這是來自那位自己就是理性者。我以「信」開始，是為把我放在那我不了解的一位之下。這時我知道，我是在開一道門，它會引來真正的了解。

我們這個時代的大部分人既不能信他們所不知道的，又不知道他們所該信的。在你身上卻有思想與信仰的統一，也有一個整體，這是我們現代人，懷疑者和被蠱惑者所不再熟悉的。你這種生活給人一種什麼感覺？

我可不敢給所有的現代人一個籠統的判斷，也不知道他們在其目前的生活方式下真的被撕裂了，或者他們也有好多使他們尋得統一的方式。任何人內心都會被多種的吸力所牽引，這為我，為一司鐸、一主教，自然也是一樣。因為所懷的多樣興趣，各種天賦和缺陷，各種知識和無知，不會自動地與教會的信仰投合，這會在一切人身上，也會在我身上產生內在的張力。但我不把它界定為分裂。跟教會一起信，並了解我可以予以信任，即其他的知識由教會得到光照，反過來也能使它深度

化，這一切都站得住。最初信基督的基本行爲，及由此出發，嘗試給生命一個統一，好似減少了緊張，不讓它們引發停頓或中斷。

有關福音新傳，你曾言及新際遇，甚至需要來一個基督信仰革命。因為不是微妙的研究會產生「新的、生活化的基督信仰文化形式」，而是人們跟耶穌再度相識。我認為今天願意信的人，其數目很多——如果他們能夠的話。這一點好似已不像從前那麼簡單。

果真不假，這其間我們學的、活的很多，另一方面我們又發現信仰的建構如此完備，系統化得十分徹底，致使人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我想我們需要一種信仰的革命，其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們所需要的是反駁一些普遍定見的勇氣。今天大部分人有一種平庸的意識形態，把達到某種生活水平當做目標，並且說，人可透過他所期待的，他所願意的實現自己，最後，在此，天主代表一個不認得的巨物，其實不管它也不要緊。這也就包含，倫理的出現是偶然的，予以計較是爲了保障幸福。

正如我說過的，今天我們生活於其中，並且日以繼夜強加於我們的這個平庸意識把我們拖入一些定見中，這些意見最終把人的存有與根隔離。因此，一方面，他不再能深入他的根，另一方面，他依然體驗到他缺少什麼東西。因爲假使我們今天患著一些嚴重的集體病，是因爲在人的生命裡有某種不足，且覺得出有所缺乏。所以我們該有勇氣站出來，駁斥在這二十世紀結束時被視爲一個人的正規事，並再度發現信仰及其純真或

簡樸。

這一發覺首先可簡單地透過與基督的相遇而做到——不是與一位歷史英雄相遇，而是與天主，他也是人。只有當一個生命真被這種相遇滲透時，它才會調整方向。這時也會產生一種信仰的文化，我對此毫不懷疑。重要的是這種決定總不該停留在個人身上，而應該傳開形成團體。團體以後把它活出來的程度，就是該團體在創造一個生活和文化風格的尺寸。

很多人發燒般地在等待未來，我們見到一種對未來的歇斯底里症在許多形式下蔓延。好像還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始，這麼多的終。偶然也能給人印象，不少事是在積極的意義上發展。另一方面，這個世界按其現狀又像一座大瘋人院。奢侈和享樂的社會旁邊有日益增長的貧窮，加上戰爭、天災，越來越多，還有很明顯的文化墮落的記號，聰明才智的大浪費。尚從未有過那麼多意志消沉的人，那麼多吸毒的、關係破裂的、兒童被毀的，及因赤貧而變壞的，但吊詭的是也有因富足而變壞的。樞機大人，你曾說過，我們的時代所缺乏的倒不是自找苦吃的本領，而是自我歡娛的本領。但你不覺得自我愉悅越來越困難嗎？

我的確注意到：自然流露的喜樂是變少了。喜樂在今天越來越被倫理的和意識形態的假設所羈絆。當人喜樂時，即刻害怕對不起受苦的族群，不與他們團結。心裡想，在一個多災多難，缺乏正義的世界裡，我沒有權利喜樂。

這一點我能了解，這裡也現出一些倫理道德的關切。但無論如何，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喜樂消失了，世界不會變得更好——反過來說，以人間疾苦之名拒絕喜樂，也幫助不了那些受苦的人。相反，世界需要那些發掘善，爲此而喜樂，並如此重獲所需要的衝勁和勇氣，以達到善的境界的人。喜樂並不破壞團結。喜樂如果是正義的、不自私的，來自對善的領悟的，我會把它傳開，它自己也會擴散。關於這件事，我常理會到在一些貧窮地區，如南美洲，比我們有更多的歡笑、喜樂。很明顯的，雖然他們捉襟見肘，他們仍領悟到善，並與之掛勾，由之汲取安慰和力量。

爲此我們重新需要這種原初的信賴，即最終只有信仰能給的信賴。相信世界終究是好的，相信天主在此，祂也是好的。相信活著好，做人也好。由此發出在喜樂中生活的勇氣，這喜樂會讓別人歡樂，並接受喜樂的消息。

現在我們過渡到你所描述的我們時代的雙重面目。今天有一種連帶責任的新意識，即向整體人類，向受造界的責任感。有各種聚合的運動，努力在危機家庭中促進團結，協助建立和平，克服窮困。這最近十年來每個公民都能覺察的，我們該爲此感恩。由這一事實應該再度承認，在一個很具體的層次上，人之善端是無法毀滅的。

另一方面你說及一座大瘋人院和數不清的惡事，這是我們見到的。我相信正是在此，族群的社會及以技術宰制世界而產生的許多可能，生出了惡的一些新範疇，這是眾目睽睽的事。

這些是要面對的大挑戰：突破這種群體化，它同時把人孤立起來，又使人陷入徹底的孤獨中，而該創建社會生活的健康

途徑。這要求我們全方位的投入，而我們的對應不僅在於技術，也在於我們的行動。

我願說這裡有雙重體悟：人是一個倫理存有，他對自己負責，也對整個人類負責；人也是另一種存有，他只由天主採取資源，這些資源讓他得以前進。

## 第一章 生活剪影

### 出生和聖召

樞機大人，下面這個思想你覺得怎樣：我們來到世上，想知道的，已經知道，想成就的，也已達到？

這為我可遙不可及了。我不知道這句話從哪裡引來的，但人來到世上是一個問路者。亞里斯多德甚至說——多瑪斯阿奎那也說——人到世上來像一張白紙(*tabula rasa*)。他們理會到，有些認識是與生俱來的，又說精神首先是接受的純粹官能。我能加上一些解釋（細節），但無論如何，人首先是個問路者是正確的，也能說，人由內開放，以接受各種回答。

我有一點接近柏拉圖。我想有一種記憶，一種對天主的回憶埋在人裡面，必須把它喚醒過來。人並不是毫無問題地知道他該知道什麼，也不是毫無問題地活在那裡，他是一個人，他是在路上。

正是舊約和新約的聖經宗教，常常緊迫地強調飄泊的天主子民的圖像，而以色列民族當時也實在是在飄泊。這一圖像把人的存在究竟是什麼描繪的清楚。就是人是一個路上的存有，他的路不是虛構的，而是在這生命裡真能發生事故，並且他能尋找，找到這路，但也能迷失。

你多次用「眷顧」兩字，這個詞為你有何意義？

我堅決地信服天主真看見我們，祂給我們自由——但仍然領導我們。我多次觀察到，有些事最初好像跟你作對，危險、不悅，到了某一刻卻變成積極的。才頓然領悟當初那樣好，那是一條好路。為我，從一個實用的觀點來看，這是指我的生命不是由一些偶然事件組成的，而是有某位先看見，在我前面，預先為我著想，安排我的生命者。我能予以拒絕，但也能接受，這時我將體會，我真是被一道「先見」之光帶領著。

這不是說人完全被界定了，所說的那個帶領恰是向他的自由意志的一個招呼。就像在分配元寶的比喻裡那樣，給一個人分了五個，另一人分了兩個等等；領取的人各有一固定的本分，但每人可照自己的意願安排。總的來說，每人有他的使命，有一分天才，無人是多餘的，無人空閒的，反之，大家都該努力認出自己的聖召是什麼，並怎樣以最好的方式答覆自己接受的召叫。

你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誕生在高巴伐里亞茵河上游的馬爾克德耳鎮，那是一個聖週六。這一巧合為你有某種意義嗎？

是的，我覺得這樣很好。逾越節前夕——已接近逾越節，但還沒有到，還藏在那裡。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日子，以某種方式暗示我對歷史及對我自己的情況所構想的一個圖像：在逾越節的門口，但還沒有進去。

你的雙親名叫瑪麗和若瑟。你出生不到四小時，在早晨八點半就領洗了。聽說那是有風暴的一天。

我當然什麼也不記得。我的兄弟姐妹給我述說過，那一天大雪紛飛，天氣很冷，雖然已是四月十六。但在巴伐里亞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無論怎樣，出生後不到四小時就領洗，總不是常有的事。

那是真的。不過真正的原因——這為我已是一件喜事——在於那一個聖週六。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夜裡舉行逾越節慶典的習俗，復活慶祝是在早上，也祝聖聖水，作為以後整年授洗之用。又因為接著就在教堂裡舉行施洗禮，我的父母說（用巴伐里亞本地話）：Jetzt ist er sho do, der Bua「看哪，小傢伙已在這兒」，就讓他在這教會定為施洗的禮儀時刻領洗吧。這一巧合——我正巧在教會準備施洗聖水時出生，而我因此能用最新鮮的聖水第一次由新水領洗，這為我已含有一種意義。因為這把我置於與逾越節的特別關係中，也以意義豐富的方式把出生和洗禮連在一起。

你是在鄉村長大的，你是三個孩子的老公，你父親是公安人員，你的家庭說不上小康，可算貧窮。你有一次述說過，你母親親手製作肥皂。

我的父母結婚較晚，而一個像我父親階層的公安人員，一個普通警察，在巴伐里亞，收入有限。嚴格說來，我們不算窮人，因為每月的收入是有保障的，但我們應該節省而活得簡

單，這是我非常感激的生活，因為它所產生的許多喜樂不是一個富裕的生活所能有的。我時常記得那是很美的，我們可以享受很小的事，並且彼此間總想為別人作點事。由這種簡樸而在財政上頗困難的情況中產生一種內在的團結，把我們彼此深深地連繫在一起。

為使三個孩子都能讀書，我們的父母自然須受很大的匱乏。我們三個孩子覺出這一點，也努力予以回報。因了這種十分簡樸的氣氛，在我們中間有很多的喜樂及彼此的相愛。我們體驗到父母所給我們的，及他們自己所承擔的。

肥皂的故事是一樁特別事件，不是因為我們窮，而是因為在戰爭中必須設法獲得那些不太充裕的物品。我們的母親原是以廚師為業，什麼都會作。在全國各地挨飢受餓的一刻，她能技高一籌地用手邊的材料為你烹調一頓可口的餐點。

我母親為人熱情，內心很堅強；我父親較理性，是意志型的；他的信仰是經過反省的；他對一切事的了解既很快，也很清晰，而他的判斷常是出人意料的正確無訛。當希特勒奪得政權時，父親說過：我們要打仗了，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座房子。

有位喬治拉辛格在巴伐里亞歷史上曾扮演過一分角色。

那是我的老大伯，即我父親的伯父。他是一位神職人員，曾考取神學博士。他以地方議會代表及國家議會代表的資格的確曾是爭取農民及一般小民權利的前驅。我曾讀過地方議會的辯論記錄，得知他曾抗議童工，這是當時聞所未聞，並且以之為荒唐不經的。顯然他是一個嚴謹的人，大家都以他為榮，為了他的諸多建樹，為了他的政治聲望。

你們的家是怎樣的？你們住在哪兒，生活的怎樣？

我父親的職業，當一名公安員，多次逼著我們走路。我本人對我的出生地馬爾克德耳已記不得什麼，我二歲時就離開了那裡。我們去的地方名梯德莫寧，在此，公安局設在城中大廣場的一座古老隱修院裡。那座房子的確很美，但為住家可不能比這樣的房屋更不方便了。隱修院的老會議廳當作我們的寢室，其他的隔間都很小。空間是夠大的，但我們也發覺那是一棟破舊的老屋。為我的母親可慘了，她得經常把木柴和煤炭帶到兩層大樓梯上面去。以後搬到阿梢，住在一棟很漂亮的別墅裡，這是一位農民修建而租給公安局的。和今天住屋的設備比較，那一切都是很粗糙的，連浴室都沒有，但自來水倒是有的。

家父因要退休了，買了一座老農莊，也相當簡樸，那是在 Traunstein 的 Hufselag 附近。這裡鄉下一口水井代替了水龍頭（自來水），也蠻有詩意的。別墅一面有一片橡樹雜著山毛櫸的森林，另一面是一群山，我們每天早晨一睜開眼，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這些山。屋子前面有蘋果樹、李樹及很多花，是我母親種的。那是一塊大而美的地產，以其地勢來說，充滿了詩情畫意。在那些老穀倉裡可以編些十分奇特的夢，可以玩得非常開心。

那是一個未開發的世界，老實說也開發不了，因為實在太不一樣了。比方那裡有一家老舊的紡織坊，因為前一屋主好像是一紡織業者。但各種零件非常簡陋。我們住的屋子——我想是 1726 年建造的——亟須多方面的整修，因一下雨就漏水。但這無礙於孩子們作夢，這一切為他們都很美，雖然有些不

便，我們卻感到非常幸福。父親應該花錢整修，母親應該從水井裡打水，也許不怎麼開心，但為我們三個孩子那簡直是樂園。為進城，步行不須一小時，常常走路是一件很美的事。我們並未感受到現代享受的缺乏，反而品嚐到一座舊屋所能提供的一切驚喜、自由和舒適。

你們的教養嚴格嗎？

在某種意義下是的。家父很正直，也很嚴肅。但我們常覺得他的嚴肅出自善良，我們也就容易接受。家母則常以她的溫暖補償家父也許太嚴肅的一面。他們是兩個非常不同的性格的人，但正因不同，互相補充得天衣無縫。我再說一次，家父是嚴肅的，但他也有溫暖、真心和喜樂的一面，我們一齊遊戲時，父母也會參加。音樂具有極大的凝聚力，它在我們家庭生活裡扮演很大的角色。

你是莫札特的熱烈景仰者？

是的！雖然我小時多次搬家，但住家一直留在 Inn 及 Salzach 之間的地區。我一生的最重要、最美的部分都在 Traunstein 度過，這城強烈受到（莫札特故鄉）Salzburg 的影響。在此，莫札特浸潤我們的心靈最深處，直至今天他仍強烈地感動我，因為他的樂曲既光明，又深湛，從來不是純粹的消遣，而包括了人類的全部悲劇。

藝術是很重要的。在科學裡所表達的單獨理性，不足以作為人對事實界的完美答覆，也無力說出人能、人要、人該表達的一切。我想這是天主放入人內的，藝術與科學一起是祂賜給

人的最大恩惠。

你們的父母把三個孩子都送去住校，這是為了什麼？

這是當時受到今天所謂的「高等教育」的唯一方法。那時鄉下中學很少，學校離家很遠，因此大部分時間不得不住校。我姐姐進修方濟會修女們辦的一般補習課程。學校離家五公里，她騎自行車上學，人住在家裡。以後，她主動願意住校，父母同意了。我哥哥上中學一年級時，也住進學校，那時是非如此不可的。我本人最初每天步行上學，兩年後只剩下我一個孩子留在家裡了。於是父母說，讓我也去住校，應該是一個好的補充教育。果然這為我有了很好的作用——雖然我得承認當時並不顯得容易。在宿舍裡學習另一種社會互動，也學習向命令屈服。不過在校只住了兩年，最後 Traunstein 的所有宿舍都改為軍人醫院，從這時起我又留在家裡。

能說你們的家庭是大家公認的熱心教友家庭？

是，能這樣說。家父是一個很虔信的人。每主日他去參與六點鐘的彌撒，九點再去參與大禮彌撒，下午還要再參與一台。家母的宗教情操十分熱烈。在這一點上他們二人情投意合，各人以自己的方式活出宗教至上的人生觀。

你們在家接受到怎樣的宗教教育？這在今天為很多父母好像造成不少問題。

那時，宗教是生活的構成部分，只由共同祈禱就可看出。每次用餐都會祈禱；在可能範圍內我們每天參與彌撒，而主日

天，大家都加入宗教服務。較晚，家父退休後，我們經常一起誦念玫瑰經；其他，則把我們交給學校的要理班。我們的父親也給我們買些刊物，比方初領聖體的雜誌。不能說我們的教養是直接的宗教教育，但透過家庭祈禱及上教堂的確有了這種教育。

在你年輕時，信仰有什麼令你著迷的地方？

一開始我就對禮儀很感興趣——我想我的哥哥姐姐也是如此。在小學讀書時，父母就給我買了第一本彌撒經書。進入這個拉丁禮儀的世界，了解裡面所發生的事，所含的意義，及所說的種種，已經使人十分著迷了。這樣，我們一步步地由兒童彌撒經書過渡到更完備的彌撒經本，再由此繼續前進，簡直是一種發現之旅。

彌撒經本——那是什麼東西？

是神父在祭壇上用的彌撒經書。教友們能買到袖珍本，且是譯成本地語言的。

不用說，禮儀的慶節令我們神往，有音樂及那麼多點綴和圖像，這是使人神往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宗教的訊息倏忽給我啓發的理性興趣。好像我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一步一步地在被帶領著。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時期人必須真正的作反省，這曾是一件十分有用的事。那時左鄰右舍都知道，某某是天主教徒，他去教堂，甚至他想當神父。這樣就被拖入辯論裡，而這時就該學習武裝自己了。

當然，這時若找到一些論證，並加以了解，那是很有趣

的。這一切也就成了一種理性的探險，越開越廣，而能發現遼闊的視野。那時，這一禮儀慶典與理性探險的搭配，為這個做人的我及願意努力了解世界的我顯示為十分美麗的可能，來填滿我的生命。

這裡很明顯跟你的出生地巴伐里亞及特屬該地的天主教會教有密切的關連。你一直都強調你要保護這些簡樸人的謙虛的信仰，對抗神學家的驕傲及大城市中的那種富足、理性主義及中產階級的信仰。

我們不過在勉力做天主教徒而已。不過我們的信仰首先有了它鄉村的色彩，然後在 Traunstein 這座小城裡，那裡的天主教會實在地深刻地與那個地區及其歷史和生活的文化整合在一起。今天我會說，那就是「文化信仰化」(acculturation)，這個表達為我們很恰當，是我們的歷史造成的。

我們由家庭開始，已是很愛國的巴伐里亞人。我們的父親出生在下巴伐里亞，你一定知道在十九世紀巴伐里亞政治上有兩股潮流：一股朝向帝國(Reich)，具有日耳曼國家趨勢，另一股較具奧地利—巴伐里亞趨勢，傾向法國，堅信天主教。我的家很清楚地屬於第二股潮流，很有意識地愛我們的巴伐里亞，並以我們的歷史自豪。我的母親來自蒂羅兒地區，那裡南德國的天主教，方式雖不同，卻也很強，並且非常生活化。這樣我們很深地與自己的歷史認同，清楚意識到這一歷史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它跟那個引來由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是國家主義的大災難使我們對歷史的本有看法更加堅定。

在你們父子之間有過衝突嗎？

這裡那裡總該有過一些吧。但我跟父親有一個很深的來往，因為他服役的最後一年，請了相當長的病假。第三帝國（譯者按，希特勒主政期）令他非常生厭，他設法退役，越早越好。那幾個月，他多次與我一起散步，使我們二人的關係拉得很久。以後三個孩子都上學，而父親退役後經濟問題加重，以致母親不得不去 Winkl，在 Reit 地區的時令期當廚師，而剩下我一人在家陪父親。他跟我談了很多，他真有講故事的天才。一面散步，一面講故事，我們彼此越來越接近。他的宗教信服及他對政權的堅決反對終令我們做子女的心悅誠服。他的說服力，很簡單地，來自他內心的誠實。他的為人態度，雖然與官方的價值對立，為我們是模範。

他的反對政權是怎樣表達的？

直至一九三七年，他是個公務員。在梯德莫寧時，我們過的是所謂的「戰鬥時期」(Kampfzeit)，是 Weimar 民國的末期。我那時還小，但我記得他受苦很多。他訂了一份刊物「正道」(Der gerade Weg)，是一份反納粹的出版品——我還記得那些反希特勒的漫畫。父親用詞很尖銳。我們所以搬到鄉下來住，主要是因為他看到納粹政權即將得勢。在鄉下，情況當然和緩得多，雖然很不幸地，連在鄉間，在農民間已有很多納粹分子。父親沒有公開表達反對，在農村裡這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家裡，每次他念日報，就大為生氣。他表達不屑，在他信任的人前，把心中的話說的很清楚。最重要的是，他雖是一名公務

員，卻從不參與黨的任何組織。

你曾參加希特勒的青年團嗎？

起初，我們都沒有進去，但一九四一年入團服務成爲必須的時候，我哥哥被逼入團了。我那時還太年輕，但不久，當我進入修院時，也把我登記進入希特勒青年團了。一離開修院，我就沒有再露面。這有其困難，因爲我很需要的那份獎學金離不開一個證明文件，保證我們去過希特勒青年團。感謝天主，我有一位很能體諒人的數學老師。他本人是納粹，但他是個善心人，他對我說：「你去走一趟，讓我們有這份文件……」。當他見我作不到時，終於給我說：「我了解你，我會想辦法」，這樣我終能脫離了青年團。

你小的時候，想成爲怎樣的人物？你有過一些典範嗎？

真正的典範說不上來有過。孩子們的想像是朝夕萬變的。有那麼一回，一名裝璜畫家把我們的一道牆壁重畫了一次，給我印象如此深刻，使我想學他那一行。過一段時間，Faulhaber 樞機來到我們的地區，他那紫色的大紅袍當然更令我折服，那時我心想，做這樣一個人物倒也不錯？

裝璜畫家和樞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呀！

果真如此，這證明一個孩子不作任何評估，他只按照他所看到的作決定。從小學始，很早我就樂於學習。以此爲準，老師們也是模範。這種學習的飢渴，感謝天主，與當司鐸的念頭配合的很好。不過我還得說，教書、傳遞知識，很早就令我十

分嚮往，寫作亦然。國民學校開始，我就寫些詩。

哪一類的詩？

隨興所至；日常生活瑣碎小事的詩，聖誕詩，寫大自然的詩。這只不過表示我喜歡表達自己，並傳達給人。每次學到什麼，我常想把它傳給別人。

你從未想過建立自己的家庭，也從未跟一位女性有過愛情的關係？大家知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年輕時是很多情的。

關於此點，我這樣說吧：有關直接想有一個家庭，我的計劃從來沒有延伸到那麼遠。但對於友情的感受，當然有過，這是清楚易明的。

你的聖召是怎樣聲明的？你何時知道你被召叫？你曾說過：「我深深信服，雖然自己也不知是怎樣，天主向我要求一事，這事只有我當司鐸才能作成。」

並不曾有一道閃光照明，讓我看清我應該當神父。相反，在我身上，一切都是慢慢成長的，並該不斷重新默想和征服。我也說不出我作決定的日期，但我很早就感覺到天主為每個人都有計劃，為我也會有。也覺天主對我有一個構想，我一步步地明瞭，從我一方面來說，祂的計劃跟鐸職有關。

以後你有過多次照明的時刻，或只有過一次照明就完了？

古典意義的照明，半神祕或其他的樣子，我從未有過。我

是一個道地的一般信徒。但在更廣的意義下，信仰當然給你帶來光照。把信仰和思想結合起來，借用海德格的一個說法，人像是走在森林裡乍隱乍現地看到天光。

你曾寫過：「一切存在的都是思想的發射。造物主是一切事物的源頭和支柱。一切存在的以其源頭說都是理性的，因為都來自創造的理性。」

這幾句話其實只是嘗試著說出基督信仰關於創造所發展出來的道理及其所涵蓋的哲學。沒有任何東西單純地存在著，而是存在的東西來自一股創造的能力；這能力本身也不是無所謂的任何一種死的能量，而是理性和愛——這樣，受造的一切最後都是可理解的。我相信，這是基督信仰的創造哲學。相信它，默想它，它就會給你光照，但這裡不能說成是一般所謂的「照明」。

你決定走司鐸之路後，有時也曾對自己感到懷疑，誘惑或勾引？

一點不錯。恰好是在讀神學的那六年裡曾遇到許多人性問題，提出許多問號。獨身為我合適嗎？當司鐸適於我嗎？是一些不大容易即刻得到答案的問題。我一直把基本方向放在眼前，但各種危機還是不缺的。

你曾有過哪些危機？可以舉一個例子談談嗎？

在慕尼黑讀神學的那幾年裡，我主要面對兩個問題。科學的神學令我著迷。我發覺進入信仰歷史的大世界裡簡直妙不可

言；思想的和信仰的廣闊視野在我眼前展開，同時我學習反省做人這一事實所投出的原始問題，及我自己的生活問題。另一方面我也越來越清楚，做司鐸這一行比研讀神學的喜樂要多得多，就是說在一個堂區工作每每會把你拖得很遠，並且有許多非常不同的要求。我一定不該攻讀神學只是爲了當教授，即便這是我暗中的期望。答應做司鐸爲我假定接受全部作業，連那些最簡單的形式都包括在內。

我是個較膽小的人，不具實際感，不是運動員，也不擅組織或管理，於是我不不自問：我的人緣怎樣？——比方，要當輔導的話，我能否指導並啓發一群公教青年？我會教小孩要理？知道跟老人、病人來往？等等。我不得不自問能否一生承受這一切，這是否真是我的聖召。

此外的確還有獨身，即不結婚的問題，我是否承當得了。那時被毀的大學還未給神學提供空間，我們二年之久在 *Fiirstenried* 古堡住宿，是在城外的一些建築裡。那裡，我們住在一個緊湊的團體裡，不但師生在一起，男生女生也同校。在這種朝夕相遇中，取捨的問題及其內在的解釋變得非常實際。在穿越富頓黎古堡的美麗花園時，自然也會在小堂裡，我時常給自己掀動這些問題。直至 1950 年秋我晉升執事時終能說出一個心悅誠服的「是」。

大戰結束前你被徵入伍嗎？

是的。1943 年始，*Traunstein* 的修生全部被遣送到慕尼黑，以從事反空襲的服務。那時我十六歲，我們的役期延續了一年多，由 1943 年八月到 1944 年九月。在慕尼黑時，我們附屬

Max 中學，也上一些額外的課。所教課程是縮減的，但我們受的教學還不算壞。這一切一方面不是什麼愉快的事，但另一方面，那個時期的「同志感」也有它的魅力。

你們的反空戰是怎麼一回事？

高射炮有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射擊的機組，一是瞄準的部門。那時已有一些最初的電晶體及光學設備，用以發現接近的飛機，並把瞄準的訊號傳給發射的機組。除了正常的操練外，每次有警報，我們都該回到各人的機器前面。這很快變得非常討厭，因為夜裡的警報越來越多，有不少夜晚簡直是鬧翻了天。

你曾經歷過慕尼黑的轟炸嗎？

是的，我當時尚在第三部門，於傳播部工作，主管全部電話服務。我們在 Gilching，離 Ammersee 不遠，有一個重要的基地，因為美國飛機由南部，由湖的那一邊飛越慕尼黑。另外，離那裡不遠還有 Oberpfaffenhohen 的飛機工廠，在此曾製作了最初的噴射戰鬥機，我們看到最初的德國噴射戰鬥機升空。這裡曾發生過一系列的空戰，我們親身體驗到戰爭的滋味。

1944 秋，我們先被調動，並送去勞役。我在奧地利～匈牙利邊界逗留了兩個月，正值匈牙利向俄國投降的一刻。在那時期，修建了很多巨大的堡壘，掘了反戰車的壕溝，及其他此類的事。最後，我被編入陸軍。幸運的很，我被派到 Traunstein。在登記室裡，我碰到一位很有人情的軍官，也是反納粹者，他在可能範圍內盡力幫助所有的人，他把我送到 Traunstein 我的家裡，使我的陸軍兵役相當輕鬆。我在那裡被俘，然後被送進

美國集中營，那裡有四萬到五萬戰俘。1945年6月19日我被釋放了。

關於戰爭結束你留下什麼回憶？

那時候，我們在 Aibling 的航空地區。在我被俘的六個星期中，我們露天睡在地上，這不常是件開心事。美國人無法為這麼多的戰俘修建平房或軍營。因為我們手邊沒有日曆，每天要很費力地算日子，也沒有消息來源。在五月八日，我們注意到，習慣發射照明彈的美國人，這一次放很大的煙火，像在發狂似的。以後謠言傳出，說戰爭結束了，德國投降了。這時我們透了一口氣，確信我們的解放不遠了，也不會再有什麼不測。但不久又有謠言流傳：不要高興的太早，美國人現在要去跟俄國人打仗；我們要再裝備起來送去跟俄國作戰。不過我當時不能想像（美俄）聯盟會那樣快破裂，我沒有相信謠傳。我對戰爭結束感到高興，心理只想：希望在此不要被扣太久。

## 年輕的教授

你曾說過：「我開始讀神學時，就對各種理性問題感到興趣，因為那些問題揭開了我的生命之劇，更重要的是揭開了真理的奧秘。」你要說的是什麼呢？

我現在得說，那是太快了一點。事實上，一開始讀神學，所尋求的不是一個行業，而是想了解信仰，這就假定，就像我關於聖奧思定所說的，信仰是很實在的，它讓人正確了解自己

的生命，世界及人類。這種研讀也自動地把我們投入西方歷史的精神討論中。我們的信仰一開始既與猶太傳統，也與希臘拉丁傳統相連，最後接上其現代歷史。因此研讀神學時我一直在問：到底有什麼？到底我們能知道什麼？

在我們弗來辛修院裡那時氣氛很活躍。修生們由戰場上回來，有的在軍中六年，一般都對靈修及大學的讀物如飢似渴，當然他們剛有過的生活經驗也給他們提出不少問題。那時閱讀 Gertrude von le Fort, Ernst Wiechert 及 Dorstoïrevsky, Elizabeth Langgässer, 手上有什麼就讀什麼。在慕尼黑讀書的人認識了海德格及雅斯培，而這是透過一位倫理神學家 Steinbüchel，他確曾引起一種精神衝刺。

哪種精神潮流特別引起你的興趣和嚮往？

海德格和雅斯培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位格主義整體來說亦如此。Steinbüchel 寫過一本書，名《思想的轉變》(Die Wenole des Denkens)，書中他深刻地寫出由新康德主導期到位格主義期的過渡。這為我是關鍵性的一課。其後，我很早就熱衷於聖奧思定，那可說是對聖多瑪斯阿奎那的一種制衡。

奧思定說過：「譴責惹是生非的人，安慰膽小的人，駁斥異議的人。」他如此界定他的功能。

他是一位真正的主教。他也寫了大部頭的書，令人訝異的是，他怎麼可能作到這一切，加上許多他須調理的細節。以主教的身分，他源源不絕地面對全部的政治怨訴及小民的困窘，而努力保持屋內的和合。那時局勢動盪，民族大移動開始。他

一定不是一個在雲中飛翔的人。

按照當時帝國的組織，主教也是一種行政人員，他有某種法定權力，連民間最普通的事也須由他來調解。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天天地活下去，同時還得盡力給人傳述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也是一個模範：雖然他很渴望默想，從事屬靈的工作，他還是整個獻身於每天的瑣碎需要，並隨時為別人而生活。

使我感動的，倒不是他的牧靈差使，關於這點我當時還不太懂，而是他思想的清新和活躍。士林派神哲學有其偉大，但都是很非個人化的。為了登堂入「奧」需要一段時間，方能發現其內在張力。反之，奧思定是個激情、受苦，問題多的人，跟他即刻可以打交道，並與之認同。

你對聖文德及他的哲學和歷史的興趣最後是從哪裡來的？

老實說，那是偶然的。我的博士論文主題原是討論古代教會的，現在為「講座」論文，我的論文指導教授 Sohngen 決定我該研究中世紀或現代。我當時好歹應該研究聖文德的啓示概念，而該教授也知道奧思定思潮比多瑪斯主義更合我心，就把我指向文德，教授本人很熟悉文德，也很佩服他。

基本神學正是以「啓示」為對象：啓示是什麼？真有啓示嗎？及其他類似問題。當我投入研究，下一番工夫以後，我發現，為文德，啓示與聖方濟的探險分不開，而這一探險本身又跟 Joachim（若亞敬）de Flore 有關，後者預言過啓示的新階段，一個第三世期，即聖神的時期。若亞敬甚至計算過這一時期在哪一刻開始。奇怪的是這一估計與聖方濟一生的歲月大致相合。聖方濟在教會歷史裡真實地開啓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樣

方濟會士，或至少其中的一個重要潮流，很快就感覺到，若亞敬預言了它的到來：看哪，聖神的新紀元；看哪，天主的子民，簡單、新穎、貧窮，不需要什麼今世的結構。

這樣，啓示的概念不再單純地放在開始的某一定點，離我們很遠，不，啓示是在現在，與歷史相連——是在歷史中前進的一個進程，並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如此，啓示爲文德不再是一個抽象的論題，而進入他對自己方濟會歷史的解釋。

這思想對你又有了什麼啟發呢？

這裡涉及兩大問題，其一可以如此闡述：假如基督信仰跟一個很久以前所發生過的啓示連在一起，那它不是注定要回頭看，而把人拖到過去的時日嗎？它怎能與歷史同步前進，繼續它的路，而還能說出一些什麼呢？它不是要慢慢老化，而最後變得毫不實際？聖文德的答覆是把基督與若望福音中的聖神之間的關係強烈地凸顯出來：啓示在歷史中的話語是決定性的，但也是汲取不盡的，常開啓出新的深度。以此爲準，聖神是基督的通譯員，祂向每一個時代再次說出基督的話，並顯示這話常有新東西可說。聖神不是投射到未來的時期，像若亞敬 de Flore 說的那樣，而是我們不斷生活在聖神的當下。基督的時間就是聖神的時間。

與第一個問題有關係的第二個問題涉及末世論及烏托邦。人不容易把希望放在來世，或此生結束的新世界裡，總想在歷史裡有個承諾。若亞敬給了這承諾一個具體的格式，這樣給黑格爾開了路，像 de Lubac 神父曾證明過的，而黑格爾轉過來又給馬克思準備了一個程式。在方濟運動的興奮而屬靈的無政府

史觀前，若亞敬強加一個積極和實際的概念，這給他帶來很多譴責，即在今日還有人責怪他。儘管如此，在這些並非烏托邦，而是受到信仰所鼓舞的團體裡，他看到烏托邦問題的答案：這些團體不是為日後的世界操勞，而是為了今天在這個世界裡露出一道樂園的光芒。它們現在是「烏托邦方式」生活，按照它們所能作的，放棄財產、放棄自主、放棄情愛及其各種成就。這樣一來，一陣清風吹向世界，破除各種阻隔，使在世界中天主離我們不遠焉。

你完成學業後，曾從事牧靈一年。有人給我說，你特別是給人送葬的。

不是，這不正確。我擔任校牧，每週須上十六節宗教教育的課，負責六個不同年級，由第二到第八年級。工作量很大，特別為一個剛開始的人。只以小時計算，上課是我主要的任務；我很喜歡這任務，因為很快我就跟孩子們打成一片。為我來說，走出理論世界，學習與孩子們講話是很有趣的事。我覺得把整個概念的抽象世界搬來讓它自己跟孩子說話是很美的事。

每個主日我應該講三次道理，一次為孩子，二次為成人。使人驚異的是，為孩子的禮儀吸引更多的人，成人也來了。我是唯一的校牧，每天晚上我單獨擔任青年訓導。每週我有很多洗禮，不錯，也有一些葬禮，慕尼黑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自行車的痕跡。

你一人獨住嗎？

是的，但我有一位很好的本堂，Blumschein 蒙席。他真是

善牧；不是知識型的，但整個人為他的使命感所滲透，他也是個十分良善的人。

你是當時德國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學生都留心聽你的課。有一名你的老學生說，現在來了一位把事情弄清楚的人，有他，一切都奏起新調子。

我相信年輕也算得一回事。我的課程當然不是用不同的教課書堆砌而成，而是盡力學聖奧思定的樣子，把課堂的材料與時代及我們的生活圈子盡可能清晰地連貫起來。我想是爲了這一點學生才注意聽課。

Wolfgang Beinert 教授在一篇說及神學家拉辛格的老讚詞裡曾說過，你的神學高超，大師型，並與你的人品分不開。「是一個明朗，會分析的理性，又和強大的綜合力相連」。他說，你能即刻理清並解釋各種神學弱點，而你所用的語言具有「古典光芒放射的力量」。你在這一描寫裡認得出自己嗎？

我想這有點過分，在這類讚詞裡人們習慣這樣說。當然，我曾努力作些正確的分析，也正是在我的那些未來的博士圈裡設法幫助他們揭露一個論證的各種弱點。這爲我是個很重要的經驗，人性方面也是如此，就是不僅給那些準博士作諮詢，還每週二小時左右跟他們一起工作；在此，每人輪流報告他的工作成果，然後一起討論。我相信我們都獲益良多。

以後我們將這方法擴大，採訪一些大人物。我們曾到斯達

思堡去見 Congar，去巴塞爾見卡爾巴特，反過來也請過拉內到我們學校來。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圈子，我們沒有彼此過不去的地方，因為大家都知道彼此沒有惡意，而是在實行分析上互相幫忙。另一方面，我們也嘗試不停留在分析上，而要達到一個綜合。

在你的神學裡，或你作神學的方法上，有沒有什麼特點？

我是由教會的論題出發，這一論題臨在、停留在一切上面。只不過，那時爲我重要的一點，現在爲我更越來越重要的是，心中記住，教會本身不是目標，它的存在是使人看到天主。所以我能說，我對待教會論題的方式是透過它打開對天主的視線。在此意義下，天主才是我工作的真正中心主題。

我從未嘗試創建一個自己的系統，一個個別的神學。借用你的話來說，我的特點無非是願跟教會的信仰一起思想，特別是跟教會的大思想家一同思想。不是一個出自我的孤立的神學，而是一個盡可能廣爲開放的神學，雖然總不離開信仰思想的路。因此，詮釋學爲我常很重要，我無法設想一個純哲學的神學。出發點首先是聖言：我們相信天主的話，盡力認識它，真實地了解它，然後與信仰的大師一同思考。爲此，我的神學受到聖經和教父，特別是奧思定的烙印。我當然也嘗試著不停留在古教會階段，而確定思想的一些突出高峰，同時在討論裡把現代的思潮整合進去。

真理是你思想的中心概念。你的主教徽號也說「真理的合作者」。不亦該是事實的合作者或智慧的合作者嗎？

真理和事實並駕齊驅，不會單獨前進。一個沒有事實的真理是純抽象，而一個沒有跟「人的智慧」一同操作的真理也不會被人接受，卻是一個畸形的真理。

這個主題爲我不是突然成爲中心點。在靈修的路程上我很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難題：如果想想我們的一切限度，而說我們能認識真理，不是有些自負嗎？我也自問過到什麼程度更好放棄這一範疇。在加深思考這問題時，我終於看到並了解放棄真理解決不了什麼，反而把人帶到恣意（任性）的獨裁下。而後能剩下的一切由我們單獨決定，並且是可互換的。如果人不能認識真理，如果一切只不過是個人或集體決定的產物，那麼人本身的尊嚴就被剝削了。

循著這條思路，我領悟到，我們不要把真理的概念丟了，它是多麼重要，儘管這概念無疑地含有威脅和危險；這概念應該繼續作爲中心範疇。這是向我們提出的一個要求，它不給我們任何權利，反而從我們這方面要求謙遜和服從，它也能把我們納入一條人人通行的路上去。在與我們今天所處的精神境況作過相當長期的爭戰後，真理的首要性慢慢地變得更明顯。如同我說過的這首要性不該以抽象的方式表達，而自然地要求把它加以智慧的包裝。

你哥哥這樣描寫你的性格：「他的力量他須先獲取，但必須打仗時，他會按照他的良心行事。」你是個良心人嗎？

我嘗試著，我不敢自詡已是。不過我以爲很重要的，不把普遍的贊許或一群人的和樂氣氛放在真理之上。這常是一個

大誘惑。當然，上訴良心能淪為自己常有理的狂妄，能自信有義務反對一切。但是按此字的真義，一個人聽從自己的良心，並且一旦認識，承認了善，會把這善放在「大家同意」以上，這為我實在是一個理想，而按這種人行事是一個義務。好些人物，像多瑪斯穆爾、紐曼樞機，及其他大見證——例如受納粹政權殘酷地迫害過的潘霍華——為我都是卓絕的模範。

雖然如此，你也肯定過，這樣的人應該強調「真理的首要性在良善以上」。我心裡想，這種觀點不無危險。這不是跟杜斯托耶夫斯基所描繪的大法官的形象對稱嗎？

首先應該讀全部上下文。那裡所說的良善意思是一種假的「大好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是一個很多次出現的觀點，在政治領域也能觀察得到：不願「跟人過不去」。為避免給別人或自己找麻煩，寧願委順於虛假的、不潔的、謊言、和邪惡。只要獲得舒適、成就、大眾的讚譽和主流輿論的認同，真理是可以放棄的。當時我不願混統地被良善所困。真理沒有良善不能有成就，也不能勝利。我那時所說的良善是一幅漫畫：以良善為幌子，不顧良心；把合意和避免麻煩的心願放在真理之上；享受面子和做好人。

有人說你有「老巴伐里亞人的頑抗本能」也有「一股熱烈的和簡樸的虔誠」。這一切都來自一個很深的向度，不能予以界定，只好用「巴洛克」一詞來說吧。由於對人存在的深不可測的性情的確切認知，你企圖「對得救的受造界保持寧靜之美的感受」。但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們該說生命不是由諸多矛盾，而是由一些吊詭做成的。基於閉眼不看歷史慘劇的寧靜最終是謊言或虛構，是把自己置諸一旁的一個方式。倒過來說；一個人已看不出，連在這個敗壞的世界裡仍滲透著造物主的光，他已不再真能生活，而成爲憤世嫉俗的人，或應該與生命告別。二者並存：在歷史及人存在的深淵前清醒不惑，及信仰給我們的凝視，即確切知道在此善是存在的，雖然我們不常能把二者連在一起。如果要抵制惡，那麼更重要的是不跌落在暗淡的倫理主義裡，不敢再有歡樂，卻要真實地看到存在著的一切美，並由此出發，抵抗破壞喜樂的一切。

做神學也能像玩遊戲，如同 Hermann Hesse 在《玻璃珠遊戲》中所說的一樣？

那太少了。我想遊戲的因素在神學裡也有，但說到頭，神學不像《玻璃珠遊戲》是一個構造的世界，一種思想的數學，而是與事實的對質，顧及事實的整個廣度及所有要求。遊戲的因素，因是我們存在的一個真實因素，也是其構成部分，但並不足夠說出做神學的真正特質。

Hesse 的另一作品《荒漠中的狼》，是你所愛讀的書之一。這部小說被視為有關文化悲觀主義及存在主義開端的最重要文獻之一。在讀它時，會發現一個神經過敏的人的注釋，他的痛苦的自我分析同時代表一個診斷時代疾病的嘗試。這個定義也能與你的爲人有點糾葛嗎？

沒有。這書因其所作的診斷，甚至預斷的力量，為我實在是個發現。它以某種方式先碰觸我們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經歷的難題。這部小說其實只寫一個人，但他終於裂成許許多多的人，以致以自我解體為收場。這裡「我」的延伸也就意味自己的毀滅。因此不是在一個人身上有兩個靈魂，是存在整個地毀滅。我沒有把這書當作一個我可以與之認同的人物的歷史來讀，而是當作一把鑰匙，以深入透視，並闡釋現代人的難題所在：人被孤立，又把自我孤立。

人品的意念有多種選擇，現代人的形象沒有清晰的身分，今天這樣，明天那樣：這一看法到了我們的時代才大放光彩。一切都可能。個人不再按固定的程式來界定，生命是一場各種可能想像的異數都具備的無止境遊戲。

但正是在這種恣情任性中生命失去其內涵。生命是嚴肅的，不許冒這種遊戲的險，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痛苦和死亡。人能失去他的身分，但不能撤銷他的責任，有此責任，人的過去永遠跟著他不放。

你在波昂、敏斯德、杜賓根及雷根斯堡教書，你的起步是一個改革家的模樣。科隆的德國樞機若瑟 Frings 聘你作他的顧問，於是發生一件震懾人心的事。大公會議(1962-1965)已準備很久、也在最小的細節上籌畫過，直至你為 Frings 樞機寫了一篇演講，引起軒然大波。彈指

間，一切再度被推翻，而大會，雖已準備好各項文件，不得不從頭開始。到底實況是怎樣的？

拉內說過很多次，不要把單獨個人的角色估計得過高。無論如何，大會體積龐大，也許有些人曾給予決定性的推動，但如果別人沒有意願也要同樣的東西，前面那批人也無能為力。有人也許還未能把所要的予以格式化，但普遍的心態已然存在，都在以眼神尋找什麼。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大會的教長們來開會，不只是想通過一些寫好的文本，或者說得正確一點，只作一些非作不可的事，他們還願按照他們的角色共同奮鬥，以達致在那個時間應該說出的話。當時的一個普遍意念是：我們應該作這門功課，不是為徹頭徹尾改變信仰，而是反過來為信仰作更好的服務。在此意義下，Frings的開幕詞（此演講是以里耳的Lienart樞機的演講為支柱）只是把教長們都已意識到的予以格式化而已。

你在這篇講詞裡寫了什麼？

第一篇不是我寫的，此外那也不是真正的演講。事實上，羅馬教廷的組織及各委員會已寫好了一些議題。期待的是把提供的一些清單即刻進行票決。很多人不願這樣作。那時的Frings樞機及Lienart樞機起立說：我們不能現在即刻投票，而該先彼此接觸，看看各人按照自己的能力作什麼功課，至於投票應該留到以後去作。這是第一聲雷鳴。現在反省一下，那倒並不是什麼蠻闖。嘗試著自己找到合適的人選是正常的。由兩位樞機自然發出的這一推動回應了大會的願望。

以後又加上一件事——我剛才給你述說的歷史可能是不同事件的綱要，具體說來就是，當有關啓示的文本提出討論時，Frings 樞機——在此，真的，我合作過——作出聲明，此一文本，就其寫成的樣子，不宜作為出發點，應該全部重作，在大會集會期內重新寫出文本。這實在是第二聲雷鳴。結果是所謂的一個共同協議：我們來重寫文本。

在第三篇以後成名的演講中，曾說及（信理）聖部的方法有修訂的必要，過程應該透明化。這幾篇演講強烈地反映了公眾輿論。

你當初被視為一位前進的神學家。以教授身分來說，你那時是一顆明星，你的課擠滿了聽眾。你多次討論豁免、容忍。你也打擊羅馬新士林派的僵化，並重重譴責梵蒂岡那些負責者，說他們把教會引入了僵化，以青年神學家姿態你控告教會「把韁繩拉的太緊，有太多法律，其中許多促使這無信的世紀不知所措，並沒有助它抵達救恩」。有正當的理由可說，沒有你的主動介入，梵二的一些改革是無法想像的？

這裡，我覺得被高估了一點。如果不曾有那整個行路伙伴的團體，共同朝著一個方向前進，孤立的一人，且是一個世上沒有人認得的神學家，絕對無人肯聽，即便他是透過一位重要的、知名的樞機說話。

自從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開大公會議，使之運轉，號召向前躍進，並把信仰現代化(aggiornamento)，重植於今日世界心中

以來，大會的教長們就有了很強的意願，真正敢於創新，走出被腐蝕的學徒程式，也敢於有新的自由。由南美到澳洲均如此。非洲是否也有一個特殊的意願，我不能說。無論如何，這一意願振興了全體主教。

你所引的那幾句話我已記不清是怎樣說的，但我確實在想，士林神學，以它當時的固定型態，已不再是一個相稱的工具，來把信仰帶入我們時代的種種關注中。信仰該放下這套裝備，也該用新語言，開放地面對現代的境況。教會內，也該有更大的自由。在此，一個年輕人的激情當然也扮演一份角色。不過總的說來，在整個教會可以感覺到一種意識，即在戰後的那種新出發的氣氛中也有一份希望，現在為基督信仰也會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你本人一直強調，你要恆心努力忠於梵二，「不對一去不返的昨日有鄉愁」。另一方面，大會結束後不到幾年，你又說及一種「大會的害人精神」，並從而推出一個負面的結算。本來期望向前躍進，現在眼前出現的是一個「傾倒的程序」。有了什麼行不通的地方？

這是一個我們大家問的問題。靠摸索答覆不了，只能以實驗方式，憑著數據，予以證明。今天說「教會的冬天」的，主要是那些「前進派」人士。我們沒有活出基督信仰的新時代，而見到許多跌倒——與許多離職的人並立，這是不爭的事實。

為何這些事如此運轉過來？我願提出兩個解釋：第一，我們的期望實在太高了。教會不是我們自己所能做出來的。我們

能提供服務，但骰子不僅靠我們的行動。歷史的大潮流繼續它們的路，而我們在某一部分，沒有正確地加以評估。首先，當時有一個過度的期待，大約也不怎樣正確：我們期望見到基督信仰在廣度上擴展，卻不曾領悟到教會的時代也能有一種全然不同的面貌。

第二點，在大會教長所要，而傳給輿論的東西，與以後列入一般意識的東西之間，有相當大的出入。教長們要信仰現代化——正是經此途徑，他們也要把信仰的全部潛力發揮出來。此路未行，卻越來越給人印象，改革只不過是在卸下包袱；我們把自己的作業減輕，致使改革不像是在徹底化，而是一種信仰的淡化。

一味減輕、適應、讓步，而沒有選擇集中、簡化及深化的好路，這是今天大家越來越承認的事實。就是說，基本上有兩種改革的概念。一種在於進一步，放棄外在的權勢和各種外在因素，而更按照信仰生活。另一種，用一個幾近漫畫的詞句來說，在於使得歷史更加舒適。接著的當然就是一切都顛三倒四。

明顯的是這一假的解釋一直延伸到今天。因為，很奇怪的，大家都以此大會為號召，自視為改革家的族群如此，那些寧願列入保守者之數的人也如此。你從一九七五年就預言過，大會的遺產「尚未啟示出來，它還等待它的時令，我有把握，這一刻會來到」。

對的，是如此，有兩種對大會的解釋。但有一點越來越明朗，就是大會的諸文本完全置身於信仰的延續中。確有不少人

說，這些文本無非是在前面打頭陣的，應該由之引出方向，卻該擺脫文本。如此看待事情，已不再講大會了。不錯，不該把文本做成死文字，而是其真實內容，即一個客觀的解釋讓人認出的內容，是大會的偉大遺產。正是須由此出發而予以接受，解釋和了解。也正是由此才將產生新的衝刺，與世界建立新關係，對宗教自由有一個解釋等。

懂的恰當，裡面特別有信仰的加深和鼓勵，這是首先應該由之獲益的。我願加重說明這點：大會的真正遺產在它的文本中。如果正確地並徹底地加以解釋，就有保證糾正雙方的極端；然後真會開出一條前景好，未來多的路。

你對濫用大會的估計是否與歐洲學生運動的開端有些瓜葛？你在杜賓根的時代明顯地有過一個斷層。以前受歡迎，被視作前進的神學教授突然受到攻擊。幾名學生奪去了你的麥克風。這些事件應該使你感到衝擊。較晚，你說過：「這些年，我學會辨認哪一刻辯論應該中止，因為辯論已轉變為說謊，並且此刻為了保存自由必須抵抗。」

從沒有奪去我的麥克風這回事，我跟學生也從來沒有困難，只是跟那些副教授、助理及其他的人罷了。在杜賓根的課常很受歡迎，跟學生的接觸也很好。不過，是真的，我曾親見一種新的勢力侵入，其間一些瘋狂的意識形態在利用基督宗教，在那裡我真實發現了謊言。我清楚看見，並實在活過，改革的概念在分歧。也看到在濫用教會和信仰，把信仰作為爭取

權力的工具，但，這些都是爲了完全另一些目標，懷有的全是另一些思想和意念。一心一意爲信仰服務的志願已破裂，取而代之的是信仰成爲一些意識形態的工具，這些意識形態是虐王式的，獸性的和殘忍的。從此始我明白了，若想保持大會的意願，就須反對這種濫用以自衛。如我說過的，我本人與學生毫無困難，但我看到真有一個虐王暴政在操作，甚至用著殘酷的方式。

爲給當時所發生的事件一個較具體的概念，我在此引徵一段那些年代的回憶，這是我的基督教同事 Beyerhaus 最近出版的，我跟他密切合作過。「耶穌的十字架是什麼？不是給痛苦一種索多瑪式的上揚的表達嗎？」還有：「新約是一分非人性化的文件，在很廣闊的幅員上一個欺騙人的方法！」這兩句引徵不是來自無神的波爾協維的宣傳小冊，而是 1969 年夏天杜賓根《基督教神學》學生會在同學間散佈的一本小書，其標題是：《主耶穌——Käsemann 黨員》。他們以馬克思對宗教批判的精神責怪教會曾作資本主義剝削窮人的同謀，同時劃給傳統神學一個使系統穩固不變的功能。杜賓根當時任職的新約專家也參與其事……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的一場惡夢是，當我的同事 Ubich Wickert 和我在一次學生全體會議中，曾要求《基督教神學》學生會剔去那本小書中的褻瀆的話，可惜枉然。他們的答覆是：不，這書面對的是社會政治的模稜兩可效果，必須以真理之名首先向之宣戰。Wickert 教授的熱情呼籲：「我們中間絕不可再聽到『耶穌該受詛咒』這句話」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天主教神學》協會裡沒有那麼極端，但底下的潮流是

一樣的。我於是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誰要做前進分子，就該出賣自己的靈魂。

你的名著《基督信仰導論》以 Jean-la-Chance 的故事（Grimm 公爵）開始不是完全偶然的吧？

對，不是偶然的。那時候，想到最後幾年的動盪，這一故事就呈現在我眼前。連基督信仰也首先被視為是一個負擔，正像公爵的金沙粒。為我已十分清楚，把日益明朗的事翻來覆去的解釋，是得不償失。公爵能把當時的情況很恰當地描繪出來。不過，我在1967年寫這書，因此是在這些紛擾暴發之前。

不少人已在猜疑，這個若望、這個漢思，也許就叫……

不，這與漢思昆絕毫無關係，我須堅決地說出這點。我從未有意要攻擊他。

你無疑可成為德國叛徒傳統中的一名批判教會的高手。有誰擋住了你？漢思昆懷疑是保祿六世勸化了一些批評力精銳，準備好從事指導者的一些學者。

我一點不知道。不論怎樣，保祿六世從來沒有向我提出這類建議；我首次遇見他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即我祝聖為主教之後。至於一九七七年我被任命為慕尼黑總主教為我是一個驚異或衝激——但無論怎樣也不是為投機讓步的補償。不，即便經過歷史的塑造及我身受的其他轉變——當然也經過年齡及其不同的精神狀態——我的思想的某些色彩有過變化和發展，我的基本動力，正是在大公會議中，常是要把信仰的固有核心由硬

化的表層下掬出來，再給予這核心以力量和生機。這一動向是我生命的恒數，它使我不可能與教會壁壘分明地為敵。當然，職務給我們的思想一個重點，跟當教授不同。但為我重要的是總不離開從小就刻畫我生命的這一宗教，並在生命的基本方向上忠於它。

你本人常明目張膽地把個人放在使命後面，而不是掉轉過來。顯然，這相應於你對本分、服從及服務的看法；這些概念在種種文化紛亂中已失去威信。

但人一定會回到這些概念裡來。因為假如不準備屈服於一個承認其價值的全體，並投入為之服務，就不能有一個共同的自由；人的自由常是一個共享的自由。它該在團體中生存，因此也要求受到服務。當然，這些德操，如果我們願意這樣稱呼的話，也能用的不好，如果把它們放在一個假系統下面。由純形式的觀點來看，它們本身不一定是好的，而要看它們所服務的目標來定。為我來說，這個目標是信仰、是天主、是基督，這樣我心裡也確知這目標的位置正確。

有一個時期，你曾與神學家們對抗，也越來越強烈地回應神學家們的批評。你堅決地聲明：「這是祂的教會，而不是神學家們的實習場地。」

我無意跟神學家們對抗，因為那時就要跟我自己交戰了。神學是重要而高尚的行業，神學家在作重要的事，批評和批判精神也是其中一部分。我對抗的，是失去其準則，不再作好其

服務的神學。這種神學忘記我們來是為服務，而不是我們憑自己決定教會是什麼，這為我是關鍵性的一點。說來說去，這句話：「是祂的教會而不是我們的」，為我實在是一個十字路口，在此必須承認，構想教會是什麼不是我們的事；我們相信是祂要教會，而我們應該嘗試了解祂由教會所要的，並交付自己為祂服務。

## 主教和樞機

一九七七年，保祿六世以「神學名師」之名任命你為慕尼黑和佛來辛的總主教，不久又升你到樞機的高位。你的使命是：「在天主的園子裡工作。」當你被任命為慕尼黑主教時，你有什麼感受？

首先我感到很大的懷疑，自問該接受或拒絕。我的牧靈經驗不多，自始我就覺出有當教師的聖召，而正是在那時——我當時五〇歲——我相信好似已找到自己的神學觀，可以寫一部作品，為給神學界作點貢獻。我也知道我的健康脆弱，擔任此職務，有超出我的體力能承擔的情況。

我向人討教，而給我的回答是，在我們今日生活的特殊情況下，該接受一個乍看不像合乎你生命路線的職務。今日教會的難題緊密地與神學難題連在一起。在此情況，必須是神學家出來從事主教的服務。於是我接受了，如我的主教徽號所說的，做「真理的合作者」。合作者包含一個團體。所以是在團體中，與其他的合作者提供我的神恩，如果能這樣說的話，並

且以我所接受的神學經驗和專長來作業，使教會在此時代走向正確的方向，也使大會的遺產得到該有的吸收和消化。

最給人深刻印象的是你以主教身份接受了時代的面貌的那種方式。你的戰鬥對象是傳統與真實性的解體。你對當時四面八方製造漩渦的某些離心力予以痛斥。沒有任何另一個人把我們時代的弊病針砭得如此淋漓盡致。你教人防範財富及享樂所造成的心臟浮腫退化，你說過在許多當代現象背後能覺察出的惡魔化身的狞笑。其是時什麼東西在推動你？你沒有對未來的預感嗎？為何你要作如此嚴厲的社會批評？

今天關於教會的先知使命說的很多，這話有時用的不當，但教會不該跟時代精神結盟，卻是千真萬確的。教會應該控訴時代的毛病，喚醒其危機；應該向在權者及知識界人士的良心說話，也向那些心胸狹小苟安、對人間疾苦無動於衷的人說話。既是主教，我便覺得有義務完成此使命。除此之外，當時的那些赤字太耀人眼目了：信仰一蹶不振，聖召減少，恰是在教會人士中降低各種倫理價值，日益傾向暴力，及好多其他現象。我耳中那時響起了聖經和教父的話，他們極嚴厲地判決那些牧人，說他們像啞巴，爲了避免衝突，讓毒藥隨便擴散。平安無事不是國民的第一個任務，而一個主教，只求避免麻煩，並盡可能地粉飾一切衝突，爲我是一幅令人生厭的景觀。

你當慕尼黑主教的時期，衝突不算少，但你被尊為「傳

統人」，給人顯示「對道理的傳統有堅實的體認」。《南德日報》寫說：「在教會的保守人中，他是最有對話能力的人。」可是，你的聲望很快改變了，最遲是一九八一，當你被任信理部部長時。「所有來自羅馬的消息不會使人開心的」，你在說再見時已有預感了。

我今天還很高興在慕尼黑時沒有逃避衝突，因為不聞不問(laisser faire)是我能想像的最惡劣的完成使命的方式——這我剛才說過。至於在我的羅馬任務中，我須負責許多不愉快的課題，那是一開始就清楚的。但我相信我能說，我常尋求對話，而這也很有收獲。目前我們已組織了與一些較重要的主教團和大修會的總會長的交談方式，這樣我們能解決不少當初像是堆在路中央的草堆的問題。我們特別跟全世界的主教締結了很多積極的人際關係，我相信，雙方都爲此而心存感激。

你覺得自己適合此一職務，甚至被預定的嗎？

那是說過頭了。無論如何，在二、三年以前我連想也沒有想過。教廷爲我是一個完全不熟的世界，我跟它沒有任何關係。只在大公會議時，我隱約地見到一點，但遠遠的，背景方面的，一定沒有什麼預定在裡面。

你預先知道這位來自波蘭的，你已經認識很久的教宗要召請你嗎？

不知道。我是在一九七七年，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中認識他的。真正的碰頭只在 1978 年的選教宗機密會議中，因此我們

的相識並沒有很長時間。我跟他自然地很容易了解，但他能想到我，是我沒有想過的事。

那是若望保祿二世一人的決定嗎？

我假定是的，我從來沒有問過他。也許他問過別人的主意。但我仍想那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決定。

身為德國人，是利或是弊？

關於德國人，有許多現成的概念。有些引起人不滿的決定也易於歸給德國人的沉重精神。對一些原則的狂熱，缺乏彈性，這一切都視為德國人性質的一些特點。當他們發明一個「坦克樞機」的說法時，一定是暗示我是德國人的事實。另一方面，從沒有人對我的國籍表示過敵意，也沒有過分予以強調，至少在我面前從未如此。到處大家知道，我不搞私人政治，而常顧到整體；我所作的不單單是我德國性格的表達，而是來自教廷所設各種服務和職權的一般結構。

什麼東西使你與這位來自波蘭的教宗接近？這是緣分嗎？

首先使我接近他的是他的直率坦誠，既人性化又不複雜，還有他的開放及流露的真心。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是幽默，然後是虔誠，毫無做作，也不膚淺，可以感到這裡有的是一位天主的人。他從不裝模作樣，而真是天主的人，此外他也是個很有創意的人，在他背後有一段長長的生活和思想歷史。在這人身上海感到的是：他呀，吃過苦，為達到這一行曾須奮鬥打開自己的路。他曾活過波蘭被德國人，然後被俄國人及共黨政權霸

佔的悲劇；他涉獵過德國哲學，深深浸入歐洲思潮的全部歷史。對神學歷史亦然，他體認出一些重點，絕非人云亦云。這一精神財富及他對交換與對話的敏感是一些讓我對他即刻有好感的因素。

你們二人都被視為有高度的文化素養和敏感度，年輕又好辯。按照一位觀察者所說，你們二人底子裡是「聰明的改革家和大公會議人物，但你們的悲觀卻引你們把今日世界看得走近宇宙大災難的邊緣」。在那段時期，你們曾協調，擬定一些共同目標的細節，以引導教會嗎？

完全沒有。有一天教宗給我說，他想把我召到羅馬去。我向他陳明我的一些疑難，他卻說，我們還要反省下去。以後，在他遇刺後，我們再度商量，他說他還不改初衷。我答說，我對神學如此投入，很想有機會在一些個人作品上下工夫，不知這跟新任務是否相容。然後發現有些其他的人在我以前也做過，教宗如是說，不，那不是障礙，完全可以相容的。但我們從未討論過任何節目。

信理部一定不是最受歡迎的機構之一。誰也不會忘懷它是出自中古時期的大法庭的。你打算給你的新任務什麼方向？

為了改變個人決定的習慣，首先我想盡可能地強調團隊工作，並加強每一服務的重要性。我也要保持與神學家的對話關係，但也要與主教們交談，因為我們直接的談伴其實是主教

們，到底有多大成就我說不上來。無論怎樣，為加強與主教們的接觸，我們已作了不少。我已走遍各大洲，與各地的信理委員會及主教談話，目前又要從頭開始，輪流運轉。在主教來羅馬述職時，我們加緊碰面，並嘗試擴大諮詢，特別是神學委員會的功能，並盡可能的把最多力氣保留給聖經委員會。這些就是我的方向，我要努力繼續下去。

你有過影響教廷運作的誘惑嗎？

這是我比較疑懼的事；當人想凸現些個人的因素時，容易在他所盡的職務裡引入太多自己的因素。但我也反省教會的困難，給它提供我的協助，並把我所能作的讓它處置，這是我的作法。

這裡也有權力的感受嗎？

是的，但比例非常小。因為今天我們所能處理的權力實在微不足道。我們常能作的是申請主教們，而主教們又得從他們一方面申請神學家或修會會長。我們或能嘗試對話。當然也有一些紀律的手段，但我們盡可能少用為妙，我們並無行政權。任何情形，常須有一個共同的善意，並大家願服事教會。

我是說，個人方面保有權力的意識。

就這樣說吧，客觀上整體來說，也能是一種權力，但我不覺得在處理一個特殊的權力。講到最後，我們手中的武器只不過是討論和訴諸我們的信仰。除非教會支持我們所開創的，而其他有關人士也予以承認，我們的工作不會有什麼重要性。是

否是個有權力的人這種感受我很少有。

在你去羅馬前所講的道理中，你曾把自己比作一個懷疑論者，後者領悟到在空中撒種，並自問：「這一差使其本身有必要嗎？」還說：「我們不需要另一個教會，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聖部嗎？他也感覺到日益沉重的孤獨的重擔，他自問，放棄婚姻本不是他最初的意願，而只是為了另一個召叫而接受下來的，是否有意義。他四周一切都暗淡下來，最後他想做一個像別人一樣的人，恢復自我的面貌。」有人試著在這個懷疑論者及講這故事的樞機之間畫一等號。

不幸我已不記得這篇道理。當然，有信仰的人也該向自己問一些問題。在我的《基督信仰，昨日和今天》一書裡我曾說信仰從不壓制問題，信仰若不自曝於這些問題，自己也會硬化。不是一些虛構的問題，而是我應該向我自己提出的問題。當然各種問題能說已包含在信仰的基本信賴裡，這信賴不把問題放在一旁，而在某種方式下含括了那些問題。

## 部長和他的教宗

按照聖教法典，你的聖部的職守是「推進健全的道理……醒寤以糾正錯誤及引迷途者入正軌」。這一定不是一個愉快的角色，須追蹤一切，不斷勸人，建起雷厲風行的王國。但一般也認為信理部是毫無彈性的部會，也

看不起別人。

誰跟我們接觸，不難看出我們不是一些怪物，而常盡力找到合情合理的解決。像任何社會一樣，教會也該在一些個人的權益與團體全體的好處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在此，教會倚重其力，並使教會凝結的好處是信仰。一方面我們應該保護那些不能以知識保護自己的人——針對一些危及他們生命根底的知識傷害。另一方面，我們的工作倒過來要求對那些造成傷害者的權益予以尊重。我們所用的，並常在改進的一些法律程序就在於使兩者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

此外，我們盡力不用懲罰處理事務，並以對話尋找解決，讓造成傷受害者更好地自我解釋，比他直至目前作過的更好。我們跟每位主教或修會會長接觸，他們再去跟有關的人對話，這樣不必雷厲風行，卻使思想好像向前走了一步，以後繼續發展。

你有一個四十人左右的智囊團，為一個十億人口的基督徒團體這不算多。你從哪裡獲取資訊？你們怎麼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

資訊的主要來源是各國主教團及跟主教們的會晤。加上許多神學出版品，我們設法透過雜誌和書本加以了解，並即刻把這種種資訊通知各主教團。每位合作者有其個人部門，這裡他從自己方面接到很多資訊，部分來自神學家們，部分來自跟我們合作的廣大人群，或是那些透過主教團或主教們自己跟我們溝通的人。

你必須個人審視一切，躬親作這一切嗎？比方，新要理

由你親自執筆嗎？

不，那是我絕對作不到的。我應該調整以團隊所作的工作，並將之指向一個方向，讓它出來一個東西。為新教理書，我們有一個多層的結構。工作的特別機構是一個由十五位來自各大洲的主教組成的委員會。然後這機構指派了八位主教，他們才是真正的作者。再找出一位總編輯，負責協調全部工作。因此可說我們大家都是作者。此外，整個期間有今天所說的輸入(input)即很多資料的輸入。我曾親自給所有的主教及主教團寫信，而我們接到的回音來自一千多位主教。

你們也曾接到平民教會的「輸入」嗎？

我們假定一個主教不只給予他人的意見，而在提供教會的信仰，因此也是他教區的信仰，且說出這信仰如何活出來。我們無法詢問十億天主教徒。主教是代表，他在那裡是爲了全體；因此確有把握，透過一千位主教，信友們的聲音會傳到我們這裡。

在這部教理書裡有些說法或格式你個人認為不太高明嗎？

是的，顯然不是全部一樣地成功。

你能舉一個例子嗎？

不，目下我舉不出來，必須參考文本。不過我相信這部要理，整體來說，是一部佳作，深入，又很容易閱讀，就如不斷有人向我們肯定的那樣。很多人——不是神學家，而是布衣小

民——給我們說他們正在讀，並且讀得懂。接受的程度，在德國因了多方面的理由，大有保留，但在美國——一個頗有批判精神的地區，已賣出二百萬本。在亞洲，這才開始，在南美、西班牙、法國都很受歡迎。別的不說，只看其教父的豐富材料，你在這部書裡就有一個珍貴的索引寶庫。當然，既是一部多人寫出的書，常能加以修訂，但仍不失為一部佳作。

你發現這部作品有特別成功的地方嗎？

我想一開始的導論，講信仰問題的地方，結果很好。論教會及聖事的幾章，大部分也很好；還有禮儀神學——有許多卓越的禮儀專家曾一起合作——十分美麗而生活化。討論祈禱的部分亦然，其風格非常特殊，我相信是成功的。

為寫成目前的這部作品曾花多少時間？

差不多花了五年。一九八五年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表達了這個願望之後，教宗於次年成立了委員會。我們在那年秋天開始工作。六年後，於一九九二年，終能公佈這部要理。

關於你部長身分的工作：你有什麼保證知道信理部的決定是公道的？

第一個保證是，我們自己不發明什麼，我們隨從信仰大師反省的路線。第二，在廣泛取得意見前，我們不具體作什麼，也不接受孤立的意見；只當在一個有代表性的顧問圈裡突出共識時，才作決定。重要的是不要跨越我們在信仰中已可處理的事——這事當然該實現出來——，並看出意見一致的成立在於

一個合理的半數。

你以默禱準備你的工作嗎？聽說你多把事情內在化，你單獨一人反省，你在聖神內工作。有一次你曾說，有關某某難題你還該默禱。這要說的是什麼？

清楚的一點是，首先應收集資訊，這常是第一步：打聽該問題的現況。然後須在自己的內心自問，把握全局的邏輯，為操作難題，達到對它的了解，並把它放入整體的關係中，也將之整合於祈禱中，我想應隨的步伐是，由資訊開始，然後是操作，當然也有對話，最後還有再次的反省。

某些靈感為你有多大重要性？如何予以接受？

靈感不能予以激發，它們應該自己來。我還得說，對各種靈感須很明智，應該能在整體的邏輯中予以驗證。此外，一個「靈感」的先決條件是不在狂熱的狀態中，而是安靜地反省，並讓思想有足夠的時間在自己心裡成熟。

你剛一就職，就該為解放神學操心，並勸戒一些懷疑教宗不能舛錯或批判其他信理的神學家。你的進行方式長久地刻畫了你的形象，至少在有關德國的事上。事後想想這一切，你沒有反應的過分激烈嗎？即便假定你給了好的答覆。

我要區分那些個人的反應和我們官方作的事。說在一個私下爭辯中，我有時反應的過分激烈，我甘心認帳，但在聖部身

份所作的事上，我相信，我們嚴守分寸。有關解放神學，我們當時必須干預也是爲了幫助主教們。最後，危險在於信仰政治化，將信仰推向政治的偏激上，而摧毀了它本有的宗教性。今天大家都承認我們的那些詔示是正確的，走向好的方向。我們給予的那些指導所發生的正面推動的一個閃耀的例子，是顧鐵雷神父所走的路，他被視爲解放神學的創立人。我們與他交談——一部分我曾親自參與——而達到較好的了解。幫助了我們了解他，他也承認其作品的片面性，並真實地繼續發展。從此以後走在一個合乎「解放神學」對象的形式下，而前途光明。

當然，有些衝突點當時未能調解。其間，解放神學的問題在世界的整個佈局裡已完全變了。但如果向過去這十五年回顧一下，應該說，我們所作的那些干預客觀上是正確的，也揭示出來是一股助力，也許不在第一剎那，但長期下來會是如此。今天，一些起初頗表懷疑的主教團體也發現那是一筆清楚的收入。

但是那兒並不只有對話，還有過那些強制緘默的年份，用緘默作補贖。

「以緘默當補贖」的說法是在德國發明的。我們只簡單地說過，他們一年內不該講論這一題材。而要加以反省，也不要再到世界各地旅行。好吧，常可討論這種安排是否恰當，但客觀說來，請一個人對如此困難的難題作較長的反省並不是一件壞事。如果有人給我說：你不該再長篇大論地繼續講這一點，不要繼續拼命發表，卻讓事態在你身上成熟一點，也許這爲我們每個人都有好處。我現在不要討論這些安排有沒有基礎。無

論如何，Boff有許可教書，只是那一年他沒有教。他只是不該在他的課程和書中碰這個特定的主題，而讓它停一年。多少跟漢思昆的事一樣，當時保祿六世請他不要對不能舛錯問題再發表什麼，而要對此主題重新反省。

漢思昆顯然沒有意願答覆這一要求——Boff也沒有。人有理由提出這問題：這種安排有利於教會的聲望嗎？

那一事故在世界上傳播開來，事實上沒有什麼好處。這其間很多人有關各種歷史發展及 Boff 所走的一些路也許已作過反省，關於他我不願冒昧地下判斷。

那漢思昆呢？他現在希望得到平反。

這裡就有必要剔去一點神話了。漢思昆是一九七九年被取消以教會名義被派教書的資格。這為他可能不是滋味，但正因如此他找到了自己個人的路。他解脫了在神學培育及相應考試的框架中執教的責任，而能完全專心於他的各種研究題材。一九八二年我們有過的一次晤談，他承認他不願回到從前的職位，並說他當前的境況為他本人要適合得多。他漸漸遠離專門神學的狹隘問題，而能找出並發揮他的一些大主題。現在他已退休，再以教會名義給他教書的職務要比以前更加悖理。不過這當然不是他所關切的。他想要的是他的神學被認可為天主教神學的一個有效形式，同時他在對教宗職位的質疑上不但毫未讓步，反而更極端化。在基督論及聖三的道理上，他也遠離了教會的信仰。我尊重他走的路，他是按照他的良心在走，但他不該要求得到教會的蓋章，而該承認在一些基本的問題上他達

到了一些別的決定，完全是他個人的。

你經常要求人看清事實，對現代精神表現不苟同。你對教會及世界經歷的一些現象所作的各種分析不少次已證實為真。雖然如此，在輿論上，也在傳媒上，這為樞機的形象沒有收益。這一事態是因了你闡釋你的觀點的堅決，是因了你所用語言的嚴峻？

我是最後一個能知此事的人。我也不知道我有過多少留心的讀者，這些讀者中又有多少人有好記憶力。因為當一些事故澄清了，很多人已不記得這些澄清的事證實了我當初所下的診斷。原因是把我這個人與部長的職權同化了，而那對這整個職權及對訓導權本身的厭惡也就濺到我身上。這樣，很多人在我所說的一切上看到基本上想控制人類的一個機關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真實坦誠和知識性的願望，想了解世界和人類。

常有理就夠了嗎？我是說多次一些正確的決斷也應在正確的時刻到來，並且用好的形式說出來。俗話說，是聲調譜成音樂啊！

對，我完全接受批評。我也設法盡我所能的作得更好，準確的說就是找到交談的坦途，這交談可由主教和修會會長們予以加強。但這基本上不排除，有時一定還得採取一個決定性的措施，即便不合民情亦然。

你是部長，不是位負責牧靈的司鐸。比方一個負責青年的校牧講理、作事都和他假定是指導一個天主教信仰委

員會所該作的不同，一旦這樣，你可以接受嗎？

當然可以。他總該用別的方式說話、講理，否則青年人再也聽不懂他。各代之間也有其韻律，這是應該加以了解的。信仰是一條路，必須體認各驛站。為保持我們之間的凝聚，必須排斥傳遞私人的意見或今天流行的集體意見，卻該作為一個信者和司鐸，停留、執著於教會的信仰，並嘗試在具體的脈絡裡正確地予以傳遞。

這是說，一些在世間實習牧職的青年司鐸，為正確宣揚教會的性倫理有時遭遇難題，如果一天他們說出一兩句不中意於你的話，可以原諒嗎？

當然可以，如果基本的向度不缺，一切都有賴於此。沒有人一舉就找到中道。

樞機也許可談性嗎？

是，無疑的。一切屬人的事他都該談，且不能把性隔開，把它劃歸到「罪」的範圍裡，性首先是創造的一分恩惠。在我目前的這一行，我甚至應談的很多。一定我嘗試避免把倫理，甚至基督宗教縮減到第六誡，但基督信仰所面對而也會到達我們這裡的那些問題逼著我們關注人類生存的此一領域。

有一次你稱性是一種漂浮著的地雷和無所不在的力量。這聽來頗消極。

否，事情不是這樣，否則有違信仰，信仰告訴我們天主造

人是在其整體中，人是在男和女的形式下被天主所造。因此性不是犯罪以後才產生的，而真實屬於天主創造的計劃。把人造成男和女，這等於說造人是具性別的；性實在整合到創造的原初概念中，因此整合到人的本善裡。

如果我曾用你所引的詞句表達過，那是要說，有些雄厚的力量，一旦脫離了它們的人性原理，也能展開十分強大的摧毀能力。既然性形成男女的肉體部分，由此而刻畫人的最深本質——正因為性如此重要，沒有性，人不算成熟，也不能成為他自己，一旦性走出了人的統一，也能撕裂人、毀滅人。

實在應該承認，把性視為無所不在的力量，這些年頭越來越風行。

看來，拜技術與傳媒之賜，把性由人的統一，並由男女應該形成的一對中拔出已成爲可能的，其方式是以前未有過的。今天真能把性中立化，而當作貨品行銷。

老實說，這是兩千年來一直有的事……

對的，是呀，但打入市場，開店直接賣性，而引發圖像的泛濫，把人視爲性物，是以新的質量發展開來。把性當作貨品的可能性，並大量地予以擴散引發人的自我疏離及褻瀆神聖，這一切都超過了至今所有的認知。

中古世紀有過公娼館，有的甚至由本地神職予以部分指導。聖奧思定也自問：現在，怎麼辦？他答覆說，人既然是這樣造成的，為了國家的完好組織，更好把這事也

組織起來。所以關於這一點，完全可以引用一位重要教父的那些反省……

……一位重要教父的一些反省，他曾足夠現實地看出人常在此領域受到誘惑和威脅，並有整套的一些崇拜這樣被扭曲。但是我相信教父以後有一個特殊的威脅，是古時所沒有的。

按照天主教性倫理的教導生活的人，對這些誘惑就得以免疫了嗎？

不能這樣說的，因為人總不能一成不變，而是像我說過的，常在路上，因此常受到威脅。人應該不斷地成為他自己，總不會在那裡不動。人是自由的，而自由從不知道有終點。但是我想，某人若是一個活生生信仰團體的一分子，在此彼此交往，這個在團體中互相交往的事實帶來鼓勵，他能把他的婚姻活得好。

在你的職務中，對某些問題你有所畏懼嗎？——也許是因為無法予以答覆。

「畏懼」也許不是恰當的詞字。但事實上我們不斷面對一些難題，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找到好的答案。特別如果這些難題屬於倫理領域，尤其是醫學倫理，但社會倫理亦然。比方，美國一些主教曾問我，為臨終無望的病人是否應該給予水和營養直到最後一刻，這為那些負責人十分重要。一則，這確實是他們所操心的，其次，也得為所有醫院找出共同政策。終於在很長時間研究這問題之後，我們不得不首先在地區的層次上予

以答覆，因為對此題材我們尚未達到完全確定的地步。

正是在醫學倫理的領域，會不斷見到一些新的可能出現，因此也有一些新的底線，其間一些原則的具體應用不能完全明確地看清楚。那時我們得說：你們首先彼此研討，好能一層一層地在多種經驗的脈絡中，我們獲得需要的成熟，以達到某些確定性。

但你想會有，且應有答案嗎？

不是一定常有普遍性的答案。我們也努力分辨我們的限度，並拒絕答覆不能回答的問題。像我在剛引過的那些例子裡說的，我們並不尋求到處給予答案，但問題真實地會提出，而一個尋找方向的諮議會的必要是存在的。但這不是強制套上一個系統，為我們所遇到的一切找些答案，相反，是尊重一個事實，即許多有心接受一個共同責任的人面臨著一些底線的情況。

這個路線我還是完全不懂，也不知道可以用什麼工具解決這些複雜的問題，這類問題一定會越來越多。

有些基本原則是確定的。在此個案，原則是：人之為人是從頭到腳是人；我們不處理人的生命，而該尊重它視它為已存的事實，尊重它的尊嚴直到終點。可見，某些原則是存在的，不多、簡單，但很重要。可是，目前醫學和技術的許多可能產生了些底線情況，其間得問如何把此原則應用恰當。在此，首先，資訊是重要的。醫生們應說明各方知識的狀況，及由之而生的種種難題。

以水和營養為例。到了一個情況，已無法給病人進行醫

療。某些人開始說，以打針或點滴非自然地給人提供營養，是酷待病人。另些人說，不，讓人渴死是不人道的，是真正的殺人。這兩個面對難題的方式互相矛盾。我們必須盡力得到需要的資訊。醫生當然應該對他們的知識現況作長篇報告。當各方資設漸趨一致，許可一個綜合時，可以問，現在有什麼與原則相應，並且如何正確地加以應用。當一方面資訊正確，另一方面原則應用的恰當，這些共同經驗形成時，才能慢慢地達到一個結論，說在如此如此條件下，原則應用得正確。

也能參考古代著作來解決我們的現代問題嗎？我是指教父們的著作，聖人們的著作！

在基本的意義上可以加以運用，因為它們說明一些原則，尊重人和人的尊嚴有何意義，痛苦有何意義，可是為一些很具體的問題，不能乞助於它們。我相信，這些著作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這一代已失去痛苦積極一面的意義。在此，實在有些東西我們得重新學起。

我們既然在談古代文本，你是否在「監察聖部」的那些洞穴裡碰到一些秘密？其中有永遠不能洩露的事嗎？

「監察聖部洞穴」就是我們的檔案，這是其真正的名字，我們沒有別的洞穴。我得承認，我是個不大用檔案的人，最簡單的理由是我沒有空，也說不上碰到什麼了不起的秘密。事實上，拿破崙劫走了我們的那些檔案，後來一部分還給我們，但只是一部分，已不完備。一般說來並不怎樣有趣，離人們所期望的更遠了。有一位完全自由派的意大利教授最近研究一些訴

訟案，他說令他大失所望。他想找的是良心與權力的大戰，結果找到的只不過是普通的罪案。這來自一個事實：羅馬監察部曾是一個相當寬厚的法庭。這樣，有些被押至民間法庭的人自我控告宗教罪行、巫術或占卜，好能轉送監察部，這裡他們普通能得到較寬鬆的定讞。不過這點，我有的是二手貨，我沒有研究過原典。

這些檔案中的非常事件整個人類都知道，其餘較是專家們的興趣所在。除了蓋以告解之印討論過的某些事情之外，沒有什麼不能揭示的，前者受到告解秘密的保護，存放在一個特別的庫房裡，不該予以公佈。

但如果那些事情受到告解秘密的保護，為何要以書面固定下來呢？

那些不是狹義的告解，而是屬於良心內在領域的一些事，因此受到同類秘密的有效保護。我想如果一個人支持一項神學錯誤，可是以公開討論的，這和一個人有深度的倫理和個人難題，不可同日而言。

我假定這些告解秘密不是一般人的，而是歷史中的權貴們的。

關於這事我知道的太少。今天我們還有一個紀律部門，處理司鐸們的某些缺陷。這些個案只有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知道，而為使保護個人得到保證，是不能傳開的。這裡所說的就是這麼回事。

但那些有名的預言秘密不也是存放在這些檔案裡嗎？

我只知道法蒂瑪；有沒有別的預言，我一點都不知道。

誰可以看那些秘密？

關於法蒂瑪，教宗本人和信理部部長，爲其他秘密須有教宗親自的許可。

看過這些秘密的小圈子，人數可以估計嗎？

一定可以，不該多於三、四個人。

有關法蒂瑪的預言，你有一次甚至說過，「是耶穌自己在號召我們，當祂毫不猶豫地給我們說：『如果你們不悔改，你們都要喪亡』」，那一預言使你震驚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爲它不超越基督信息本身已有的內涵。

但我相信那是世界終結的問題？

我現在什麼也不能說。無論怎樣，我不曾認出任何恐怖來。

日期呢？

也不知。不過我不願進入其他細節。

有時人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沒有拉辛格樞機是無法想像的，拉辛格若沒有教宗亦然。你被視為天才神學家，接近一位哲學家。有人說，總也不知道教宗的目標是什麼，也不知道拉辛格的意念是什麼。你深深刻畫了這一任教宗職。沒有這一渥蒂拉與拉辛格之間的特殊聯盟，教會在此千年之末的發展會是另一個樣子？

不說自明，這是一個我不能回答的問題。但我願防禦把我的角色看的太重。當然，我有一個重要的課題，教宗信任我，我們常一起討論非常重要的道理。因此，在教宗的一些官方聲明中我也有過話說，而作過貢獻，這一定影響過教宗職。可是教宗有他完全個人的路線。

在我來以前，他已開始這三足鼎——有關人類救主，聖神及天主仁慈的三道通諭。加上社會倫理，他寫過三道通諭。這些都產生於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及哲學。鼓舞他的大公主義的迫切意願深深植根於他的心靈及人品。「植根」一詞也許不夠有活力，我要說的是，大公運動在他身上作工並行動。另一方面，他的確對那些要處理的大問題跟我交換過觀點，但不僅跟我。在這些交換中，一個深度的內在和諧浮現出來。基督宗教和人類將會判斷這為它們是好是壞。

在教宗和他的首席信仰護衛間有過嫌隙嗎？你曾跟教宗唱反調或對抗過？

狹義的對抗不會有過。有時在交換資訊中會互相糾正，說

某事正確或不正確，或承認某一事例尚未足夠打聽。或者在嘗試討論一個問題時發現一些貌「似」神離的邏輯。但狹義的嫌隙從來沒有過。我也從來沒有向他表示過拒收。

那麼，你們的合作有什麼具體表現？你們多次見面嗎？

首先有辦公的韻律。照常規，部長每週五晚上覲見教宗，把樞機聖部的工作成果傳給他。手邊有存檔資料，我們討論成果，然後教宗採取決定。此外，有非常情況時，可有例外的會。

保祿六世已常把週二空出來，現在的教宗重拾此一習慣，他利用它來開一個圓桌會議，在午餐前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然後參與者與他共進午餐，如此由中午至三點鐘大家可以一起討論。這一點相當規則性地做著，這是第二類會晤，會議圈稍大一點，而週五的覲見，是部長單獨見教宗。

教宗按照各種需要召集不同成員的圓桌會議——比如某區的一群主教。每人簡短說出自己的觀點，由此來討論。教宗願意先知悉各種資訊，了解各方的不同理由，再讓好的決定慢慢地出現。因此，兩個重要的會晤是週五的覲見，及這些中午的討論，其間互相交換意念。

你能由討論過的題材中舉一個例子嗎？

一切馬上要作些決定的事都是，那能是解放神學所提的問題，或神學家在教會中的功能，生理倫理等：一切屬於聖部的題材。

如果討論的是些大計劃，會以有規則的間距傳閱一些文件。比方，準備寫一道通諭時，首先討論該用什麼方式予以面

對。然後寫第一份草稿，大家一起來談。一些大的題目從來不會好像出其不意地呈到他面前，而是在好多階段徹底討論過的。教宗追蹤各階段，並且也有所干預。

他以後問及發生過的事嗎？

如果我們不予以報導，是，他一定會的。

作為國家元首，教宗是歐洲最後一位至尊的教會領袖和宗徒之長的繼承人，他是信仰的最後依據。梵蒂岡被人看做過時的東西。聽說是一圈賽程外的老人，自滿自足，對圈外團體的顧慮和困厄不關痛癢。有一個例子，他們說，是梵蒂岡的成語式的緩慢，無限遙遠地在世界後面蹣跚蹣跚行。你是裡面的人，你有怎樣的梵蒂岡形象？

我們現在把梵蒂岡國分開，教宗是其國家元首，因此理論上他確實擁有一切權力，但事實上他並不操作其指導者職權。是一個叢爾小國，可是自然也有其各種管理的職務，為執行這些職務，有一位所謂的行政長官(governatore)，一種梵蒂岡特別的行政方式。目前，合作者採用代表式，使得行政的各種方式已不像一般所想的那樣老舊。

為答覆你的另一個問題：教宗是信仰的第一位守護人，沒有錯，但他不以絕對至尊作決定，而藉聆聽世界主教團的意見。是真的，某種緩慢是梵蒂岡所特有的，最簡單的解釋是許多決定須經過很多機構，而這也與要求準確的責任相應。另一方面，這一緩慢也來自人手的有限，在一個要同時處理這麼多

事的地方，不能使一些個別的案件很快地前進。我倒不把這點看作不利。在像指導教會的這種事上，匆忙會壞事，而忍耐是一個好工具。也有不少問題所以得到解決，是因為先讓它們走下去，而不太快地加以干預。

樞機圈是一群老人，或一些不再年輕的人，沒有錯。好處在於，那些一般的決定不是慌張作出的，這裡有很豐富的生活經驗，能使人明智。一定，也該警覺，讓年青的因素有所代表。有一普遍規則約定，進入我們之間的合作者年齡不該超過三十五歲，也不該永遠留下來，這樣使合作者的平均年齡也帶來其他的面相。

聽說在梵蒂岡，主要的是知道權力的遊戲是怎樣進行的，並且應該學習參與遊戲？

這一側面也能找到：執行一個政治行業，嘗試在適當的時刻側身於有利的一面，好能往前走，而不被猛然地拋開。這類事都存在，因為我們究竟都是人。我該說，我本人對這些知道得很少。我以樞機身分進來，沒有必要參加遊戲以爭取權力或尋求職位。我對這些也沒有多大興趣。

在梵蒂岡有沒有令你不自在的事？

我相信行政可以縮小一點，雖然在此我沒有具體的建議可提供。有些辦公處設備不是很好，並且既然是一個普世教會，行政也不能過於沉重。無論如何，可有真正的理由來問，某些官僚的縮減是否會有好處。不過整個說來，我對我們部裡的生活很是滿意。令我個人為難的，是要作的事太多。因為若願腳

踏實地的話，難能讓一個人作完這全部的功課。我不斷問自己：我怎能盡我在其他聖部的責任，而同時還像個人，並不讓那些人際來往完全消失。

那麼你參與多少部會？

五個聖部、兩個議會及一個委員會（拉丁美洲的）。但只有主教和傳信兩個部要求恒久的工作。合一議會、東方教會部、教育及文化部不那麼規則性地要我參與，但也相當可觀。其他的一些名銜，為我幾乎不存在。

Marcinkus 總主教有一天提及「長舌村」，他如此描繪梵蒂岡：「三、四個神父剛聚在一起，已經在彼此說長道短了。」

普通在我面前沒有這種事。可是不難了解，那麼多人緊湊地生活在一起，又彼此都投入許多互相關聯的事，閒話也就多起來。這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說是對的，但我在此也看到人類無可奈何的限度。這裡，必須排除把司鐸太理想化的作法。我相信，我們應該體認，讓羞恥帶來救恩，我們跟別人並沒有多大區別，而群體的一些典型法律也會在司鐸的聚會中大行其道。每人應該個別地嘗試攻打這一點，我們大家一起要給自己定一個嚴格的紀律，這是需要的。不過我相信，放棄一切自負，並強迫自己承認我們是跟別人一樣的人，這已經很不錯了。

## 撮 要

從你那裡總是不能得到一些易於運用的規定，幾十年以來你都反對這一趨勢。有時不是要問，一事是否作得恰當，一個句點放得正、誤，一個表達合乎時代？

這，在任何情形中都應該問。但，感謝天主，將有別的一些人，以別的方式將這表達出來，他們要作我本人所作不到的事。人變的更謙和，學著認識自己才能的限度。可見只是提出一個貢獻，其旁許多其他的應該現形。在一些作反省的人身旁，在一些任職的人身旁，最重要的是應該有些有真實神恩，使生命燃燒起來的人士。我當然嘗試著在這多方的關係內，看我的工作的重要性，而自我批判在此就不是一個附件。

如果你流落到一荒島，只許攜帶兩本書，一次你曾答說，那就是聖經和聖奧思定的《懺悔錄》。拉辛格樞機打算寫什麼《懺悔錄》？

我不必寫那麼重要的自白，像聖奧思定的懺悔錄，他在闡述他的一生及他走過的路時，實在說明了整個基督徒的存在。我能留下一些不起眼的片斷。這為人類將有點意義或只是瞬息間有點用，我讓問題開放著。

如果你能再來一次，也有某件事你會想望不曾作過嗎？

沒有什麼我企望不曾作過的事。在許多點上，目前我會作

的不一樣，因為在生命的不同年齡中，一些遠景是會變的。

常常有的印象是你願意保存什麼東西，就像父親願保存他辛辛苦苦建立的財產一樣。即便不是為他自己的孩子——他們顯然不知道予以尊重和善用，但至少孫兒輩得以佔有而不致把產業浪費。回顧一下你的部長工作，比方你曾阻止過一些有害的發展，而輿論界對之從未報導過？

為孫子輩保存一點什麼這思想我覺得很美。因為這實在是我所關切的，使信仰這個珍貴的寶貝，連同它照明的力量，及由它出發在我們歷史裡長大的美好東西不要遺失了。說這一點是可行的，並且人看得出，我覺得太好了。至於評估一事，我的意見是我們有關解放神學及生命倫理所作的一些聲明及新要理，對最後這十五年的那些發展作了一點小貢獻。一切的龍頭是，與各主教團的接觸產生一個相當大的互相了解，也幫助主教們共同反省他們的使命——在他們之間及跟羅馬之間。這樣終能把一些能帶來危險的排斥性的觀點予以平衡，常看其重點，而由此出發，把重量分配得更好。

在一份你簽署的文件裡，你曾引用保祿使徒的一些勸勉，他說：「要傳福音，不管時機理想不理想都要傳，用最大的耐心勸勉，督責、鼓勵、教導。時候將到，那時人要拒絕健全的教義，隨從自己的慾望，到處拜人為師，使能滿足他們發癢的耳朵。他們掩耳不聽真理的

話，卻傾向荒唐的傳說。但是，你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謹慎；要忍受苦難，做傳道人應做的工作，忠信履行天主僕人的職務。」（弟後四 2~5 現代中文譯本）

我無意做自負的樣本，但我敢說，這些話裡很切要地說出了在我們的時代裡我所夢想的生活模範。

你有某件事可當做問題中的問題嗎？如果你能向今日的世界發問，你會問什麼？

我想要提的問題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問題：為何這世界是如此，此一痛苦有何意義，如果天主是全能的，為何惡勢力有如此的囂張。

一個有你的高度、履歷、廣泛的人，以你的思想、行動及信仰的方式，為信理部主委這地位，無疑不會有更適當的人選了。跟你一起即將結束的不僅是一個世紀，還是植根於十九世紀的一代。你說過，「新世界已跨步前進了」。你對你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有何看法？你相信給新世界開門已到了什麼程度？或者須等下一位，即你以後的那一位來作？

這一切我要大大予以相對化，且要說：以後要來的那些人有何高度，我們等著看吧。這將是些很不同的時代，那些人物也會有另一種性格。至於我將在歷史中有的分量，現在還不知道。毫無疑問的是，活過本世紀的人，穿越了一個許多大變動

的時代，並以某種方式也碰到了過去。在此期間已消逝的一切，今天仍然與之有一種很生活化的關係，也是確定不疑的。由於我們被投進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前進中就有保持一延續性的必要，這就是我曾嘗試著作的。今後的種種歷史發展會揭示這點為一關鍵立場嗎，這該是一個開放著的問題。我們這時代的巨大變動是有目共睹的，但以後要來的大遠景我們卻看不到。我想，我當盡的職務在於駐足於這一連續性，使它前進，同時將它切入這一個越走越快的歷史中。

一般說來，人們猜測有兩個拉辛格：到羅馬前的一個是進步的，到羅馬後的一個，是信仰的守衛，保守而嚴峻。人也說，從前那個帶著前進色彩的「少年」神學家，成了一個委順的保守者，偶然還有些默示錄式的神見。你本人有一次也說過，若瑟拉辛格會永遠忠於他自己，即便別人變了，走了。

關於這一點，我想我已說過，就是我一生的基本抉擇是延續的，信基督內的天主，並盡力準此生活。這一抉擇在生命過程中不停地發展，而我也覺得它沒有被凍結在一處是件好事。生命的不同年齡改變一個人，七十歲的人不該裝作十七歲，倒過來亦然。因此我願忠於認為重要的東西，而又足夠地開放，以看到該有的修正。一個人四周所發生的事會改變他的立場，他突然發現自己在另一種關係網中。三十年前在教會裡所作的討論與今天完全不同。不同的環境給一個人所作和所說的完全另一種價值。我不否認在我一生中有過發展和變化，但我發

覺，發展和改變是在一個基本的認同裡發生，也發覺，在改變中我曾嘗試忠於我心中一直持守的信念。有關這點，我同意紐曼樞機所說的，生活就是改變，誰的應變能力強，誰就活的長久。

為你所盡的每種職務都須付出代價，而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服務真理這樣崇高的任務。

服務真理是一句偉大的言詞，而監督這一行的是那「最高的意願」。但付帳當然是用小錢，透過很多、很小、很簡單，隱在背景後的事。對真理的意願基本上存在，但事實上我該寫信，看資料，討論等。

為我，應付的代價是不能完全作我所想像的事，就是以思以言參與我們時代的屬靈大辯論，發展一套自己的作品。我必須沉浸在種種細節和許多衝突及爭論的事故中。一大部分我感興趣的事，我必須放在一旁，而投身服務，並接受分攤給我的功課。我也必須解開一定要念要寫這個或那個的意念，並承認我的使命是在這裡。

你現在跟你的生活協調嗎？你是幸福的人？

是，我的生活是協調的，因為起來跟自己作對或反對自己的生命毫無意義。我相信我能作點有用的事，雖然跟我所預見和所希望的樣子不同。我對天主所安排和所塑造的這個生命真正心存感激。

信、望、愛，這些樞紐德行，在拉辛格樞機的生命中有

## 何意義？

關於信德我講了很多，信德首先是一個根，生命是由這根發展開來，是領悟天主和擁抱祂的基本抉擇。也可說信德是一把鑰匙，打開其餘一切。

信德意味望德，因為現在這個樣子的世界並不完美，也不該停留於此。如果由純經驗的觀點來看世界，能叫人想惡是世界上主要的勢力。基督信仰的希望意味認識惡的存在，但仍然懷著信賴走向未來。信德的原理是接受自己被天主所愛；由此出發，信德不只意味向天主說是，也向受造界，各種受造物，特別是向人說是，努力在人身上看到天主的肖像，因此而成爲會愛者。

這不簡單，但基本上說是，深信天主造了一切人，並在人的背後，人不只有消極的一面，愛就能找到存在的理由，而由信德出發，建立望德。望德對我們受到威脅的歷史有一分信賴的因素，但它與烏托邦毫無關連：望德的對象不是一個要來的更好世界，而是永遠的生命。等待一個更好的世界不是生存的理由，因為這個更好的世界不是我們的，而我們每人應該與自己的世界，與自己的現在相協調。未來世代的世界將由那些世代將享有的自由予以基本的規畫，我們能預先設定的非常有限。但永生是我的未來，因此是一分刻畫歷史的力量。

## 第二章 天主教會的諸多問題

### 羅馬的左右為難

還有千千萬萬的人來參與教宗在其旅行中所舉行的彌撒，但這些人群的集會對教會的真實狀況不能算是報導。由1984年始，關於教會的情勢，你說過一種頹勢。現在好像可把天主教比做宇宙的著名黑洞。像一顆星死了，其中心長久以來看不到什麼，然後漸漸萎縮到一個侏儒的大小。其存在還能發現得到，但只是透過其從前的巨大體積四周所產生的驚人運轉。老星的許多碎片，因脫離不了母體的吸引力，像一些無家可歸的小單元四面亂飛，互相撞擊或自毀於無形。

我發覺這個黑洞和星星殞滅的圖像非常有趣。在經驗的層次上，完全可以把事情看成這樣。我剛描述的那個進程，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一定沒有走在大群人歸向信仰的運動上，歷史沒有敲響使這顆星變濃、變大、變亮的鐘聲。毫無疑問的，期待世界行程變化，希望信仰再成爲大批人群的現象，一個可以主宰歷史的現象，是不切實際的。

儘管如此，我仍相信有些冥冥中的起步，能夠說，教會在外邦人中重生，而如此再度開始耶穌的門徒及耶穌自己有過的經驗。當耶穌說：「我在以色列沒有遇到這樣的信德」，祂相

信，在這完全外邦的世界裡能產生信德，其活躍是在今天的基督徒中所找不到的。這些基督徒疲於他們的信仰，將此信仰看做一個很重的包袱，固然還拖著在路上走，但不給他們什麼喜樂。不過那顆星的圖像也是有限度的：如同我已說過，基督宗教常用芥菜子的比喻來界定，而不停地年輕化。誰也不能預言，它是否還能塑造歷史，像中世紀那樣一切都在基督宗教的徽號下。但它會延續，會以不同的面貌，並作為歷史的生命力重新臨在，也尚會給人類提供繼續生存的方法，這一點，我完全堅信不疑。

不過只體驗到一些消極的因素，如沒有信仰一切糟糕，我們會跌入荒謬的空虛，這種體驗尚不產生信仰，能是過眼雲煙，能產生的只是委順、懷疑或譏諷——或更壞的，人的毀滅。

我們面對著一個吊詭的局面。世界轉變的速度為我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受不了，但在這同時有一股熱衷於宗教的氣氛在發展中。以前從未有過的到處打聽靈修的新方式，有的教人出神入化，有的方式混淆不清。但，直至今今，基督信仰的一些民間教會，最強的這些宗教隊伍，尚未能由此意義的總尋找中獲益。

首先該說，由某一觀點來看，宗教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紀元。人們在尋找一個宗教，能有許多形式，但他們並不想會在基督信仰中，會在教會裡找到。他們游目尋找一些全新的形式，其間宗教所代表的無非是一個變形，容許給日常生活製造一些調劑；一旦走上巫術及黨派的歧途，這種宗教就會惡質

化。那些大的民間教會也許會窒息於過度的制度化，死於制度性權力，和它們自己歷史的壓力。信仰的生活面，單純面不再顯露。做基督徒的唯一意義是屬於龐大的機構，並多少知道那裡面有數不清的倫理規條和難懂的信理。這樣基督宗教顯示為許多傳統和制度的一副擔子：不願拋掉它，因為還承認它能是一個協助。那真正的燎原之火不能穿透蓋著它的灰堆。

好像這火種不只被灰掩蓋著。時下輿論主流的樣本是，羅馬天主教會不僅被視為過去時代的一個遺跡，幾乎不值一顧；在基督後第二千年快要結束的這一刻，為這世界沒有比教會藉其各種官方功能的單純臨在更大的挑戰。只有一個天主，祂有一個兒子，天主派祂的兒子來拯救人類：這一事實為今天很多的人簡直像是痴人說夢。我們能說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機構，像天主教那樣，向世界挑戰——奇怪的是，這個西方世界正是受過基督信仰和教會的洗禮的。

這，在很多點上果然是在為天主教說話了：它還有挑戰的能力，它是螫刺和反話，或如聖保祿所說的，它是一個「惡表」，一塊絆腳石。這樣看來，教會還算一回事，不能把它放在一旁去排行事日程。很久以前我已說過，必須區分首要惡表和次要惡表。次要惡表在於我們真實的錯誤、缺陷，過分制度化；首要惡表則是，我們堅決反對滑入便宜的、庸俗的貨色和一些假的許諾；我們不讓人沉睡在人為自己所塑造的一些意識型態裡。這使我能說：天主教是一絆腳石，因為它與一個似要

誕生的世界新意識形態對立，並在此意識形態前維護人之爲人的原始價值，這些價值不甘於被放進這個統一的意識形態裡。這是教會的積極一面。

特別打擊人心的是見到教會失去其可信性已到了什麼程度。舉一個較粗俗的例子：多年前，當宗教毫不含糊地暗示天使們的存在及意義時，很多人把它當作一個笑話。但突然間天使成了時髦。現在是真天使、好天使。顯然，他們當下「離開了教會」（意指那些脫離宗教而另找途徑的人——譯者）。

老實說，觀察各種精神時髦如何迅速地轉變是十分有趣的。最早一陣子有過一種唯理主義的共識，願意使基督宗教得以所謂的淨化，由是一切多餘的都該逐出。天使和聖人已不再管用了。曾幾何時，忽然聲言重新需一些奧秘，要一個充滿超越的世界。現在由教會之外而來的這新「天使潮」負載著許多可疑因素。這當然是個令人不安的現象：有些信仰內涵當來自教會時不被人領悟或被視爲不能接受，若來自教會之外，卻重獲它們的優位。這顯示在教會生活內部已引進了一種鬆懈，它不容許人看到信仰本身的美麗及對人的重要性。所以我認爲，外來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覺悟。

讓我們再次回到這現象的一些面相：對信仰內涵的初級認識已不見了，像是突然並神祕的樣子被一股外來的力量吹散。比方在德國，百分之三十的成年人相信聖誕節

是 Grimm 弟兄的故事。司鐸們不再清楚他們是何許人，信友們不再知道他們該信什麼，神學家繼續接二連三地挖傳統基本慶節的牆腳，禮儀的珍寶被劫一空。

你剛才說出了一系列的批評，也許該一個個地予以審視。我也許應該即刻出來衛護神學家，但現在我們不必進入這些細節。

你有道理，連基礎的宗教資訊也幾乎減到零。那麼我們該問問自己：我們的教理課在作什麼？我們的教學，其中宗教訓導本很發達，又在作什麼？（在德國宗教課與其他的課程並列——法文譯者註）。我認為把資訊傳遞太少是錯誤的。不錯，我們的宗教老師有理由拒絕把宗教訓導看作只是傳遞資訊的課。他們說那是另一回事，要多的多，是要學習生活本身，應該傳遞的多出很多。但結果是，先想激發對此生活情調的諸多同情，卻忽視了資訊的有效內容。在此，我相信，我們實在應該改變態度：在此俗世，學校固然有保存宗教訓導的課（見前註），我們卻該認清在求學的框架中我們不能歸化很多青年人。但學生們至少應該學習基督宗教是什麼，他們應該收到正確的資訊，當然是為引發同情，讓他們終於自問：也許這裡有跟我有關的東西？

今天，常有人說，那些去參與彌撒、遊行及為教會說話的人被大多數人視為一小撮異邦的住民。連這一小撮人也應該越來越覺得，帶著基督宗教的這些表現，突然生活在一個宇宙中，和圍繞著它的世界已毫無關係，衰退

的進程是否比人所願相信的更戲劇化？

不假，此刻基督宗教正忍受意義的嚴重喪失，而教會切入目前時代的方式也在變。表面上，一個一直維持到現在的宗教社會在解體。社會與教會的種種關係將繼續變形，並無疑會導向社會的非基督宗教形式。信仰將不再在社會良心整體上起革新作用。

今天的生活事實是以經濟和社會的革新為中心。在此——特別是在傳媒的休閒世界——在形成一種語言、一種態度。是這個能說是人類生存的中心領域被人群的一些大運動所佔有。宗教沒有消逝，但已移位到主觀的領域。這時，信仰被容忍為許多形式中的一種主觀宗教形式；或者最多為它保留一個界定的空間，作為文化因素。

可是，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將提供一些性質不同的生活模式，而在技術世界的沙漠裡將重新顯示可為真實人性的一個場所。這在目前已可覺察得到。我是說，針對新慕道團、普世博愛運動等的活動常可提出一些疑難，但無論怎樣，這裡確有革新的現象。這裡基督宗教當作一個新奇活出來，且被來自遠方的人，忽然體會為一個生活的機運，並能在這個世紀裡活下去。從此以後，教會的公開職責將不再是相同的了，不再像以往那種方式把教會與社會混在一起，而將經常顯示為：人的一個新機運，連在輿論裡也會如此。

雖然教會從前說過大家能懂的話，今天卻有一些特殊的概念，扮演不出任何角色。教會也越來越失去其創造力。實際上直到最近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也在教會裡作

信仰宣誓，以之為理所當然的事。好幾個世紀之久，沒有出現問題。拉法爾、米開安琪或巴哈，這些被恩寵充沛的人曾是天才創作家，同時仍服務教會。反之，今天這些人有所投身的話，是參加綠色和平運動或國際特赦組織。

這跟我們提醒過的歷史行程是走在一起的。目前時代的主流文化是以傳媒為代表，是一個不談超越的文化，其間基督宗教不再能以強而有決定性的能力的方式生存。在此，倫理道德的力量，一部分是在循其他途徑尋找，一如你剛才說的。但我毫不懷疑，教會不會缺乏創造力。就以古代末期為例吧：也許無人注意到聖本篤。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出身羅馬族，一生行止也很特別。就是在這種意義下，我相信，今日有些基督徒生活在世界邊緣，離開現代生活的這種奇怪共識，嘗試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他們一定不會受到公眾的特別禮遇，但他們所作的真是在開創未來。

你能更確切地描繪一下這「現代生活的奇怪共識」嗎？

它在於我剛才指出的：在人的倫理道德中天主已不算數。如果祂存在，也跟我們毫無關係——這實際已成口頭禪。祂不管我們，我們也不管他。這樣一來，永生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面對天主及其法庭的責任被對歷史和人類的責任所取代。這樣出現一些非常倫理性的判準，甚至能以某種狂熱陳述，例如向人口過剩宣戰，同步也為保持生理平衡而普遍論戰。同時，一切都許可，只要不出來競爭。除了公眾輿論及其種種法

庭（有時能很殘酷）外，既然已沒有其他向之負責的權威，上述那些理想的推動力在個人生活上往往是十分有限的。一些理想的活力能源開發之路是捨近取遠。近處的，多次是自私自利在一路領先……

## 教會現狀

普世的教會不論怎樣也得適應許多不合時宜的缺陷。各民族文化及歷史上的許多差異個別地看來會產生一個很強的斜坡。天主教不再限於這個提倡解放及好批判的西方，西方已疲於自己的權威。此外還有東方諸殉道教會，某些南美政治化的教會，和一些社會關懷的教會。此外加上許多在信仰及思想上的不同方向，都互相對立。今天似乎在各教會中更容易區分出差異，而不是共同點。甚至可問：還有共識嗎？

對。當我在腦海中只巡視一下全世界主教們的像，就會覺察這一點。當然，談話的水平，各種性格，及他們所代表的教會，很不一樣。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是公教會的，表達在禮儀，其他的一些敬禮方式，基本的倫理抉擇，及一些明顯的心悅誠服的事。即便教會變成多樣化，在其內心仍是一個教會，它藉信仰宣認，表達自己，並且從一個很具體的觀點來說，也藉它與羅馬的連繫，就是藉共同信仰的認同。這樣的確有許多很不同的天地並列著生活在一起，但在這些大的差異之外，它們的統一如如此強大，以致可以隨時共同舉行彌撒，前後

左右交談，並在基本的概念上互相了解。在此，我相信，天主教給人類提供一個重要的貢獻：它把那麼不同的天地保持在一個共同的一致中，並如此，在不同的世界上方築起了一座橋樑。

**這個基本的一致只是最低限度的一致吧？**

不，我不這樣說。現有的同意方式，其晶瑩一致，也許不是五十年前或不知多久以前所有過的。隨著許多文化、信仰的確是多樣的，但也有很堅固的統一。這是說，大家都讀同一本聖經，都以天主教傳統的精神讀經，並知道自己投入同一信經和同一道理。實踐的樣式依不同的期間或有不同，但其統一是完全可以體會的，這在我和主教們，及和全世界的青年會晤時感覺得出來。天主教會的一致性，超越所有的界線，是非常真實的。

跟這一起，當然也該考慮一件事實，就是同時有時間上的步伐不齊，各文化的對立，統一的普遍潮流，及形式劃一的暗潮。技術和傳媒也在製造全球統一的氣候。今天電視滲透世界最窮的角落裡，而擴散其特殊的意識形態，也不再有任何地方讓技術缺席。雖然如此，矛盾也源源不絕。一方面，劃一的趨勢把世界聚合在全球所達成的同一水平上，及其所產生的各種意念中。反此劃一，各種自我認同起而反抗，一些個別文化更有力地自衛，並尋找它們的原始面貌。這時會覺察，這個畫一，和滲透一切的世界性的技術文化觸角，仍不足在人間建立更深的統一，足以碰到人的真實內在的各層次。由此出現更複雜，也重要得多的情勢，即教會的情勢。

## 你這些話是要說什麼？

維持教會凝聚的信念及為人態度要比傳媒強加於人的說話樣式和做人模樣更深地涉及人的生存。電子儀器運用、開車、連鎖操作、建築、摩天樓等，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按照同樣的技術規律和一樣的方式。但跟這一切相連的能是一些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外在的本領到處相同，但這並不意謂那些作一樣事情的人能互相了解，彼此尊重，並大家一起在平安中生活。人到底怎樣，決定於此：宗教的和倫理道德的信念，良心的教育，這是在教會裡作的。明顯的是這一內在的人的培育外表幾乎捉摸不到，同時更困難，為人類的團結及人性尊嚴的維護也更重要。基於此點，可以了解，在大家分享的信仰中共同培育良心，必須找到一個可感受的表達，因為沒有顯露於外的不會有結果。還有一點也重要，例如在禮儀和教會生活上，前述的一些共同點，應越過文化的許多限度而具體地被人體會出來。

## 在教會內能界定出一些基本的潮流、陣線，甚或派別嗎？

這裡當然有些全球性的潮流。首先有這基本思潮，就是解放神學。它在各大洲都得到迴響，讓人也給予積極的解釋。這一思潮的核心在於基督宗教該對人的世上生活有所作為。它該給人良心的自由，但也當盡力使各種社會權利生效。儘管如此，當此思潮轉向一種排他性的觀點時，普通它會使基督宗教成為世界政改的工具。由此一評估出發就形成以下的概念：一切宗教事實上只是工具，用以保護自由、平安，及受造界的維

護；因此一切宗教實際上都該以政治上的成就和目標使自己合理化。這種論題會因各種政治實況有所不同，但的確橫跨各大洲。在亞洲今天已堅實地生根，但在非洲亦然。它已滲入伊斯蘭世界，以致他們嘗試用解放神學解釋可蘭經。這當然只是次要現象，但在伊斯蘭的一些恐怖運動中，舉例來說，認為伊斯蘭事實上是一個解放運動——比方針對以色列——的這一意念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這期間，解放的意念——如果我們還能引用自由為現代靈修及我們這世紀的基本共同點的話——也和女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強烈地溶合起來。目前女性被視為特別受壓迫者；結論是女性解放成了這一運動的核心。在這同時，不只要把女性由各種相關角色所帶來的約束中解放出來，算到最後，還要把人性由其生理條件的特色中解放出來。現在把性的生理現象與其各種歷史形式區分開來，但這種有意引發反對性的一切歷史形式的革命，終於也成為反對各種生理條件的革命：不應再有各種「自然」條件；人應該能按自己的意願塑造自己，他已由他周邊的一切得到解放：他按他所要的做成他自己，只有如此他才真正是「自由的」和得到解放的。在這背後，有一種人針對作為生理存在所帶來的種種限度的反抗。說到最後，莫非是一種針對我們是受造物的特性的反抗。人該是他自己的創造者——古代試作天主本身的現代版——跟天主一樣。

第三個可在全世觀察到的現象是——正好是在一個越來越劃一的世界中——尋找文化的認同，即以「本位化」(includuration)的概念所表達的認同。在拉丁美洲，馬克斯浪潮枯竭的今天，許多被遺忘的文化的覺醒代表一個很強的新潮流。印第安

神學願復甦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的文化與宗教，並由外來歐洲人強加於他們的所謂侵佔中解放自己。跟女性主義的種種關聯是頗有趣的：對大地母親及天主內女性因素的崇敬被置諸頂端，使得美國及歐洲的女性主義的趨勢增強，以致不再以人類學的證據為足，而追求給天主的概念另一個形式：在天主身上父系霸權得到合理化，這樣對女性的壓迫是由天主的概念注定的。把一些古老宗教的這一宇宙因素（大地母親等等）予以翻新，如是跟「新時代」的某些趨勢接上頭，後者便企圖溶合所有的宗教，並使人和宇宙達到新的統一。

我們來看本位化：它也存在，當然是採用一些特有的性質，在非洲和在亞洲，特別是在印度。問題在於：到什麼程度能用各文化當做不同宗教的「衣著」？那些文化只是些衣著嗎？或者是一些活生生的整體？「文化」到底又是什麼？這裡有許多大問題和該做的大課題。

接著，我要提起兩個也是普及全球的問題。其一是生態問題。它出自一個意識：我們不能對待大地像我們目前所作的那樣。屬於這個挖空受造界的人類幾乎成了羞恥，於是不得不自問：其實人是什麼，他不是該在其他生物中，在同類的事物中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嗎？可以憑基督信仰實踐環保：由創造的信理出發，它給人的自由設定一些界限，指出自由的多方面向；也能以反基督信仰的方式發展環保，即由「新時代」或由宇宙神明出發。我還想指出另一主題，即相對論的潮流，它的來勢頗強，而有不同的根源。一方面，現代人認為，說我們掌握真理，其餘的不是真理或只是一些片斷，這樣說是反民主，排斥異己，並與科學所要求的質疑不能相容的。這一對生命的民主

想法及為其一部分的容忍意念使得下面的問題變得非常尖銳：我們是否還能保得住我們自認基督徒的觀念？

在印度，這和此地區的宗教傳統連在一起，它常有一個特點是專門在不可命名者間尋找天主。因此與宗教有關的一切無非是那從不露面者的一些反映和圖像而已。那麼真宗教是不能存在的。如此，基督一定是個主宰性的大人物，但在意識到祂時，該想到在祂身上所顯示的也曾在別人身上顯示過。終於在此也一樣，世界的民主與容忍潮流跟一個大文化傳統結上盟。

為天主教這些潮流有多少重要性，或代表什麼——危險？在公眾意識裡，基督信仰繼續說自己是真宗教，說基督不僅是個主宰性的人物，說宗教不僅是一幅圖像，好似是頗令人氣憤的。

「以什麼尺寸還能談真理？」及「基督宗教在許多宗教的整體中該佔什麼位置？」這些問題我認為已沾上新的強度。今天這一討論的最重要中心在印度，但也透過「印度神學」擴展到拉丁美洲。在北美及歐洲，出自我們的相對性意識，這討論當然也很熱烈。

在教會內被某些人指謂的一些反動思想或天主教的基要主義之類的潮流又有何地位呢？

面對今天所突出並威脅人生存的一切事故和又多又大的不安定，人倏忽間自覺失去自己的精神本鄉，失去各種基礎。於是生出一種自衛的反應和面對被懂成敵視宗教或敵視信仰的

「現代」而加以拒絕。不過我還得說：今天所用的「基要主義」一詞涵蓋一些非常不同的事實，必須加以界定。基要主義的概念最初出自十九世紀的美國基督教。啓蒙運動的後果造成以歷史批判解釋聖經，這奪去了直至當時有過的無歧義的清晰，而這清晰正是基督教講聖經的先決條件。「單靠聖經」的原則倏忽間不再提供清晰的基礎了。因為他們沒有教會訓導權的機構，此一轉變為基督教信仰團體成了一個致命的威脅。此外加上進化論的學說，不只質疑創造的敘述及信仰，還使天主成爲多餘的。各種「基礎」都不見了。針對這一欠缺於是推出嚴格按字義解釋聖經的原則：字義毫無變動地保存其效用。這一論題的提出既針對歷史批判的釋經法，也針對天主教的訓導權，後者不許可咬文嚼字的死板解釋。這才是「基要主義」的原始意義。基督教的許多基要派別今天在南美及菲律賓有很大的成就，它們給人們一種安全感和信仰上的簡樸。但這段時間在我們中間「基要主義」在全世界成了一個全然固定了的格式，涵蓋對方陣營的一切可能的形象。

為停留在此一說法，敢問有哪些基要派的潮流你認為是較積極的，哪些你認為是可疑或病態的，一如你說過的？

我們可以說，這些在我們之間稱之爲基要主義的非常多樣的潮流，有一個共同因素，就是尋找信仰的安全和簡樸。這一點本身並不壞，因為說到最後，信仰——正如新約多次給我們說明的——本來就是爲簡樸的和弱小的人建立的，這些人不能按照學院式的微妙思考來生活。今天以委順於無定見的生活爲榮，並指責信仰講幻想的真理而予以懷疑，這一定不是聖經願

意引我們進入的生活方式。尋找安全和簡樸帶來危險，是當這一尋求引進狂熱和狹隘精神時。一旦人懷疑理性的功能，那時信仰也會變質，而成爲一種黨派的意識形態，跟我們以滿懷信賴交付給活生生的天主毫無關係，祂是我們生命和我們理性的最後根源。這時會產生許多宗教情操的病態形式，例如尋求各種顯現，來自彼岸的一些訊息，及諸如此類的事。不過在指責上述的基要主義之前，神學家們應該自問：越來越多的人在種種有病的，狹窄的宗教形式下尋找蔽身處，在哪種程度上不是困了他們（神學家）的過錯。神學家提供的若只是許多問題，而不給信仰開闢任何積極的路，上述的那些逃避是不可避免的。

教會有什麼地方還算較健康？有沒有一個新地區，由那裡湧現出天主教？

我不敢予以如此的格式化，不。只能說，一方面有些「小島」上，人把一些傳統更堅強地予以衛護，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危機沒有達到如此徹底，卻讓一些新的出發獲得較大的迴響。但信仰到處受到威脅，無疑這也是信仰本質的一部分。

作為信理部部長和傳信部成員你有某種整體觀。迅速地環視一下教會在世界的局勢一定不能恰當領悟問題的所在，但至少我們也許獲得各種不同論題的某種概念。你能給我們說說不同地區的情況，首先在歐洲，也許可從意大利開始？教會在歐洲一向都呈現著很不同的性質，由北方教育較高的教會，到南方更民間和更傳統的教會。現在又體驗到進步與保守二翼的普遍對立，及平信

徒運動日益強大的影響。

意大利也未倖免於這些對立，但據我所能判斷的，這一現象要比德國弱些。當然，這裡神學也受到各種批判運動的滲透，而給予那些運動一個特殊的重點。目前達成的基督民主黨人士的分裂不僅標明在意大利天主教內不同政治學派的存在，也洩露了好多更深的意識形態的張力。儘管如此，與教會元首制及與教宗訓導的連繫在此要比在我們間（指德國教會——譯者）扎根深的多，這在意大利天主教裡，在一切張力之下，還保持很強的凝聚力。

不錯，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天主教的面貌完全不同。在南部，較有決定性的是各種感覺，民間因素、傳統和遊行。在北部，受到理性主義及中歐的影響較深。如同我說過的，這個國家裡神學作業相當可觀，連在各宗座大學裡也不缺一些批判性的神學家。但這裡從未走到一些徹底的敵對，像在北部那樣，而寧願盡力以不同方式保持合一。根底在於意大利的特有意識：教宗以其訓導在教會內是基本取向的一點。

當然，進堂的人數在意大利如同在所有的歐洲地區一樣，是減少了，當司鐸的聖召也是如此。但某種公教意識，有時的確是很籠統的，仍存在於所有的意大利人心中。連在左派的黨員中，如老共產黨員也不例外。常可以觀察到他仍自視為天主教徒，即便在他們의思想和行爲上沒有多大效果。這是意大利文化和認同的一部分，要比像德國的地方強的多。

一些批判人士責怪意大利教會患著某種疲憊，而想用一些文化計劃的大場面加以掩飾。

意大利當然不是這種疲憊的樣本，而你所說的現象是存在的，那種脫身之計也是有的。但也有很多堂區真實的活躍，而意大利平信徒的活動也很多。也許一切正規的，有秩序的不像在德國那樣發達，但反過來，我發現，那些自然的創舉要更強、更活。比方在羅馬教區，司鐸聖召的數目比五十年前提高了。

**政治系統的崩潰強烈地動搖了意大利教會嗎？**

很難說在意大利有任何東西動搖到什麼程度。這裡，有些政體是崩潰了，但實際上沒有變什麼。正確的一點，是意大利主教團的政策有了改變的必要。就是在「基督民主黨」的最後幾年，曾十分指望天主教徒的政治統一，並曾發起運動，讓天主教徒遵循他們的責任在政治領域聯合起來。這一點沒有改革什麼，「基督民主黨」仍然跌落了，使得意大利主教團不得不放棄這一目標。後者目前更堅定地以政治中性為掩護，並力求所有黨派的教友，在政治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倫理問題上，憑著他們的共同責任，以「橫切面」的協議超越黨派的界線而行動。因此，目標是，有關一些基本的倫理問題，在各黨派之上，達到一個新的政治共識。

**你支持這種共識嗎？**

是的，如果成功的話，能在一個政黨的界線之上產生一個基本的一致，我覺得是很美的。

**連共產黨員也在內嗎？**

無論怎樣，跟共產黨以後的社民黨 (PDS) 應該是可行的。至於共黨的重建當然還是以一些馬克思原則為依據。

跟德國不同的是，在意大利關於教會諸問題實施公民投票顯然地似乎扮演不了任何角色。大家的視線不怎樣投向那些信理問題，而反之更朝向社會問題，朝向基督宗教的各種應用？為何有這種區別？鼓動意大利人的是什麼？

也許首先該說，關於教會的公民投票的嘗試在比利時和法國實際上沒有得到迴響，而在美國無疑也落空了。這是一個很德國的東西。此外，在比利時他們必須把有關教會公民投票的概念大事改裝，為激發人的興趣。其他地區怎樣我就知道了。在意大利，據我所知，無人懂得什麼「恐嚇的訊息」和「喜樂的訊息」，並選其一。福音為支持我們的軟弱，必須以法庭來恐嚇一番，這裡則無人領會。誰都知道，兄弟姊妹不常代表和平共處的模式。說獨身制引發很多人性問題，甚至悲劇，是大家所周知的，但人有足夠的現實感來承認婚姻生活並不簡單很多。所以獨身制被看做天主教文化的一個成分，其崇高受到認可，雖然能產生一些缺失，不得不聞不問。這一制度尚能延續很久。意大利不會有教會分裂，但教會卻成為公教徒 (cattolici) 和平信徒 (laici) 共有的。這些平信徒之間可列入那些國家哲學和某一存在觀的保健者，其最高的歷史表達好像是法國大革命。共濟會會員 (franc-macons) 及「平信徒」的範例，曾在意大利建國上有過重要的參與，他們自認是此一觀念的保證

人。對抗在此二者間展開，而二次大戰後又加上一個共產主義的抉擇。因此問題首先在於知道如何在這三股力中找到平衡，它們間哪些綜合是必要的或可能的，反之哪些是該予以擯棄的。

我們看一下西班牙。

在西班牙，佛郎哥政權結束及過渡到民主這雙重危機與大公會議後的危機巧合，結果在西班牙教會造成大動盪。直到目前，受社會秩序穩定之賜，教會與社會，甚至與國家很強烈地認同。這一切現在被認為是錯誤的。教會必須脫離其種種社會基礎，而重新自我界定。這一倒轉也有了一個後果：突然司鐸和會士聖召降低，而在神學領域也就產生對立和各種批判神學。還留下一股批判性的公教和神學的強流，但也發覺一個很活的運動，朝向由大公會議形成的大公性，擺脫來自國家教會的那些老傳統。

按照一九九四年所作的一次調查，在法國百分之八十三的信友自覺只向他們的良心負責，並肯定只有百分之一的天主教徒還甘心受教會官方道理的領導。

是的，從某一觀點來說，法國也許是歐洲最俗化的地區。法國精神的自我意識在教會裡常是一個特殊的因素。所說的那些百分率應該按字義接受到什麼程度是不易知道的。正確的說，法國天主教非常多樣性，比方若想到《哥利亞》或連《基督徒見證》這類雜誌，可觀察到一些很具批判性的運動。另一方面，對傳統也很執著。肋弗熱主教 (Mgr. Lefebvre) 或其他留在教會內的傳統運動在法國比任何其他地方卻更強烈。所以對

比是可觀的。不過這裡也觀察到一些革新的記號和一種充滿喜樂的基督徒生活，其形式不多管統計數字，但以人性來說，是一些偉大格局，載負著開發未來的豐富潛力。

目前，好似最大的動盪是在東歐。那裡，教會曾被共產主義控制而成為殉道教會。共產主義結束後，教會顯然應該扮演一份全新的角色。

對這一點，我缺乏準確的資訊，因為本該以批判方式報告我們這裡的一些神學潮流沒有到達，或只來的有限。在匈牙利，**Bulany** 神父所創立的 **Bokor** 運動差不多是走此方向。那是一個基層團體，出自受迫害的一些經驗。那一極端的基督信仰表達，它採取的是狹義的和平主義立場，並對主教們越來越有批判態度，控告他們歸屬一個系統。不幸的是，直至目前，一切和解的努力，都失敗了。反過來，這一運動跟西方反對一切聖統的一些批判神學緊密連結。成員們不管屬於什麼宗教，只要承認愛的誡命，以之為無上準則即可，在捷克共和國和在斯洛瓦克一個以批判神學為支柱的運動曾在「地下的」司鐸左右得以發展，但並不是些留下痕跡的過程。至於殉道教會階段過後，已不能再回到一些官方教會的前一階段，卻由此而形成信仰的自由弟子，必須重新界定他們與社會的關係，這是眾目昭彰的事。不過由受苦時期留下了一個堅韌的信德，和反制某些誘惑的解毒劑還有力地操作。

特別是在波蘭觀察得到一些現象，是很久以來不能再想像的，至少是在西歐。我是要說，這種與教會的緊密連

繫，由政治的一些特殊方向，到個別的個人。

這當然是一個特別問題，我對之也沒有確切的認識。不過常該記得的是，波蘭有一個動盪不安的歷史，而在一切動盪、斷層，及其歷史的革命中，真正作為它自我認同因素的常是天主公教。天主教也以很特別的方式把愛國主義和波蘭的國家情感溶合在一起。連波蘭還不是國家時：透過教會它依然是波蘭，透過教會，即便地盤被瓜分，該地區仍保存其內在團結。這樣，教會在波蘭成了一個政治因素，現在一定應該重新思考，活出另個樣子，以另一種樣子吃苦。澄清的過程確定已在進行，這些進程不能在一夕之間予以掌握。

獨有英國天主教似乎道勁地在增長。顯然地，英國常是羅馬教會情有獨鍾的失落兒。

聖公會保存了很多天主教的要素。英國及其聖公會也常塑造過中介的形狀。一方面，英國與羅馬分離了，並堅決地予以擺脫。記起 Hobbes 就夠了，他說過：一個國家應該有一個宗教，特別情形下有兩種公民可以沒有宗教，第一是那些無神論者，第二是那些教皇主義者，後者是一外國元首的屬下。可見一方面有粗暴的間隔，但另一方面，仍有很強的對天主教傳統的依戀。在聖公會裡強化天主教遺產的潮流繼續活躍；這分遺產一直奇怪地分兩種解釋：一種較基督教的，另一種較天主教的。這在目前的危機中也覺察得到。有兩件事造成了一個新局勢——將多數的原則延伸到信理的一些問題上，將決定道理問題的權限移交給各國家教會。這兩件事本身是荒謬的，因為一

端道理或是真的，或不是，大多數人或國家教會在此不能界定什麼。抵抗女性晉秩及一些回皈天主教的個案應該由這兩點來了解。留下的依然不少，就是連官方教會也不願失去天主教要素，並且全然有意識地接受那些不贊成女性晉秩的主教，讓他們，可以這樣說，給聖公會的天主教部分一個避身所。在聖公會裡留下了一股大公性的強大潛力，這股潛力在目前的危機中再度顯示得非常耀眼。

在南美，基督教的一些新教派聚集了幾百萬的隨從者，天主教信友也大批的加入。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國家，巴西，經常在教會間作戰；天主教徒與那些派別的信者交鋒。這也是解放神學失敗的一個後果——或者，把事情說成別的樣子，如果這個神學受到了羅馬的鼓勵，這一發展就能避免了嗎？

對於這一點，各種診斷很不同，而我們也缺乏一些實證的認識。有很多人說，解放神學從來沒有贏得它特別關心的那個人民層，即最窮的人民。正是那些最窮的人逃避它，因為他們不覺得那麼理智的許諾跟自己有何關聯。他們只覺得宗教失去了安慰人的力量和熱誠。因此他們才轉向那些派別。當然，解放神學一派的人不會同意這一說法，不過這話確實有不少真理。為那些真正赤貧如洗的人，給他們所呈現的更好世界的遠景實在太遠。他們內心處所關注的是一個現實的宗教，一個能進入他們生命中的宗教。正是在此地盤大批的教派洶湧而來，提供一些在政治化了的宗教團體裡不再能找到的因素。

以後有所反擊，說那些教派用錢收買，以淫晦的方式勾引；這能是部分實情，但絕不足以解釋各教派整體上的這種擴散。整個情況像是在一些神恩教會和五旬節教會之間開始了一場賽跑，也有那些被稱為基要派者，也可稱之為教派，它們對有關信仰的事是非常嚴格的。神恩運動潮和五旬節潮流都顯示，人想望在教會內有更多的自然流露，更具體的團體。也就是少點道理，多點經驗，多點在信仰中的直接喜樂。基要派的浪潮顯示，人向信仰要求一個確定性的基礎，這樣，當此下土世界不見時，這基礎繼續作為生命之地。

儘管如此，應該說，在整體上教派現象的恒定性是相當小的，在教派之間發生大的遷移運動，而由一教派向另一教派的遷移多次只是放棄一切宗教的前奏。當然，這些發展也跟許多社會新結構及越來越廣的都市化連在一起。人們離開鄉村，到人群集中的城市裡生活，這裡沒有宗教，沒有團體接待他們，給他們一個宗教氣候適應，一個精神的家。可見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該只說出一些太簡單的診斷。

在美國，有一大批天主教的主教在未來，照他們所說，要一次一次寫出他們的論戰書。

他們的數目並不大，最多只有三十位主教。我曾跟他們主要領導中的一位談過，並相當堅持地給他說過，他們被誤解的很嚴重。他答說，我們當然是很好的天主教徒，完全忠於教宗，我們只是要開闢一些更好的方法而已。我仔細看過上述的那些寫作。我曾聲明，我完全同意他們所引的一系列的例子，但有另一些例子我認為是不可靠的。我能說，在美國主教團沒

有嚴重反羅馬的精神狀態。主教團是非常多樣化的，這也是件好事。在美國主教當中，有幾位，不多，也許真有點極端，但自從我在此十五年以來，我的印象是在羅馬與美國之間，各種關係已改善很多。大體上，我們跟美國主教團的來往是極好的。它是一個在知識和宗教上潛能很大的主教團，有很多卓越的牧者，他們給世界教會的道理發展提出重要的貢獻。主席團每年兩次來看我們，我們之間的關係實在是真誠的。

在北美教會能從此地目前所顯露的宗教飛躍獲益嗎？

我相信是的。雖然不該一廂情願地把某些現象和這些成群湧入天主教的事作太樂觀的解釋，但顯示出來的是，被這飛躍贏取過來的那些青年在天主教會裡看到一個機運，而教宗是一參照點和一位宗教「領袖」。最後這十五年很多事已紓解，並重新以積極的方式發展。除了一些英國教會的司鐸回歸運動以外，也可觀察到與福音教會的全新關係，過去是從他們那裡發出對天主公教最尖銳的批判。在開羅和北京的（聯合國）會議裡福音教人士與天主教徒特別接近，理由很簡單：他們看天主教對聖經不是威脅，像他們直至現在所相信的那樣，反而天主教是嚴肅對待聖經的一個保障。最近的這些接近不會很快地引向雙方的合一，但再度使人看出天主教為美國人是一個可能選擇的對象。

在美國是什麼東西刺激宗教感？

一定有好多我不能分析的因素，因為我對美國認識的太少。但會覺察到一種回到倫理道德的意願及宗教的需要。此

外，升起一股對傳媒所擴散的現代文化霸權的抗議。希拉蕊、柯林頓所說的——「關掉電視，不再接收」——表示現有一股大潮流在肯定：我們不企望繼續長期地受這單獨文化的掌控。

在非洲，黑人天主教徒常覺羅馬待他們像一個後母，他們為了重新受到評價而奮鬥。在這大洲上，教會有很多關於非洲禮儀及文化特徵的整合問題。比方在宗教禮儀中可以敲鼓或跳舞，但多妻制怎辦？有些人承認：「我是個好教友，我的三個妻子也是」。同時，這裡正進行著一場與伊斯蘭教的競走，後者越來越吸引非洲人，因為他們想伊斯蘭更能整合他們的各種傳統。

非洲是一個希望之洲，人如此說，不過，我們知道，也是個橫穿著大問題和張力的大洲。像魯安達和布隆底這樣的天主教地區竟成了最壞暴行的舞台，為我們真是恥辱。我們應該多多反省如何使福音更強而有力地影響到社會生活。

在非洲主教會議以後，並跟非洲主教作過很多的會晤以後，我並不覺得非洲自感受到羅馬的虐待。老實說，非洲人以屬於像天主教這樣的一個龐然大物而自豪，且是平起平坐，一位非洲主教或樞機，與一位意大利主教，或西班牙的、或美國的教長同值，他們為此而自豪。他們中很多人對羅馬懷有一分出自內心的忠誠，對教宗制的熱愛，和做天主教徒的喜樂。當我們談到這些問題或一些神學爭論時，非洲主教們常給我們說：如果真有人越界，那是歐洲神學家們，不是非洲的。這也許有些簡化，但確定的是在種種消極的批評背後多次是歐洲

人。這不是說，非洲沒有許多真實的問題，當然是有的。但是不能說非洲神學對羅馬感到不自在。

你曾暗示兩個主要的部門，也是本位化的兩個層面：婚姻和禮儀。我相信在歐洲對於多妻制多少有些錯誤的觀點。其實不是大覺大悟的問題，而在一切之上是一個社會和祖產權的問題。婦女們的生活如何得到保障？她們在社會的地位如何能加強？因為一定不是為愛結婚，而是祖產的交換。一般而論，那些困難不來自感情，而真正的問題在於知道，一個沒有丈夫也不屬於任何固定人群的女人如何能在這個社會裡找到她適當的位置。因此事實上是社會結構問題，而應該找到一些結構，讓一夫一妻制顯示為社會的基本細胞。

在禮儀上，已有足夠大的自由，讓非洲人的習俗得到並活生生感受到其應有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不讓基督信仰禮儀太快擁塞，卻為它保存其適度的樸素，也是重要的。很多非洲人接受這一意見，他們跟我們都主張，本位化不該由感恩禮即彌撒開始。

伊斯蘭大幅地滲透非洲——也靠它的財政能力——並宣告自己是合乎非洲人的大宗教。非洲人應超越他們的部落宗教是清楚的，於是伊斯蘭給他們說：我們是為非洲設立的大宗教，因為我們沒有複雜的道理，我們有合乎你們的倫理。這一部分可以了解，但總的來說，並不常如此。不該忘記，在奴隸制上伊斯蘭曾立於前線，而對黑人從未顯示過特殊的尊敬。特別是對本位化伊斯蘭不作任何讓步。伊斯蘭是阿拉伯的，誰成為回教徒就該接受這種生活方式，因此沒有什麼本位化。伊斯蘭遇到跟教會一樣的難題：可以說，是表面生活的一層成了回教

的，但下面全部老的外教層繼續存在，而依斯蘭只形成薄薄的一層蓋子蓋在生活的種種習慣上，為給非洲一個宗教形式而打的仗還要延續很長時間，也將不是一場簡單的戰鬥。

在亞洲，人們預言下個世紀太平洋地區在經濟和政治上會很重要。這給教會將帶來些什麼後果？

很難預見什麼。直至現在，各教會在亞洲未能廣泛地植根，只有菲律賓是例外。這並不意味基督信仰在此就不重要。其實它曾轉變過一些原始宗教，並在社會上以多種方式運作。在日本，天主教徒很少，但大體上數目穩定。儘管如此，日本對天主教習俗和文化表示很大興趣。因此，在日本基督宗教是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他們一定不會全盤信奉，但基督宗教會成為社會上的一個顯著的形象。

在印度，百分率很低，但是所有的新印度教，這個在全世界也受重視的宗教，在其較自由的形式上，借用了不少基督宗教的因素。然後我們眼前展開的是這個尚未開放的中國，其基督徒數目小，走向消失，但保存著精神的重要性。如果共黨領導者那樣認真地看待這些基督徒，是因為他們在後者身上看到一股力量。至於亞洲要在世界整體組織上佔有的新分量會有什麼後果，我不敢冒然地預言。

在世界上日益增長的對基督徒的迫害，把教會投入一個新的危機局勢裡？

是的，且是用多種方式。在中國，雖然有些容忍的跡象，仍存在著對基督宗教的迫害，特別當它願繼續完全忠於宗教

時。不只是中國如此，還有一系列的其他國家。教會的命運就是遭受各種迫害——在一些非常不同的政權下。另有一個危險也在不斷地增長：一種對生命的現代看法把基督宗教或天主教信仰看做陳舊的，不能容忍的，與現代無法協調的意識形態，它給人壓力。我感覺這危險已相當大，雖然還沒有迫在眉睫。社會壓力，要強迫教會在重點上屬身於今日流行的一些模式的水平上，已然存在。

基督徒真受到迫害嗎？在極權或回教國家坐監、受刑，跟在西方被放在社會之外，其情況究竟有所不同？

當然，在西方還不能說基督徒受到迫害，用這說法是不合理的。但有些生活領域——且不是很小的——其間明認自己是基督徒在今天是需要勇氣的。最具威脅的危險是那些「適應了」的基督宗教，社會很高興把它們當做基督徒投入的一些博愛變種組織予以控制，而對那些不愛有流線外型的基督徒則扣以基要主義而加以反對。輿論獨裁的危險在長大，誰不聽從，就被排斥，以致連一些優秀人物也不再敢宣認當有的不苟同。這種反基督信仰的獨裁在未來無疑會比目前的各種形式變的微妙得多。表面上它對宗教有好感，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許碰它的行爲和思想的種種模式。

## 德國的情形

可以說沒有任何地方像德國和德語的地區那樣地騷動、分裂，及放棄老信仰。德國教會列入世界最富的教會之

林，但它對其社會的影響比不上那些窮國的窮教會。自從一個多世紀以前的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以來，跟教宗及跟羅馬教廷的爭議，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嘈雜。出了什麼事呀？你對你的老出生地感到憂慮、操心？

操心，真是不假，因為教會內在的弱點，對信仰的冷漠處處在增長。一方面，我們那裡有些現代信友，為他們，誰都知道，一切改革都不夠，他們反對教示制度和道理。但也有另一些可稱之為智者的教友，一般說來，他們覺得在教會裡越來越不自在，沒有在家裡的感覺，為了教會不再是平安居，不再是避風港，卻是不斷爭吵的所在，而感到痛心，因此他們也覺沒有安全而抗議。教會的這一內在弱點，因引起對它的普遍不滿，普遍的悲痛，的確令人不安。尤其是覺察到令人焦慮不安的教會的老化：許多修女團體漸漸憔悴，一度曾意氣風發的大運動日益顯得過時。

有一大部分人要求教會與國家界線須更分明。有人說將天主的概念由憲法中剔去，取消宗教慶節，俗化主日，廢除給教會的稅捐。在教室掛十字架曾引發憲法層次的辯論。

關於應如何建立教會與國家之間的恰當關係的問題當然必須重新討論。只要有社會共識，認為基督宗教的一些基本價值也是容許立法的資料，就可以維持這個有關國家、社會及教會的連繫，這關聯有意義，也不相反宗教自由。但是如果上述已不為一般信念所假定，憲法中教會太強的臨在當然能變成危

險。如果情形如此，基本上我不反對，以某些模式為靈感，使政教分的更清楚。整體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教會必須放棄一些國家教會的體制，為它毋寧是件好事。太密切的連繫常遭人白眼。所以我認為德國主教應腳踏實地的反省教會與國家的協調方式，使之真正反映人們的內在信念，並能顯示其成果。造一張這樣的資產負債表一定是適時和必要的。

對於你所提的幾個特殊事件我的答覆可很不一樣。在憲法裡提天主，我以為，無論從前或現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它的來路不必只是基督信仰的宣認。一旦完全拒絕在我們之上有一道法律，有一位上主，那時就不得不搬出一些意識形態來予以頂替，或讓一切漸漸解體。像布爾特曼這樣富批判性的神學家曾說過：「一個不是基督宗教的國家可能存在，但一個無神的國家則不然。」我以為在原則上他是對的。在我們隨時興起的一些意見之上若沒有一道法律，人的任性就會出來支配——人性也就衰退。

其他的一些問題，如為教會徵收的稅捐，是一些須慎重明智予以反省的問題。

這是一個具爆炸性的問題；答案會像什麼樣子？

我不敢冒然判斷。大致說，我認為，為教會徵稅的德國系統今天還使足夠廣大的人群受惠，因為教會的種種社會成就是被承認的。今後也許可向意國系統看齊：一方面徵收率低很多，另一方面——我以為這一點頗重要——保持自行決定的性質。在意大利，人人都該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我想是0.8%——作為文化或慈善事業的基金，天主教會是其中之一，

但可自由選擇收款的對象。事實上，大部分人選擇天主教會，但選擇是自由的。

卡爾斯魯艾(Karlsruhe)憲法法庭曾聲明，教室裡懸掛十字架是違憲的（1995年5月16日所作裁決——法文譯者註）。你對此裁決有何感受？

我當然感到憤慨，因為所引的那些理由在我看來，是很不可靠的，也因為我深信在我們中間還有足夠的基督徒團體，讓這記號留在我們的學校裡真實地有意義。另一令我憤慨的理由是我認為大多數的同意應該受到尊重。連在民主的觀點下，那一裁決也是建立在一個非常脆弱的基礎上。以後呢？人民的反映顯示，在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基本的基督信仰意識（中譯者註：因了人民的堅持，教室中掛十字架維持不變）。有人告訴我，在主教團中，巴伐里亞的主教們，就和例如西墨格倫保-波墨拉尼的主教們有不同的感受。在德國北方那一帶，大部分，很久以來已不在牆上懸掛十字架。由此可見不是一個信理問題。但粗心大意地讓這個尚能團結我們的記號由我們之間奪去，我絕對覺得是不公道的。何況巴伐里亞憲法一直有效，而依我所知，這憲法很清楚地明示，基督信仰是教育的基礎。

所以信理部部長會說：讓十字架留在教室裡？

是。

為什麼這些分裂的胚芽在德國長得這樣好？這個國家怎麼了，有什麼精神，或更好說惡神俘擄了它？也許我們

患著一種「缺是」症，而長久以來用我們的種種成就予以頂替？Grillparzer 一次說過：「為德國人天主已不再有真實性。德國人把天主尊為他們的作品，而不把自己尊為天主的作品。」

我想我們不該過分地作自我批判。像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或連大不列顛，如果願說的話，也有他們的反基督宗教運動，而他們的教會內也有不少問題。德國的確有它自己的負擔，自從 1933~1945 以來變得十分沉重。這一問題——我們這個民族到底有什麼特質使得這一切曾一度發生？——我們必須非常認真地提出來。

我相信德國人的一些美德和威脅他們的那些危險是緊緊相連的。一方面我們是重紀律、效率、工作、準時的人民，這樣真能把事作到好的結局；這人民今天已成歐洲最強的經濟實力，其錢幣也是最穩定的。但這易於引來某種過分高看自己及排他思想，只重視效率、工作、生產、紀律及那些靠自己所得的成果，卻讓人生許多其他的向度消失於無形。這也能引來某種對其他國家的蔑視，認為只有德國東西好，其他的都沒有什麼可取等。這種自命不凡，及只按效率評估一切的誘惑無疑是德國歷史的一部分，無論如何，至少其近代史是如此，這是我們該抵制的。

顯然不僅是德國近代史。Stefan Zweig 曾把鹿特丹的艾拉斯莫與路德相比以嘗試描繪德國的國家特性及其宗教情操。他寫道，「世界的命運不多參與兩個如此完全對

立的人的出生，像艾拉斯莫及路德那樣」。按照這位作者，在此互相對立的是，容忍與狂熱、理性與激情、文化與原始動力、普世公民觀與國家主義、進化與革命。他還說，在路德身上到處可遇到「煽惑民眾及狂熱的腔調」。整個民族的被壓抑的情緒落在這個天賦高，卻狂熱而不滿的人的手裡，即「德國人的全部國家意識，渴望起來反抗——拉丁民族的或帝國的一切，對神父的憎恨，對外國人的憎恨，社會的及宗教的昏暗無光」。

宗教改革的那個世紀確實給了德國非常特殊的面貌，在某種程度上也安排了它未來的歷史。把艾拉斯莫與路德對比我發現很有興趣，但有些重點也許放的太偏了些。不該忘記艾拉斯莫疑懼那些確定的立場，而在內心一定離路德非常遙遠，其實——這是天主教一方面對他強烈譴責的——他的性格就是模稜兩可的。他盡力——用今天的說法是用學院方式——不捲入那些抉擇裡，而這樣擺脫人生的種種戲劇並不是一件好事。不見得艾拉斯莫的性格是光明的，路德的則是暗淡的，而是他們二人都有自己的難題。當然我們也該自問，宗教改革給德國人性格帶來了哪些歧義的因素——這問題，如果願意公道的話，該與另一問題一起問：天主教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可質問的。我們不該掩飾路德在德國歷史所引進的消極的後果——連同許多積極的，但不該由之產生法利賽主義，或片面的辯護。

今天在討論教會時，顯然越來越少提及信仰的內容，宗教的要求。奇怪的是，也少提社會主題，諸如貧窮、排

他、剝削。你有一次表示了一個懷疑：有太多的人願意教會隨波逐流，迎合那些陷於無聊中的現代人的低級享受。

我想大部分的輿論潮流是如此。但是也許我們還該把問題略為擴大而說，整體上，教會的內部論戰熱中在幾個主題上，卻把我們時代的一些大挑戰擱在一旁。無論到哪裡去，無論教區討論會在何處召開，或無論什麼其他聚會，已經知道會提出哪些問題：獨身制、女性晉秩、離婚後再婚。這都是一些非常嚴肅的問題，但教會裡有一種不斷關注自己的趨勢，集中在固定的幾點上，其時太少想到世上有百分之八十的非基督徒，他們也在等待福音，或更好說，福音也是為他們的。我們不該一直以我們自己的許多難題折磨自己，卻該反省：作為基督徒，在今天的這個世界裡，如何能表達出我們所信的，和我們該向外界的那些人說出的？

在教會意識裡，至少德國如此，產生了一種古怪的萎縮。我們只看自己，只關心自己，舔自己的傷，願建立一座美麗的聖堂，而勉強地還看到教會存在不是為它自己，我們是一句話的保管者，這話有東西給世界說出，這話應該聽的懂，它能給一點什麼。

在德國所發生的事在梵蒂岡是否太輕易地打發過去？給人的印象是，這一發展的爆炸性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不錯，德語在教廷一直不是很強的臨在過。拉丁系語言是熟識的，近來英語也熟悉，德語卻繼續不太受到注意。儘管如

此，現在在羅馬可覺察德語和德國人的不可小覷的臨在。也許在羅馬不易領悟德國情形的整體特性，因為這一特性多次跟一些大學的晦澀學說連在一起，為生活在完全不同文化世界的人是不易明瞭的。與德國的交談走的蹣跚是真的。但我相信，反應作的不太快，也有些好處。總之，我想與德國主教交談應該予以強化。

目前侵襲教會的這一危機有多大的重要性？是從開始以來最大的挑戰嗎？教會的危機為世界有何意義？你本人有一次曾聲明過，教會的消滅會引發一次精神的海嘯，其廣度我們連想也想像不到。

為答覆你的第一個問題，我一無所知，它確定是我們面對的很大挑戰之一。但在古代教會我們也知道有過許多很大的困難。第一個是諾斯底派 (gnosis)：在教會內逐漸把敬禮和信仰轉變成一些意識形態，神話和圖像，這一切好像不知不覺地要慢慢控制整個教會。今天讀這些資料時，會想像一邊有諾斯底派的人，另一邊則有教父們。其實不是這樣，而是二者交錯著緊密相連，首先必須把這一切慢慢澄清。其時也有一種很容易了解的嘗試，要擯棄舊約，而以聖保祿為準繩。當人願自我界定時，這類運動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曾變得十分複雜。此外在教會開端時尚無訓導權，可以有效地加以干預。有所爭吵，必須一點一滴地由內部予以協調。可見那時基督信仰不難變成另外一種東西。我想，在基督宗教的開端，當它應該首先開始自我塑造時，已經有了一次大危機。

第二個危機——的確不那麼嚴重，但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

問題——是亞略主義：當時羅馬皇帝暫時站在亞略道理的一邊，因為這道理更易配合主宰者的心態。道理是這樣的：只有一個天主，然後有基督，基督是相似天主的存在，但他本身不是天主。這，大家都能懂。當時整個政治機構都發動，要人接受這個道理。連主教們也一個一個地倒下，甚至一些主教團全體。最後整個德國世界成了亞略派，導致古世界，即各拉丁民族是天主公教，而新世界，即各德國民族是亞略派。當時人相信，如此不難認出，新奇、未來，會走向哪個方向。

我想第十六世紀的危機也很嚴重，雖然它並未觸及根蒂，因為對信仰的原則的共同依附繼續存在。但教會的內在混亂多而大，火上加油的是，宗教改革即刻轉過來分成不同的運動，有些是走極端的。

可見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比較起來，也許不是由歷史之初的最大問題，但確實是一個侵犯根蒂的問題。

## 衰退諸原因

教會的危機怎麼嚴重到如此地步？但如果你允許的話，我首先想問你，是否應該在教會以外找出一些原因。

啓蒙運動世紀（第十七～十八世紀）以來，一個廣泛的運動把教會看作過時的制度。現代思想越發展，這意見越加強。雖然在十九世紀興起了一些回歸運動，但一般的路線，在整體上，延伸下來。最高的準則是科學的證明；由之產生——在布爾特曼身上清晰可見——一種所謂的世界現代圖像的專橫，其

性質非常教條，排斥天主對世界的任何干預，如奇蹟和啓示。人一定可以有宗教，但宗教成爲一主觀的數據，不能有些信理的和適於大家的內涵；同樣，信理顯得與人的理性衝突。教會面對著這歷史的逆風，如果願意這樣說的話，而這陣逆風還會吹下去。

儘管如此，這個由啓蒙運動繼承下來的激進立場，不難看出其偏面性，因爲一個純主觀的宗教不再有任何塑造力，是主體在建立他自己。單純的，限於自然科學的合理性，也答覆不了一些個別的問題。我們由何而來，我是誰，我該怎樣生活，我爲何在此？這些問題側身於合理性的另一層次，不可把它遣發給純主觀或非理性。因此教會在不久的未來不會再單純地是整個社會的一個生活方式，不會再有一個中世紀，至少在不久的未來不會有。教會將永遠是個補充運動，甚至一個反運動，與生命的主流構思對立；同時，教會也將證實其重要性，及人性方面給它提供的建構基礎。

啓蒙運動末期，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有人說過：現在教宗是基督宗教的達賴喇嘛，終必消失，好讓理智的紀元開端。其實確曾消失了片刻——教宗放逐法國時。但十九世紀，教宗制度變得更強，從來沒有那樣強過。十九世紀的基督徒宗教固然沒有重獲中世紀的那種力量和形式，但代之的是更美好的東西，許多社會性的飛躍發展產生其成果。將來會有兩股力量，兩道強大的潮流，互不相依，但也會嘗試接頭。世界的新局勢使信仰更複雜化，爲信仰作決擇會變得更個人的，更困難的，但世界不會放棄基督宗教，視之爲過去留下的陳舊痕跡。

教會遇到一些新的競爭者，人們比較、評估，尋找新的避

難所。爲以前的那些世代爲保存他們的信仰，也許比較簡單，因爲爲他們那是祖先們的宗教，這宗教受過時代的各種考驗，而不應該造成太多問題。今天，這種關係基本地改變了。人們建起一種現代俗化的信理，依此，教會首先建基於壓迫和權力上。現在人們已開明了，世界各國也都俗化了，難怪教會這顆星開始沒落。

關於這一主題，我打算說兩件事：第一，業已證實出來，在那些極權的政體裡，教會因不同意被整合到對生命的單一看法中，卻留在對立的一端而在此顯示爲一普世團體，因此代表一股反壓迫的力量。第二十世紀以至今所未識的方式揭發了，教會作爲團體的這種合一構成一股對抗的力量，反制一切政治和經濟的機構，不讓它們壓迫世界，使全世劃一；教會給人一個自由的空間，並給壓迫者畫出最後的界線。殉道者常爲了別人，以模範的態度承受了這一切。說教會是自由的成因，可在東歐、中國、南美和非洲看得出。教會是自由的成因，因爲它有團體形式，這形式也包括團體的投入。因此如果我起來反抗獨裁，我作這事不只是以我個人的名義，還是出自一股內在的力量，它超過自我和我的主觀性。

第二點。有一種意識形態，它把存在的一切最後引歸到權力的行爲。這一意識形態腐化人類，也毀滅教會。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假使我只在權力的觀點下看教會，那麼教會內所有那些無職位的人，已經都是受壓迫者了。這樣女性晉秩的問題由權力的概念走入壓迫的概念，因爲大家都該有權利得到權力。我相信這一意識形態，到處只見到權力的賭注，摧毀連帶責任，不僅在教會內，也在一般的生活裡。它也給人完全錯誤

的看法，好像權力在教會裡是最後的目標，好像權力是容許人解釋世界及其所形成的團體的唯一範疇。我們在教會裡一定不像在一個協會裡那樣爲了操作權力。歸屬教會如果有意義的話，那只能是這個：它給我們永生，並且一般說來，它使生命正直、踏實，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不是這樣，教會裡的一切「權力」，降到一般協會的層次，就成了一齣荒謬劇。我深信我們該走出這個權力的意識形態，這種簡化，它還是來自一些馬克斯的控訴。

教會推出一大堆禁令，好像交通規則，來指揮生活的速度。反之，目前的生活格局卻在每一個十字路口給我們指出：「可以走，快些。」在這種由快速產生的愜意的眼花撩亂中，宗教被社會允許爲一個幸福無痛的夢，某些心靈的神秘巫術。教會也許更粗暴地受到批判，並被奪去當今精神躍進的種種好處，因為它提出好多要求，講罪、講痛苦，並講一條建基於正義的路。我給這個奇怪的狀態舉一個例子：在國家的層次上，好像一發現違規加多，社會在其治安上受到威脅，即刻要求定出一些更嚴苛的法律。教會一方面，卻正相反，它的那些法律都是道德性質的，而人常向教會要求更多的寬容。

在今天對生命的看法中，自主的意念及反權威的意念，如果能這樣說的話，佔著極其支配性的地位，就像權力的概念一樣。這兩個意念溶合成一個單獨的範疇，在人的團體中是真正算數的範疇。種種後果顯而易見：既然自立的主體說最後一句

話，那麼他所要的一切都是許可的。那麼他願意把生命中所能有的一切都帶進他的大包小包裡。我發覺這實在是今天的生活所提出的一個很大問題。人說，生命本身就複雜、短促，我要從中吸取一切可能得到的，誰也不該阻擋我。一切之上，我應該把屬於我的那一塊生命奪取過來，以實現我自己，誰也不該混入其中。誰要阻擋我全力抓緊生命，他就是我的敵人。

我們也能看到這種對生命的看法透露在開羅和北京的會議記錄的背景中（指聯合國的人口與發展會議及世界婦女會議）。人被看成純個人，他以外別無一物。構成人本身一部分，並只由之而成爲真實自我的「關係」被剝奪了。這種要作最後及唯一自我決定主體的要求，這個不顧一切，不願受任何人的束縛，要獲取生命所能給的一切的意願，是給今天的人呈獻的對生命的看法一些必然具有的因素。以此爲準，那句「你不應該」——有些標準是我們應該順服的——是一種被感受爲攻擊性的干預，因此起而自衛。總而言之，這裡爭論的又是個基本問題：人怎樣才會幸福？爲善度他的一生，人該作什麼？爲達到幸福，人除他自己以外，真是不該有其他標準嗎？

不久以前，我曾跟一些朋友在 **Frascati** 一帶討論這件事。那時正要修剪葡萄樹，原來必須每年修剪一次，才結出葡萄來，修剪爲結果實是不可少的。聖若望福音清楚地給我們說，被修的葡萄樹枝代表人生，也代表教會團體。如果沒有勇氣加以修剪，就會只長出葉子。若把它貼合在教會上：只剩下一些紙張（文件），湧現不出任何生命。但我們還是回來聽基督的話：當你相信你該是你唯一的主人，並要保衛你自己，那正是你失去自己的時候。因爲你不是建立的像一座島嶼，你不是一

個棲息於自己的我，你的建立是爲了愛，因此是爲了給，爲了放棄，爲了把你自己洗清。只有當你給出你自己，失去你自己時，你才生活，正如基督說過的。

這個基本的抉擇必須很清楚地暴露出來，以提供給人自由。但是也該看到，只以擺脫眼前急需來生活，仍是一種錯誤的生活樣式。拒絕吃苦，拒絕我們受造物的條件，就是說不願馴服於一個規章，最後就是拒絕愛的本身，這會造成人的毀滅。因爲正是在委順於一個要求，並讓自己被修剪時，人才會成熟，並結出果實。

我們越來越多地觀察到，現在的青年人覺得向他們要求的不夠多。這部份地解釋爲何他們投入那些非常強制性的教派；他們尋求的首先是一種安全，一個保護，但他們也願人們向他多所要求。人自身就確信：應向我多多要求，我也該就合更高的標準，我還該自我給予，並學習讓自己消失。

信仰與社會的分歧無疑也來自一個事實，即社會嘗試著把教會、歷史和道理放在一種被接受與否的控制下。這一出發點難道錯到哪裡去了嗎？

如果試著達到對信仰的某種理解，那沒有什麼錯。從一開始基督信息就是這樣宣揚的。基督信仰是透過一些傳教士滲入世界，有此可能是因爲信仰是可了解的，並且能清楚地現示在人面前。聖保祿在各會堂不只能給猶太人講道，也跟那些被稱爲「敬畏天主」的人，就是那些在以色列的一神論裡承認真天主的外邦人。保祿引經據典地讓他們明瞭，只有跟基督、猶太教及受其影響而信唯一神的外邦人，才能達到完滿的邏輯。在

此程度，基督宗教努力使答案被人了解是不能不作的。不過若把受歡迎度的概念懂成狹義的，以致只把基督信仰中合乎我們目前生活習慣的東西保存下來，那就是降低基督信仰，而我們自己也一文不值了。

## 教會的失誤

柯尼刻樞機曾如此描繪教會在世界的目前局勢：「說到底，無非是俗世的發展，引來教會與世界的分離。在現代人的良知狀態與基督的道理之間有著日益增長的分歧。」樞機繼續說：「教會自己也該以一種非常批判性的精神自問，在這樣一種溝通的缺乏上，自己有多大責任，而思有所補救。」

柯尼刻樞機所說的溝通的缺乏確是眾所周知的，我想我們實在應該負一部分責任。一方面，我們找不著能讓今日人心聽得懂的語言。我們還是用原則，救贖、賠罪、過失等概念。這些詞字果然說出真理，但在今天的語言裡為大部分人已不再有什麼意義。把它們重新說通，無疑的是我們應全力以赴的義務。但要想有成，必須我們自己先由內心把這些事活出來。一旦活出來了，它們再度成可了解的，就能把它們重新說出來。我還該加一句，基督信仰的傳達從來不是純理智的傳達。它所說的，含括整個人的存在，而我除非進入遵循這同道路的團體裡，我不能了解它。可見這裡有兩個要求：真實地活出基督信仰以達致自己對它的了解，和創造新的語言，是靠這團體來

創造，這團體認可我們所說的種種。

在大眾輿論裡教會的形象多次是威脅的和僵化的當局。為什麼制度性的教會是如此嚴肅？教會作為羊群的守護者不是應該更慈母般地為爭取人靈而戰嗎？

不錯，為很多人，教會的許多話最後剩下的只是一些倫理的禁令——特別是在性倫理的領域。那些人所有的印象是，這裡所作的無非是判決和縮小生命。也許朝此方向說的太多，也太頻繁——忽視了與真理和愛該有的連繫。我相信這也來自傳媒所作的選擇和傳播。那些禁令提供有趣的資訊，可以說它們有一可捉摸的內涵。反之，當說到天主、基督，許多信仰的中心點時，那是不得進入一般的語言，不會被它領悟的。也該加以質問，教會除了只知責怪傳媒以外，如何它自己能恰如其分的向大眾輿論鋪陳。在信仰的內在生活裡，其間宣揚信仰的特質本身，會把握各種事理之間的準確關係，而那些禁令會找到它們的真位置、真價值，因是在一更大、更積極的整體裡。要使一切盡可能地就合大眾，會使許多勻稱變形。教會應該自問如何找到適當的比例，用在它在自己內部宣講時，這裡它所表達的信仰結構是大家所共享的，或用在向世界說話時，這裡它的話只部分地被人領會。

公開輿論每每有一個印象，教會只作出反應，限於堅持己見，嚴格地指出天主的誠命，並依賴天主不讓祂的教會滅亡。為普遍的活力所圍繞，教會卻像未能改變它的邏輯，卻頑固地繼續肯定它自己。這樣它給人的印象不

是什麼徹頭徹尾，而是化石一般的堅硬，四周築起高牆，像一座堡壘。它所應該傳遞的訊息是一個早已作好的格式。

按照每個國家的文化這當然是很不同的。在共黨政權下受迫害時，這在信友們身上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但連在那些不信者或那些尋找的人身上，如 Vaclav Havel 也是如此。在那些情形下人真實領會到，教會是宣講自由的訊息者，教會提供平衡的力量，教會是一股力量，也可給無信者一些東西，並向人保證，集權政體絕不會永遠當家。

在非洲亦然，在此教會以許多方式與國家，與非洲各國的大問題——腐敗對抗，因此主要印象倒不是教會頑固地肯定自己，而是它真是一股活力充沛的力量；教會也保衛第三世界，為之採取許多措施；它不限制於幫助發展一些物質目標的固定型態，而真正增進活生生的交換。在美洲也是如此，印象完全是一樣。因此按照接受的國家，一切都會不同，有的把教會看為真正充滿活力的，有的則否。在我們德國，在中歐，教會只顯示為進步的敵人，專注於保護自己，我相信這是自衛意志的反彈。這批人受不了教會反對許多我們所喜歡和滿意的事。

你們不要向世界看齊，教宗這樣要求。但教會本身不是太向世界看齊了嗎？它好像熱中於保存自己繼承的產業，它投入很多金錢、時間和精力以保存自己的不動產。難道它不該以更大的可見度來實踐那構成它的各種誠命的內容嗎？

關於這一點，我願給你說出原委。連在教會裡，惰性的力量也是很強的，結果教會趨向保護它一度獲得的財產和地位。自限和自我清理的官能沒有得到該有的發展。我相信這也牽涉到我們德國這裡。在此，我們有多於宗教精神能蓋滿的宗教機構。教會因緊扣它的這些機構不放，雖然內裡已乏善可陳，而失去可信性。這樣在一座醫院，或比方一座學校裡給人的印象是，有些人並不真正心裡信服，卻釘住這個宗教框架留在裡面，唯一的理由是教會是業主，並有決定權。這裡不得不作一次良心查問了。不幸的是，歷史上一直如此，連教會也未能主動地放棄它地上的財產，而常須由它手中奪去，在這由它奪取的過程中反而有助於它的健康。

不過事態也曾以另一種方式發生，我想到本世紀初，於教宗比約十世時，在法國教會與國家的分隔。那時，曾向教會提出一個格式，它可保存它的財產，但必須置於國家的監督之下。此刻，比約十世作出聲明：教會的財寶（單數）比它的財產（複數）更重要。我們放棄財產，因為我們應該保護財寶。我認為這是一句名言，必須常放在心裡。

我自問為何教會不給我們這些基督信仰的白丁作更好的信仰傳遞，為何它不更頻繁地提說天主教偉大處、思想的自由、修好和仁慈。也令我感到遺憾的是它的那些傳統禮規，它的風俗習慣，它的各種慶節。它本可以非常自豪地予以慶祝，因為說到最後，它究竟有一個兩千年經驗的本領。在以撒 Singer 的書裡我曾讀到猶太人帳棚節的描述。在那裡，拉比於用餐前譜唱祈禱經文，

並宣講。這樣一種托拉釋義使熱誠派的人(Hassidim)興奮，別人尚從未聽過，拉比真把一些神聖的奧秘揭開了。到了晚上，終於在桌子上鋪開慶節的桌布，上面放了一盤編織的奶油圓球蛋糕，旁邊放著盛滿酒的長頸大肚玻璃瓶和一隻祝禱之杯。那些參加的人有的印象是，那個帳棚成了天主家中許多住所之一。在我們之間，基督徒的聚會變成了用豬肝糜和啤酒來慶祝的資產階級節日。

這裡，我們又碰到我上面講過的主題，基督信仰與社會的混合，及基督教因素與社會習俗和慶節的溶合。我卻寧願討論另一個主題。那位拉比一定沒有說什麼全新的，而是在信仰中並以隆重完成的禮節刷新一切，而使信仰臨現於現實中。

在我們的禮儀改革上，有一種趨勢，我想是錯誤的，就是要在現代世界裡把禮儀「本土化」。禮儀該更短；凡是判為不能明瞭的都該剔去；一切都該轉化為更平淡的語言。但如此，禮儀和禮儀慶節的本質都被忽視了。因為在禮儀中不僅以理性方式予以了解，像我了解一門學科那樣，而是用一種複雜的方式，用所有的官能。至於所參與的任何慶節不是哪個委員會發明的，而是來自數千年的最深處，並且算到底，是來自永恆。

當猶太教失去聖殿後，它停留依附在一些慶節和會堂的禮節上，而因了這些他們視之為天主之家的禮節的大節日的禮儀慶祝得以保持其團結。在這些禮節上有某種共同生活的形式；這裡不在於使宗教得到膚淺的了解，而是信仰歷史的大延續在

此表達出來，並以其全部的能力呈現眼前，這能力不僅來自個人。司祭不是「表演家」，或遊戲鼓動者，想像一件事，再巧妙地傳達開來。相反，他能毫無表演的天才，因為他代表另一類事，並且根本也不是他的事。

當然，可悟性是禮儀的一部分，因此天主的話應該高聲念出，接著加以解釋和闡明。但聖言得以懂悟是因了其他的各種了解方式。首先，並不是一些新的委員會可以運作出這個可悟性。不然的話，人的手痕太明顯了，不管那些委員會是在羅馬、特里爾或巴黎。反之，可悟性應該真正保持其延續性、逃脫任性，讓我真實遇到那些千年，並透過它們遇到永恆，並被提升和放在一個慶節的團體，這團體跟那些委員會或代表會的種種發明沒有多大瓜葛。

我相信這裡曾產生一種神職主義的形式，讓我們更易明瞭為何希望女性晉秩。如果賦予司鐸的重要性是「在人」，他應該靈巧地扮演其角色，並且做好的解釋員。他是慶節的真正中心。於是人們終於會說出：為什麼只有他？反過來，如果司鐸的人的一面停留在幕後，只以代表出現，並只讓人看到信仰的實現，一切便不再轉向他了。他退在一邊，而一種更大的事會出現。那時，我深信，應該重新清澈地看出傳統的能源和力量，它不會讓人操縱。其美麗和偉大也感動不能理性地了解或消化一切細節的人。在这一切的中心明顯地有天主的聖言，予以宣報，予以解釋。

為攻打這種要把一切拉平的狂妄和這一幻想的破滅，而嚴格地重行古禮，是否是不可思議的？

只作這一點不是解決辦法。我確實認為對那些希企有保存古禮的權利的一切人應該更大方地予以允諾。此外看不出這有什麼危險或不能接受的。一個團體忽然宣佈，直至今刻它以之為最神聖、最高尚的一切，都嚴格地被禁止，並且它所感到的遺憾也被說成不當的，這個團體本身就成了問題。怎麼還能信它呢？它是否明天要禁止今天所規定的呢？不過單純地回到老舊，如同我說過的，也不是一個解決。我們的文化在這最後三十年裡如此徹底地改變了，以致專用拉丁文慶祝禮儀會給人古怪的印象。我們所需要的是新的禮儀教育，特別是司鐸們的教育。有一點必須再度澄清：禮儀學不是為了不斷出產新樣品而存在的，就像汽車工業該做的那樣。禮儀學的存在是為引人入慶典，使人向奧跡開放。在這一點上，不僅應該向東方教會學習，還該向全世的各宗教學習。這些宗教都知道禮儀不限於發明一些文本和禮節，禮儀正確的存活是靠那不能操縱的因素。年輕一代強烈地覺出這一點。有些慶祝禮儀毫無做作，卻有一份敬意和崇高，就吸引人，雖然並不是每句話都了解。就是這類堪作標準的團體是我們所需要的。不幸的是，對那些冒險的幻想我們有著幾乎無限度的寬容，而對待老的禮儀實際上無寬容可言。這樣走下去，一定不是一條好路。

教會的危機——能確定它開始的時刻嗎？是過去犯的一些過錯的後果嗎？教會也曾堆積太多的壓艙貨，太多的債務，而現在須予以償清？

一方面當然有一條歷史的連線，是我們不能閃避的。就像我們德國歷史，有其善和惡的重擔，一代一代干涉著我們大

家，教會的歷史也是如此。必須自問的是：有哪些重負和錯誤是我們應該意識到並承認的？但除此以外，也有每個活生生的世代所代表的新穎。

因此我不把目前的危機歸給太長遠的歷史淵源，雖然這危機有其過去的一些原因。新的歷史局勢也引來高潮和低潮。我還是引用下面的例子：當政治自由主義達到其高峰的一刻，在教會裡一致地有過關於現代主義的討論，教宗比約十世非常機智地加以指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方告結束。今天有很多人說當時應該徹底討論那些問題，而不該予以遏制。但事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被人感到是自由主義的失敗，它不再是一股在精神上有決定性的力量。其時出乎意料地出生一種全新的意識境況。不只天主教內如此，基督新教亦然。自由神學的大師哈爾納克退下來，而讓卡爾巴特以他的新的徹底信仰予以代替；艾里克彼得森，這位基督教偉大的詮釋家和歷史學者皈依天主教。基督教會裡產生新禮儀運動，從前自由神學是很反對敬禮的。這都說明，這些新世代來臨時，無人再關心那些現代主義的問題了。這一現象能在羅瑪諾瓜爾底尼的一生觀察的很清楚。他是在這個自由時期讀書的，後來他所採取的立場卻是故意反自由主義的。

二次大戰後，這一局勢還延續了一段時間，但以後倏忽間出現了一個富裕舒適的世界，遠遠超過以往的「美麗時代」。這樣形成一種新自由主義，而基督宗教突然顯得比從前還要落後，比第一次大戰前更虛假而不合時宜。

用這種尺度來看，必須把各種危機的那些現象按照它們在歷史中產生的那個時刻來看。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在某一程度

上馬克思有理；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組合也是其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個反映。

**教會目前的衰退有可能也是自我清洗的巨大力量的業績？**

自我清洗的那些力量在操作，這是我深信不疑的。但不該太快把失去信仰，放鬆信仰解釋為煉淨的過程。目前的情勢提供一個可能，讓人自清，但如何利用這可能，有多種不同的方式。這裡我們又來到教會的財產和機構問題。衰退能引來煉淨，但不是以自動方式，純粹因為有衰退，就有煉淨。

給教會作評價，不能按照它的成就，至少以政治或經濟的那些標準來說，就是說不按它事業的總額或成員的數目。無論怎樣，基督曾談過管家，家主託付給他們一些財產，他們應該經營獲利——甚至用一些不大正經的方法。

首先該問的是如何正確地解釋那些比喻。耶穌在此以銀行作比，把能處理的錢以投機取利，不應該將此懂成指點一個方法。不正經的管家的故事是一個特別難的比喻，其中耶穌說：好吧，無論怎樣，他總找到了一個解決，你們也該像他那樣考慮周密——並不意味須用不正當的方法。它要說的無疑是，必須謹慎機智，把握送到眼前的機會；也說明想像力和創造性有它們應扮演的角色。這就不得不意謂，只作一個懂事故的信者，心裡說：我熱心事主，我這樣子已感幸福，別人作什麼與我無關，已不夠。事實上賜給我們的信仰是爲了傳給別人，一旦只

想爲自己一人保存，就不是全權擁有信仰。一個真正由內心接受的基督信仰含有活力和義務把它傳開。具體說來，比方我有所發現，如某一處理事務的方式——我不能說這爲我就夠了。除非我把它告訴別人，我的發現是不存在的。就像當人感到大喜樂時，他必用某種方式說出，並傳給別人，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喜樂。這樣，傳遞的活力包括在基督給祂的弟子的使命之內，就像包括對想像力和大膽行事的鼓勵一樣，連有所損失的危險也不必管。可見我們不可平安無事地坐在那裡說：好吧，這改變不了什麼，天主從未被稱爲「成就」，令人滿意的，我們把該作的作了，誰來，誰不來，以後看吧。意識到所接受的恩惠，是爲了整個人類，因而造成的這種不安應該常存留於教會內。

另一方面也有句話說：「我派你們如同送羊到狼群裡一樣」，又說：「你將受到迫害」。這給我們預言，我們的事業，將常跟基督自己的命運相關聯。我認爲基督徒團體應該生活在這種張力中。我們不該自滿自足地說：我們已達到我們的水平了，不能作更多——而常有義務做好的管家，他們讓銀錢生息，如同基督所說的，但另一方面從不會將成就掌握於手中。

## 幾個批評的主調

關於對教會所作的一些批評，你有一次提及「典型的一些問題」：女性晉秩、避孕、獨身、離婚者再婚。這樣數出批評諸點始於一九八四年。關於基督宗教諸問題，於一九九五年在奧國、德國和瑞士所舉行的人民公投顯

示，那個問題的典型絲毫未變。問題的討論好像在兜圈子，令人厭倦。也許某些澄清有助改進。我覺得很多人在講教宗制或司祭職時，他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不懂這些概念的意義。

我還要再度強調，這些問題的確是真實的難題，但我相信把這些問題升級為關鍵問題，並以之為基督宗教的唯一課題，就大錯特錯了。一個很簡單的證據（若翰墨茨在一篇討論宗教公投的文章裡已經說過）起而反對這種看法，就是這些難題在基督新教裡已得到解決，這方面他們走了另一條路。但眾所周知，他們如此並未找到在今日世界做基督徒的更好方式，而基督宗教的難題，做基督徒的困惑為他們跟已往一樣，仍是戲劇性的。如果我記得的正確，墨茨曾發問：為什麼我們要來個基督新教的複製品呢？他說：作了一次實驗是好事，因為得以證實能造成今天基督宗教失敗的不是「此事」，不是這些難題。這些事的解決不使福音更有吸引力，也不使基督徒的生活更容易，連使教會團結的一個協議也未達成。我認為應該一勞永逸地認清這一點：教會苦於承當的一定不是這些難題。

## 1. 不能舛錯的信理

那麼，如果你同意的話，我們就從基督新教很久以前就已解決了的一點開始：不能舛錯的信理。這一信理的真實意義何在？下面的解釋對或錯：教宗所說的一切都自動地以之為神聖的，正確的？在涉及這些批評的主調

時，我願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它明顯觸及不少的人，不管是為了什麼理由。

你剛剛已揭發了一個錯誤。其實這一信理並不意謂教宗在他所說的一切都是不能錯的。它的意義非常簡單：在基督宗教裡，至少按照天主教的信仰，有一個作決定的最後當局，使得歸根到底，關於一些基本的問題，能絕對地作出決定，而我們也能安然於心：基督的遺產有確切的解釋。這一絕對的特性，以任何形式，存在於一切基督信仰的團體，但不一定與教宗有所關聯。

東正教會亦然，大公會議的那些決議顯然是不能錯的，意思是當它們肯定：這裡基督的遺產解釋的好，這是我們共同的信仰時，我可予以信賴。可以說不是每人該重新釀造這遺產，由聖經中榨取出來，而是教會被授予達成一個共同確定的可能。我們跟東正教不同的只是羅馬天主教，在大公會以外，承認另一當局，可以結予這個保證：聖伯鐸的繼承人。教宗當然受到一些條件的約束，以保證——也使他深深地投入——他不是按照自己主觀的意識，卻是在傳統的大團體裡作出決定。

為找出這一解決，無論如何，須花費很長時間。

在有一個大會的神學之前，也曾開過多次大會。尼采大會的教長們，在三二五年的第一屆大會中還不知道大會是什麼，那是皇帝召集的。儘管如此，他們已經了解，不僅是他們本人在說話，他們能說（也是宗徒會議所說的）：「聖神和我們決定了……」（宗十五28），就是說：聖神跟我們，透過我們作

了決定。尼采大會接著說及在教會中的三個首席，羅馬、安底約基及亞歷山大里亞。這樣大會說出三個控制當局的名字，三個都跟伯鐸傳統有聯繫。羅馬和安底約基是聖伯鐸的主教座席，亞歷山大里亞是聖瑪爾谷的主教座席，同樣與伯鐸傳統相連，而形成三足鼎立。

羅馬的主教們很早就清楚地知道他們是繼續著聖伯鐸的傳統，並且他們同時有責任，也有許諾幫助他們負起這責任。這在亞略危機中，當羅馬是能頂住皇帝的唯一機構時，顯得十分清楚。羅馬的主教，他當然應該聆聽整個教會，而不是信仰的創造者，有一個功能，是在給伯鐸所作許諾的這條線上。實際上，以概念將這種種予以格式化，要到一八七〇年才作到。

也許還該注意一點，即在此期間，連在天主教以外，也越來越明白，一個能維持統一的當局為整體是需要的。比方在與英國教會的交談中，這一點曾顯露出來。英國教會人士願意承認，把首席傳統固定在羅馬可以說是受到天主眷顧的領導，雖然他們不願把給伯鐸作的許諾直接關聯到教宗。基督教的其他派別也承認基督宗教應有一個代言人，他可在一個人身上具體化。東正教會也如此，不同的聲音起來表達對教會的分成多頭制（國家教會）的批評，並認為反過來回歸伯鐸原則是有用的。這不是承認羅馬教會的信理，但各方的輻合越來越明顯。

## 2. 噩耗代替了佳音

有個批評說，天主教的传统道德其實是建立在罪惡感上。這個道德觀首先是特別消極的，當它對性作出判斷

時。教會給人強加一些額外的重擔，這些重擔與啟示毫無關係。現在人們說，基督宗教神學，不該再建立在罪和悔罪上。在宗教正規之外，應該，也確能再度發現活出來的宗教經驗的奧秘。

這種佳音與噩耗的過於簡化的對立，老實說我從來不知其所云。讀福音的人會看出基督曾宣講佳音，但這佳音與審判的音訊同時出現。在福音中，關於審判的一些話是如此嚴重，使人不寒而慄。這不該瞞著不說。主耶穌顯然不會在「有一審判的訊息」和「有一救恩的訊息」之間看到任何矛盾。正相反，說有審判，說有公道，至少為那些受壓迫的人，為那些受到不義待遇的人，是一個真實的希望，而在此範圍內，是一個好消息。反之，誰自列於壓迫人者和製造冤曲者之中，他自會覺得受到威脅。

阿多爾諾也說過，為能有公道，必須有死人的復活，好使過去的不義得到追溯既往的補償。因此必須在某一定點有不義的補償，有正義的勝利，這是我們大家所殷切期待的。基督和祂的審判不是惡的勝利，而是善的勝利：這樣，天主是公義的，並且祂就是法官這一事實是十分有深度的好消息。不錯，這一好消息給我加上一些義務。不過，如果我只把它看做我所是的一個確認，到頭來，它也沒有什麼意義，也無非是一種麻醉罷了。在考慮到那些受苦的人，那些有權利要求正義，卻從未得到公道待遇的人，我們也該再度對這審判的意念多所熟悉，——然後委順於這一判準之下，並努力不要把自己列入製造冤曲者的行列。

當然，在審判的訊息裡有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這也是件好事。我想說的是，在中世紀那些掌權者造成許多冤曲，但後來他們想起他們會受到審判，於是就建立許多基金善會，力行善功，以賠補他們所作的惡。由此可見審判的意識也是一個政治和社會因素。當我意識到，我不能就這樣簡簡單單地離開世界，卻該以某種方式把我的賬目弄清，並且有一個更高的威脅也懸在那些大權在握的人的頭上，這是非常健康的，為一切都具體有益。

話還沒有說完。透過基督我們知道，這位法官並不鐵面無情地應用法典的那些條文，而知道開恩，最後我們可以無恐無懼地出現在他面前。不過我認為每人應該在其內心找到這個平衡：感覺到審判的存在，承認我不能無牽無掛地一意孤行，在我上面有一個法庭——另一方面不讓心窄和惶恐不安侵入。

我覺得教會和牧靈工作應循此路線講論審判。教會也該能威脅那些有權勢的人，對那些糟蹋他們的生命、浪用自己破壞生命的人，教會也該能以威脅的態度予以面對，以正義和公益的名義，也以他們本身的真益處、真幸福的名義。但教會不該成爲一個令人恐懼的勢力，也該注意它在跟誰說話。有些敏感的人，幾乎已是病態，他們很快陷入恐懼中。對這類人必須剔除那些令人起畏的圖像，而盡力讓恩寵的話照耀。但也有些厚皮的人，必須予以重擊。我相信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但其方式使得審判可以成爲一個好消息，因爲這審判給我們確定：世界是公正的，聖善會得到勝利。

### 3.我們是天主的子民

「天主子民」這一概念今天被懂成：面對教會的制度，一個自立的意願，按照「我們是人民」這一口號認為人民所說的就該成立。另一方面，有句俗話也說：「人民的聲音是天主的聲音」。你對這一概念有何想法？

如果我們是神學家和信者，那麼首先應該聽聽聖經說什麼。我們一定不能自己發明那些大概念：「天主是誰」，「教會是什麼？」「恩寵」等等。信仰的恩賜正是在此，即預先有一個恩賜。「天主子民」的概念出自聖經。聖經用此概念的方式為我們該是一個準則，當我們也要用它時。首先和基本的一點是，此概念出現在舊約中，在此「人民」的概念還在國家時代以前出現，而更加與支派，與家庭相關聯。

但在一切之前，它是一個關係的概念，新詮釋學將此更清晰地確定下來。當以色列僅以政治國家身份有所作為時，它不是天主的子民。當它轉向天主時，才成為天主的子民。只在它與天主的關係上，當它轉向天主時，它才是天主的子民，而這層關係為以色列來說，就在於它服從托拉（梅瑟五書）。在舊約裡「天主子民」的概念首先假定一個事實：天主揀選了以色列，不是因它的什麼特殊功績，相反，它不是大的，重要的民族，而是最小當中的一個。天主因愛，選了它，並使祂的愛留在它那裡。另一方面，這一概念，也包含接受這個愛，具體的說，就是服從托拉。只在這個使以色列與天主有所關聯的服從中，它才是天主的子民。

在新約裡，「天主子民」的概念（除一、二處以外）只與以色列，即舊約的人民有關，不是直接指謂教會的概念。但教會被懂成以色列的延續，雖然基督徒不是由亞巴郎出生，嚴格說來，也不屬於這個民族。新約說，他們進入這民族，是因為他們由基督出生，這樣他們也成了亞巴郎的子孫。因此屬於基督的人，就屬於天主子民。我們能說基督本身取替了「托拉」，準此，「天主子民」這一範疇，雖然新的子民不直接為其一部份，也就指謂基督的團體及效法基督的生活及跟祂一起的生活，或一如聖保祿所說的：「你們彼此間該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那些心情」（斐二5）。「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他這樣予以描寫：他聽命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唯有我把「天主子民」的概念按照其聖經的詞義重新採用，才是以基督徒的方式加以運用，其他一切的法都是基督信仰外的一些構想，忽視了本質。依我的看法，那也是驕傲的產品。誰敢自命「我們是天主的子民」——等於聲明其他的人大概就不是了。

關於「我們是人民」這一格式我願加上一個純實際的思考。由「我們是人民」也引出：「是我們作決定。」比方說，今天在德國某一協會的成員聚集起來並聲明：「我們是人民，因此我們決定，現在這些事該是如此如此」，聽的人不是只有笑的份兒嗎？每個民族有它的各種機構，誰都知道不是市政會議投票決定聯邦法律，而是國會，就是代表全體人民的機關。同樣不是任何人能代表教會的全數「我們」並即刻有資格採取決定：這些決定只能被全體採納，或被特別的一群人，按照他們活在這一整體的程度。只從民主的角度來看，一些小組本身為全體作決定已是荒誕不經。一個本堂團體或一個教區論壇應

該著手「他們的」事。以本堂或教區的身份不能企圖為全教會的事務作決定。

在教會裡除了公共法律的這些資料以外，（它們為教會也有重要性）還加上一個事實，就是教會不只活出橫的一面（同代），也活出縱的一面（世世代代）。就是說，所有的人都一直活著——連死去的人在內——而他們就是整個教會，這一切人一直屬於教會內的大多數。在一個國家裡，比方我們昨天有雷根政府，今天則有柯林頓政府。每一政府摔掉前一政府所作的事而聲明今天一切開始。這在教會是沒有的事。教會正是靠世世代代的自我認同而活，他們的這一認同侵入時間，而聖人們正式形成教會的大多數。每一世代力圖在聖人間佔有一席之地而作出它的貢獻。但它只有接受這個大的延續性，並與之過從密切時才作到得。

國家方面當然也有延續性，是不依賴每屆總統而獨立存在的。

你說的對，剛才所說是快了一點。在一個國家裡也一樣，不是每個政府都該從頭作起，它含括在一個大國家傳統裡，受到憲法的約束，不能由零出發重建國家。在一個國家如此，在教會也是這樣，但在教會內還更嚴格、更深入。

目前有些運動，自稱「我們是人民」；他們不再管傳統的那些規定、那些法律、那些會議，他們乾脆由柵欄上方跳過。

你要說，在國家方面？對，對。在此範圍，當這現象觸及

教會時，就沒有什麼了不起了。但在國家方面這一點行不通，已由一些只建立於基層的民主運動給我們證實了。蘇聯是這樣開始的。透過那些「議會」，「基層」應該作出一些決定，所有的人都該積極參與政府。所謂的直接民主，與代表式民主（代議制）對立，其實成了一個大謊言。在由議會組成的教會裡，也不會有另一條出路。

「我們是人民」這一口號有其魅力，因為在我們剛過去的歲月裡，它得到過很大的成就，就是當老的德國民主共和的那些抗爭運動採用它的那些年代。

的確如此。但在這一個案裡是整個人民予以支持。這一口號足以聚集一個廣大的抗爭性運動，卻不克以積極方式如此指揮一個團體。

#### 4. 神聖權威與弟兄友愛

為什麼教會今天還該用一些權威的方法操作，並按照可說是「集權的」結構來加以組織？很多人設想在教會內採用民主模式也是可能的。他們說，不能在社會裡要民主和人權，而到了自己店舖的門口即刻把這些都放下。不能宣講對近人的愛，而行動上卻用控告和法律制裁，並不斷高舉著禁書目錄。

我們先看看「聖統」這詞字。正確的翻譯大概不是「神聖權威」，而是「神聖來源」。希臘文的 *ieros* 指「神聖」而 *arche*

有兩個意義：「來源」或「權威」。但較可取的意義是「神聖的來源」。是那個來源的力量這樣傳遞下來，而這股原始的力量，因是神聖的，在教會內每一世代到達時永久延續下來，教會不僅靠世世代代的連續而活，也靠那源流本身而活，這源流常一再現實化，並藉聖事來傳遞。所以，我認為首先須來一個重要的視覺轉變：司祭職所進入的範疇不是權威的範疇。司祭職相反，應該是過渡，一個開端的提醒，和置身從事這一服務。在司祭職，主教的尊位及教宗職位上將權威視為本質實在是荒謬和錯誤的。

我們由福音知道，在門徒們之間發生過席位高低的衝突，也知道把當門徒這件事看做權威的記號從第一刻就已存在，並且還繼續存在。因此說這一誘惑存在於每一個世代，也存在於今天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時有主耶穌的行動，他給門徒洗腳，使他們配跟他跟天主同桌吃飯。藉此動作祂說：這就是司祭職。如果你們對此不滿，你們就不是司鐸。或者一如祂對載伯德的母親所說的：先決條件是喝下苦爵，就是說跟基督一起吃苦。至於他們以後坐在左邊或右邊或任何一方，那不重要。這也意謂，做門徒是飲苦爵，是進入主耶穌的命運團體，當洗腳的人，在別人前，跟別人一同受苦。可見聖統的淵源和原意不是建立具有權威的結構，而是維持一個不依賴單獨個人的東西。誰也不能憑他自己的權威赦罪，或傳遞聖神，或把麵包變為基督的身體，或固守其臨在。總之，是從事服務，場所是在教會內，教會不是自我管理的事業，而是不斷參照其源頭來生活。

第二個一般性的批評：「弟兄情誼」一詞的確很美，但不

可忘記它的歧義。按照聖經，第一對弟兄是加音和亞伯爾，一個殺了另一個。這是宗教史裡多次遇到的演出。羅馬的原始神話學有羅慕祿和熱慕，由二兄弟開始了一切，也是二人之一殺了另一人。可見弟兄並不一定是愛和平等的最高典型。就像父權能退化為暴政，我們在歷史裡有消極性的弟兄的足夠例證。可以說，弟兄情誼也該超性化，並走過十字架，才能找到它正確的形式。

現在我們看一些具體的問題。也許此刻教會命令下的太多，管的太多。事實上，教會制度，按其本質，應該保證聖事的慶祝，讓基督來臨，並使天主的話宣告出來。其他一切都隸屬於此。教會不該以發號施令為職責，而該回到對其淵源的服從，並與之重生。身負此職責的人應該留心不要宣揚自己和製造自我，而要做別人的橋樑，自己留在幕後。他首先該是個服從的人，他不致說，「現在我要說這」，而問基督所要說的，並問我們的信仰是什麼，而屈服。最後他該是個僕人，讓人驅使，並踩著基督的足跡，為人洗腳。在聖奧思定身上可以看到這一切，令人贊嘆不置。我前面說過，他每天一直為雞毛蒜皮的事忙碌，可以說一直在給人洗腳，不怕把他偉大的生命浪費在一些家常小事上，但他知道這不是浪費生命。司祭職該像什麼由此可見。把它「好好」活出來並不意謂終於可以佔據權力的窗口，而是要放棄自己的一些生命計劃，並獻身服務。

再度引證聖奧思定的話，上述服務也包括責斥別人，這給自己惹來很多麻煩。在一次證道中奧思定如此加以解釋：你呀，你願生活潦倒，你願奔向喪亡。但是我呢，我可不該有此願望——奧思定如此答覆。我無論怎樣也得指責，即便這為你

不宜。然後他引用一個患瞌睡病的父親為例，說他的兒子一直不斷地在喚醒他，因為這是治癒他的唯一可能性。父親說，你讓我睡吧，我累的要死。兒子卻說，不行，我不能讓你睡。聖奧思定說，這正是主教的職責。我不該讓你們睡著。我知道你們愛睡，但這正是我不該許可的事。在此意義下，教會也該公告禁書目錄而討人厭。但常該使人覺得教會不刁難人，它最大的關注是人的好處。我不讓你睡覺，因為這樣睡致人死命。在執行這一權威時，教會也該擔負起基督的受苦。暫且以純人性觀點來說，那使基督被人信以為真的，是因為祂曾受過苦，這也是使人信教會為真的據點。教會最真實的地方是有許多殉道者和精修聖人的地方，反之，哪裡一切都輕鬆容易，那裡它會失去其真實性。

## 5. 獨身

奇怪的是，令不少人生氣的是獨身問題，雖然它所牽涉的，事實上只是教會人口的極小部份。為什麼司鐸們必須獨身呢？

在源頭處有基督的一句話。那句話說，有些人以天國的名義，並用他們全部的生命為天國作證而放棄婚姻。教會很早就達到這一信念：做司鐸意謂作出這一見證。客觀來說，教會也能參照舊約裡的一個類比。以色列進入福地。十一個支派須各自佔領自己的土地，只有肋未支派，即司祭支派，沒有得到土地；他們的產業唯獨是天主。這等於說，肋未支派的成員須靠敬禮的奉獻生活，而不像其他支派那樣以開掘一塊土地維生。

基本的一點無非是：他們沒有自己的財產。聖詠第一六首說：祢是我的產業和我的杯爵，祢才是我的命運，天主是我的財富。舊約裡的這一圖像：司祭支派沒有土地，而可以說靠天主生活——這樣真實地為天主作證——較晚參照耶穌的那句話，使被解釋為：司鐸的生活之處所是天主。

今天的人如此難懂這一類的放棄，因為我們跟婚姻、跟子女的關係有了徹底的改變。從前無後去世意味白活了一生：我生命的痕跡消失無蹤，我全然死掉了。假使我有子女，我繼續在他們身上活著，這是一種由後代得到的不死不滅。同樣，真正活著的第一個條件是有後代，這樣我在活人的世界中有一席之地。

因此放棄婚姻和家庭必須由此一觀點來懂：我所放棄的以人性來說，不僅是很正常的，也是很重要的。我放棄給這棵生命樹供應我的生命，放棄有我自己的生命土地，而相信我的處所實在是天主——這樣我使天主國的存在為別人成為可信的。我所作的見證不僅是透過言語，還透過這特殊的生活方式，為了耶穌基督，為了福音，就是如此，我把我的生命放在祂手中。

可見獨身同時有基督學和使徒性的意義。不單是節省時間的問題——因為我不是一家之長，有多一點時間隨我處理——這是太原始，太實用的看法。真正的事由在於把整個的生命放在天主這張牌上，而放棄那在原則上唯一能使生活成熟並有未來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這並非信理問題。有一天會重審這問題，開始進行談判，而導致一個選擇的自由：過獨身生活的方

式或否？

對呀，這一定不是信理，而是一種生活習慣，這習慣在教會裡由於採自聖經的種種充分動機很早就已形成。一些新作的研究顯示，獨身制比所認識的一些法律資料所說的還要早很多，可追溯到第二世紀。在東方亦然，獨身的擴張比我們至今所知道的要廣的多。東方諸教會的隱修生活一直是產生司鐸和聖統的溫床。可見在那裡獨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信理，而是在教會裡發展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它當然常帶著失足的危險。當要求如此高時，一定會有失足。我相信，今天人們厭惡獨身，因為看到許多司鐸自己也不接受獨身，他們假善地過這種生活，或過的不好，或完全不過，或在狂風暴雨中過，而說……

……這令人不堪

一個時代越在信仰上貧乏，失足的例子就越多。這樣，獨身失去其可信性，而它真正要說的，就不再明顯了。但必須明瞭，在獨身發生危機的那些時期，婚姻也有危機。今天我們面對的不僅是一些獨身的破壞，婚姻本身，作為我們社會的基礎，也越來越脆弱。在西方國家的一些立法裡，我們看到婚姻的地位日益與其他的生活方式拉平，並且在法庭前的拆散婚約越來越多。總之，過一個真正的婚姻生活困難也真不小。實際說來，把獨身制除掉後我們將得到的是另一種問題：司鐸的離婚，基督新教對這一點知之甚詳。這當然顯示人生存的任何崇高方式本身即載有威脅它的危險。

結論是，我們不該現在就說，我們已支持不下了，而該再度學習信的更多，並更加小心地選擇司鐸候補人。司祭職應是自由地接受，不是說說：好吧，我要當司鐸，我會解決這事如同其他的事一樣，就行了。或是說：我對女生不感多大興趣，我會順利走出來。這不是好的出發點。司鐸候選人應該承認，信仰是他生活的力量。並該知道只有本著信仰他才能承受這一生活方式。那時獨身也能成爲見證，再度給人們說出一點什麼，並給人結婚的勇氣。兩個制度緊密地連在一起。兩個忠貞之一如果不再可能，另一個也不再可能；是一個忠貞馱著另一個忠貞。

當你說在獨身的危機和婚姻的危機之間有一種關係時，那只是一個假設嗎？

這似乎是很明顯的。兩種情形都是生命的抉擇問題，這抉擇涉及我人格的核心：我能由目前，就說二十五歲時吧，能處理整個的生命嗎？人有能力作這樣的事嗎？有可能承擔這一點，並像生物開花成熟——或者我更該問其他許多可能保持開放？說到底問題是這樣的：人有沒有可能決定性地固定他生存的中心地帶？人能否在決定其生活方式時，承受一個決定性的連繫關係？我的答覆有兩點：除非人真實地，堅固地在信仰上扎根，他不能作到；第二：只有如此，他才能達到仁愛的滿全及人性的成熟。一切低於一夫一妻制的，爲人都太少。

如果破壞獨身的數字是正確的，事實上很久以來獨身已不存在。我還要問你：這問題能作爲一個協商的對象，

而這些協商將導致選擇的自由嗎？

選擇無論怎樣該是自由的。在晉秩前甚至該以誓言肯定，是自由願意和行動的。因此當人跑來馬上放話，說獨身是強制的，且是逼到我們身上的，我常感到難受。這和出發時許諾的話是互相矛盾的。在培養司鐸們時，迫切需要提防勿把這話等閒視之。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哪裡信仰活躍，並且按照教會活出信仰的程度，那裡就有這股力量。

我相信放棄獨身的條件，最終改進不了什麼，只是把危機遮蓋起來。當許多司鐸多少過著一種雙重生活時，為教會當然是個悲劇。不幸的是這並非第一次。中世紀末，我們有過類似的情形，那會是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是一個悲劇性的過程，必須加以反省，也是為了那些為此而真正受苦的人。但我相信，而按照最後一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成果也是大多數主教的信念，真正的問題是信仰的危機。在這一點上讓步，我們不會有更多更好的司鐸，而是遮掩這個危機，並用一個虛幻的方法得到一些非光明正大的解決。

我回到我的問題上來：你相信也許有一天司鐸們可以自由決定：過獨身生活或過非獨身生活？

我已經懂得了，但我該清楚地讓人明白，無論怎樣，晉秩前所作的宣誓不容許有強迫的獨身生活者。除非出自完全的自願不能接受任何人為司鐸。這時當然會有另一個問題提出：司祭職和獨身相連到什麼程度？要把二者隔開，不是低估了司祭職嗎？我想不能天真地去找東正教會或基督新教的例子。基督

教對司祭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是一個職責，是一個由團體發出的服務，但不是原意的聖事，不是這一特殊意義的司祭職。在諸東正教會有完滿形式的司祭職，就是修道的司鐸，只有他們可成爲主教。他們以外，有「俗世司鐸」，他們如果願意，可以在晉秩前結婚。他們幾乎不作牧靈工作，而只擔任敬禮的服務員。所以這裡也有一種對司祭職稍微不同的看法。我們卻相反，認爲誰做司鐸，應該像主教做司鐸一樣，那樣把司鐸分類是不存在的。

儘管如此，仍不該把教會的一個生活習慣看成絕對的，無論它扎的根怎樣深，怎樣久。教會一定應該常把這問題提出，在兩次主教代表會議中它剛剛作過。但是我想根據西方教會的整個歷史，並根據負責整體的內在透視，指向二者（司鐸與獨身）分家的方向不會使教會獲得什麼；如果要分的話，它會損失慘重。

因此可以說，你不相信，有一天在天主教會裡將有結婚的司鐸？

不論怎樣，在可見的未來是不會的。坦白地說，我們有一些結婚的司鐸，就是那些由英國或其他基督教會皈依而來到我們中間的司鐸。所以在一些例外的情形是可能的，但究竟是一些例外情形。我想未來也將繼續有一些例外的情形。

只爲了一個理由不是已該取消獨身嗎？那理由是，否則的話，教會將沒有司鐸了。

我不相信這一論證有真實的基礎。司鐸人數增長的問題有

好幾個層面。首先跟孩子的數目有關。今天孩子的數目是每家一個半，跟從前家庭成員明顯眾多的時代有關聖召可能的問題完全不同。今天的家庭又各有很不同的計劃。我們發現對司鐸行業的一些主要障礙每每來自父母。他們對自己的孩子抱著全然不同的希望。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主動參與的基督徒數目縮小了很多，因此可以由之選聖召的族群也變小了。相對於孩子的數目及教會內真正虔信的成員數目來看，司鐸們的接替無疑並未變弱。因此必須注意這一對稱。第一個該問的問題是：有些虔信的人嗎？然後才是第二問題：他們會產生司鐸嗎？

## 6. 避孕

樞機大人，很多人不了解教會有關避孕的態度，你了解他們對此的不了解嗎？

是的，完全可以了解，實在是很複雜的。今日世界困難重重，因了住家條件及許多其他理由孩子不能太多，這是很容易了解的。應少自縛於一些特殊事件的個案處理，而關注教會有的那些大意向。

我相信這裡有三個重要的抉擇。第一個基本的抉擇是對孩子們在人類中的地位採取積極的態度。在此領域有一個奇怪的改變。在一些純樸的社會裡，直至第十九世紀中葉孩子多被視為最大的祝福，今天卻在孩子們身上多少看到一種威脅。會想，未來他們要取替我們，他們危及我們自己的生活空間等。教會的靈感首先是有意回到原始的和真實的觀點，就是孩子，這新人，是一個祝福。教會也認為正是在給予生命中我們自己

接受生命，並認為這種走出自己並接受創造的祝福的方式基本上爲人是有利的。

第二個抉擇今天尤其需要，因爲今天把性與生育分開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抉擇在於不漠視二者之間的基本關係。

這期間，連一九六八這一代的代表們，那些作過此一實驗的人，也作出一些古怪的聲明。比方熱內爾、郎漢思(Rainer Langhans)從前在其團體中尋求「高潮的性」，現在宣稱「性跟它的精神因素分開了，而把人送入了死胡同」。郎漢思抱怨現在「沒有禮物」、「沒有獻身」。他還說「性的高峰是做父母」，他把它稱之為「與天主的計劃合作」。

人們越來越把二者視爲全然分離的兩個事實。我們在赫胥黎(Huxley)的有名科學虛構小說《世界之最》可以找到一個有根有據和十分清晰的景觀：在未來的世界裡性與生育完全分開後的人類慘劇。在那個世界裡嬰兒在實驗室裡規規矩矩地被計劃，被生產。是一幅故意作出的漫畫，但，就像所有的漫畫一樣，它在控訴一件事：竟然嬰兒應該計劃生產，並受理性的控制。這樣，人是在毀滅自己。嬰孩成了產品，人願用之來代表自己，事實上劫奪了孩子們自己的生活目標。男女之間的關係當然也蕩然無存了；我們看得出這種情勢如何演變。

避孕問題是基本的抉擇之一，教會願見到人作選擇。第三個抉擇是，在此領域，不要企圖只憑科技，解決大的道德問題，而應該找道德的方法和生活方式。我想——就是不談避孕

的話——這是威脅我們的巨大危險之一：想用技術掌握人的條件，忘記有些人性固有的問題無法用技術加以解決，而要求一種生活的格調和某些基本的決定。我敢說，在避孕問題上，必須更注意教會在其維護人性的戰鬥中所作的基本抉擇。把人性凸顯出來，這是教會所舉各種質疑的意義所在。也許教會在它所用的格式上不常中肯，但所涉及的是人生存的那些天人之際的大方向。

剩下一個問題想知道，如果有人，比方一對夫妻，已經有好幾個孩子，現在對再有孩子態度並不積極，是否該加以指責？

不，確定的不。這是不該發生的。

這些人是否仍然有一種想法：他們是生活在罪惡中，假使他們……

我得說，這些問題應跟神師，跟司鐸去討論，而不能抽象地思考。

## 7. 墮胎

教宗說，教會將繼續激烈反對一切「鼓勵墮胎、結紮和避孕」的措施。這些措施傷害作為天主肖像的人的尊嚴，也侵蝕社會的基礎。基本上這裡要保護的是生命。另一方面：為何有死刑，按照教理所說的，這是「國家的權利」，不已排除了嗎？

死刑，如果是按正義判定的，是懲罰證實有重罪的犯人，後者代表社會治安的危險；所以是一個罪犯受到懲罰。而在墮胎事件上，死刑打擊一個絕對無罪的人。這是兩件全然不同的事，是不能相比的。

不錯，很多人把未出生的嬰兒視為不義的侵略者，他縮小我的生活空間，強入我的生命，我應該以之為侵犯者予以打擊。但這種視覺我們以前已經說過：嬰兒不再被看做天主的受造物，帶著天主的肖像，有他的生命權，而倏忽間，還沒有出生時，就顯示為敵人，或一個令人討厭的東西，我可以個人加以處理。我想必須讓人意識到，嬰兒一旦受孕就是一個個體。

但假令一位婦女，在良心的極端困惑中決定中止懷孕，能說她犯了相反生命的罪嗎？

在不同的人身上犯罪感的輕重總不能以抽象的方式來裁決。但行為本身——無能情況負責者是誰，也能來自別人的壓力——基本上不外如此：為解決一個矛盾的情況，一個人被殺了。而那個矛盾也從來沒有解決。我們由心理學知道這樣一個行為怎樣一直刻在母親的心靈裡，因為她明明知道有一個生命在她身內，那該是她的孩子，也許是一個人物，她目前可以引以自豪。當然社會應該伸出援手，提供其他安排的方法，阻止對未來媽媽們的壓力，以期喚醒對嬰兒們的新愛。

## 8. 離婚者重婚

對離婚者按民法生活在一起而不被教會承認者所宣告的

絕罰（開除教籍）今天除了一些極忠信的天主教徒外，已不為人所了解。絕罰所造成的後果是，人以之為不公道的，侮辱人的，最後也不合基督精神的。你自己在一九七二年曾體驗到：「婚姻是一件聖事……這不排除，教會也接受這些人，他們承認這道理和這些生活的原則，不過他們是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中，其間他們特別需要一個有主的聖體的美滿團體。」

從法律的觀點看我須澄清這些再婚的人並未受到正式意義的絕罰。絕罰是教會能用的一堆懲罰措施，是歸屬教會的一種限制。這個教會所執行的處罰並不觸及他們。雖然禁領聖體，這一即刻引人注目的記號，涉及他們，但如我說過，他們並沒有按照該詞的法律意義受到絕罰。他們仍然是教會的成員，只是因了他們生活的特殊情況，不能參與共融聖事。至於說這是很重的負擔，正因為我們的世界有越來越多的破碎婚姻，那是毫無疑義的。

我想這一重擔能承擔得了，如果肯想想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沒有權利領聖體。問題所以變得如此戲劇化，是因為領聖體可說是一社會禮節，誰不能參與，就真被刺傷。假使大家了解，有許許多多的人也該說：我幹了一件壞事，我不能就這樣去領聖體，並按照聖保祿所說的，這樣學習「分辨基督的身體」，就會有另一種看法了。這是一個條件。第二點，他們應該覺得自己仍被教會所接受，教會在跟他們一起受苦。

這像是一個熱心的願望……

當然，這應該在一個團體的生活裡才看得出來。因為倒過來看，在承受這一犧牲時（指不領聖體），為教會、為人類作一件事，就是好像在作一個他們婚姻不能拆散的見證。我相信，這也以它的樣子包含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承認受苦和犧牲是積極的東西，我們應該跟它找到一種新關係。最後，我們也該意識到，可以有益地參與彌撒，感恩祭的慶祝，不必每次都領聖體。的確，這常是困難的事，但我想，如果，其他的連帶因素更好地進入程序，上述情況也會變得更易承擔。

不論如何，司鐸說出這些話：「那些被邀來赴主的宴席的人是有福的。」結果是，那些未邀的該自覺是不幸的了。

上述譯文遺憾地把原意弄模糊了。那本來不直接地跟聖體有關，而是採自默示錄，指赴決定性的婚宴的邀請，聖體是其預象。所以，誰暫時不能領聖體，不該因此被排斥於永遠的婚宴之外。那句話似乎是要激發人審察良心，好使人想到有一天要相稱於這永遠的宴會，而目前的聖體共融是指向另一桌宴席。暫時不能領聖體的人因此透過這些話得到警告，同時其他的人也如此，要想想他們該走的路，好能有一天被接納到永遠的婚禮宴席裡。並且也許正因他受了苦，他會受到更好的招待。

這問題還在討論，或者已經決定，並一勞永逸地解決了？

基本上已決定了，不過當然常會有些實際的難處，一些個別的問題。例如，未來能以法律程序發現第一婚姻是無效的。以後這能在本地堂區確立，如果這堂區有足夠的經驗。這一類

的法律發展是可以想像的，它們能減去問題的複雜性。但婚姻不能拆散的原則，放棄一生唯一有效的婚姻，聖事，並締結另一婚姻的人不能領聖體，這原則就其本身，事實上已決定性地維持不變。

常回到這一點來：教會由其傳統中什麼是應該保全的，什麼，在某些情形下，是應該放棄的？這一問題要如何來決定？有一個分成兩欄的清單嗎？右邊的常常有效，左邊的可以更新？

當然沒有，不會這樣簡單。但有些價值在傳統裡有不同的重量。從前，在神學裡慣說確定性的等級，那倒沒有錯哪裡去。很多人說我們應該回到這一傳統。「真理的層次」這幾個字也指向同一方向：要說的是，不是一切都有一樣分量，有些事是基本的，大公會議的那些重大決定，信經裡所說的。這些真理是一條路，而它們作為真理屬於教會的命根，屬於它的內在認同。然後有一些分枝，彼此連繫，一定也屬於整棵樹，但不是同樣的重要。教會的身分有一些很清楚的識別記號，這身分並未僵化，它是一個生活者的身分，它在其發展中繼續忠於它自己。

## 9. 女性的晉秩

另一個問題是女性的晉秩，已「用訓導權的不能錯方式」，宣告了絕對的「不」。一九九五年秋天教宗再度確認這點。他在聲明中說，「我們沒有權利改變這一

點」。這裡又是歷史的論證算數。但如果認真地接受這一點，那永遠不會有一個聖保祿，因為凡是新的東西總該廢除一點從前被視為神聖的東西。保祿終於革新了。問題是：何時可以中止遵守某些規定？還有：以歷史為鑑不能成為一種偶像崇拜，而跟基督徒的自由不協調嗎？

我想這裡必須作幾點澄清。第一，聖保祿所作的是憑基督之名，不是憑他自己。他也很清楚地說明，誰一方面承認舊約的啓示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卻主動地改變一些要點，就作的不對。創新能發生是因為天主把它放在基督身上。保祿作為這一創新的僕人，知道那不是他發明的，而是來自耶穌基督本身的新穎。這一新穎跟它以前的，本身也是相連的；關於這一點，保祿十分嚴格。比方，在他的晚餐敘述中他明確地說：「我傳授給你們的是我由主所接受的」，然後他清晰地解釋，他與主在最後一夜所作的，及與他傳統所接受的連在一起。當他談及復活的宣報時也一樣，他再度說：我把我自己所接受的給你們傳授了，祂也曾顯現給我。我們就是如此施教，而我們都在施教；誰不這樣作，是自遠於基督。保祿很清晰地區分由基督來的創新，及把他連繫於基督的鎖鍊，只有基督授權保祿宣講這一創新。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一切非由主或宗徒傳統所固定的領域內，各種改變不斷地在進行。因此該問的是：這是不是由主耶穌來的？如何辨認出來？關於女性晉秩，我們信理部所給的答覆，也被教宗確認；它不說，在此教宗不錯地宣布了一端道理。教宗勿寧是體驗到，各時各地的主教常宣講了這個道理。並持守

不渝。梵二大會說：當主教們教導一端單一的道理，並很久遵循著行動，就是一樁享有不能舛錯的個案，是一種連繫的表達，這連繫不是主教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教宗的答覆就是以這段大會文字為支柱（教會憲章 25 號）。所以不是教宗所設立的不能舛錯；這裡約束力是建基於延續的傳統。這一源頭的延續性已經是件重要的事，因為這總不是出於自身。那些古宗教確曾有過女司祭，而在諾斯底運動中這事重新產生過。一位意大利學者最近發現，在意大利南部第五第六世紀時有過女司祭的不同組別，但主教們和教宗即刻加以反對。這傳統不是由環境中生出的，而是生自基督信仰的內部。

我還得加上一個我認為非常有趣的資訊。是天主教重要的女性主義者之中的佼佼者，舒士肋·弗冷查(Elizabeth Schussler-Fiorenza)對此問題所作的診斷。她是德國人，頗負盛名的詮釋學家。她曾在敏斯德讀詮釋學，在那裡與一位翡冷翠的意-美男士結婚，目前在美國執教。當初她也激烈地參與為女性晉秩的戰鬥，但目前她說那個目標是錯誤的。跟英國教會的一些女司祭作過體驗導致她不得不承認(Orolination is not a solution)，晉秩不是一個解決，不是我們所要的。她也解釋為何如此。她說：(Orolination is subordination)，晉秩是一種隸屬——它包含列入隊伍而從屬於人，而這正是我們所不要的。對此，她作出一個完全正確的診斷。

進入一個「秩序」常意謂進入一個秩序和服從的關係。舒士肋·弗冷查女士說，我們不願進入一個「秩序」，一個「次秩序」，一個從屬，而要跨越這一現象本身。她說，我們的戰鬥不該是為得到女性晉秩，而是要取消一切晉秩，讓教會成為

一個平起平坐的社會，只須有一個移動性的指導，a shifting leadership。如果想想為女性晉秩而戰的種種內在動機——其實不外乎參與權力，並由從屬中解脫，舒女士看的正確。那麼就得提出在這矛盾下的真實問題：司祭職是什麼？是一件聖事，或者只不過是一個移動性的指導，不容許任何人有長期的「權力」？我相信今後的歲月裡也許會朝此方向進行討論。

我們所談的一切問題，多年來一直不斷在「調配音響」，在民間的迴響則時多時少。你對有些創舉，像在德國所組織的有關宗教主題的公投，有什麼想法？

我們在談及意大利及其他國家的教會情況時已經說了些。我發現默茨對此所說過的在很多點上是客觀的。如果我記的不錯的話，他揭露一個事實，即人只尋求治療一些症狀，而把引起教會危機——他用一個也許不太恰當的詞字稱之為「天主的危機」——放在括弧裡。在這件事上，他把決定性的一點，突顯出來了。當我談到關於信仰所造成的現代一般共識時，我曾如此界定過：天主即使存在，也不算數。人這樣生活下去，那教會就成了一個俱樂部，它該作的只是尋找一些更替的目標和意義。這時沒有天主就無法解釋的一切就困難叢生了，而把基本的一點放進括弧裡。然後默茨教人注意——還是按照我的記憶——關於宗教主題訴諸公投的那些設定大致已在新教各教會實現了。這些教會並不因此而逃過了危機，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又回到這個問題——他的大意是——為何我們要重複基督新教所作過的？我不得不同意這一切。

這裡顯然形成了一種專為西方自由文明的基督宗教，一種俗化了的信仰，對很多事漠不關心。這一文化多次跟基督宗教本質幾乎已毫無關係，——尤指天主教——好似更具吸引力。人們有的一個印象是，至少由神學的觀點看，教會的道理對這種哲學不會有多少質疑，那哲學特別是由 Eugen Drewermann 所代表。

Drewermann 潮流已弱下來了。他只闡述了你剛說過的這一普遍文化的一個異文，以俗化的信仰為靈感。不願閃避宗教，但它必須局限於存在，不得從它那一方面向人提出任何要求。宗教有的那份神秘甘願予以採納，條件是要把信仰的辛苦省掉。這一新宗教的許多形式，其宗教性及哲學今天大部分群集在「新世紀」(New Age)名下。與世界神明原則的神秘結合是各種技術應該引致的目標。人相信這樣可以活出宗教的最高形式，不必由世界的科學形象中走出。為基督宗教信仰，想跟它決鬥似乎不簡單，要作的事無疑很多。但感謝天主，在我們的世紀不缺乏偉大的基督信仰的思想家和人物，過著模範的基督徒生活。基督信仰的現實性在他們身上透露出來，讓人看到這信仰助人培養出完整的人來。在新的幾代中也看到走向果斷的基督徒生活的新出發，雖然這不會成為群眾運動。

我們至今所談的這些「批評主調」顯然那麼容易地由世間消逝。若是這樣，要如何加以對付？可以將之置諸一旁？有由之解脫的一天嗎？

一旦不把教會看做最後目標和爭取權力的地方，這些批評會即刻失去其堅持性；同樣，當獨身生活，以堅強的信仰為支柱，重新活得心悅誠服時；當視基督信仰的目的為永生，而不是整合到一群人之間的門路，可在其間操作權力。我深信這些問題在任何一刻能發生的一次精神演變中會突然失去其堅持性，跟它們出現時一樣的突然。因為，總而言之，它們不是人本質上的真實問題。

## 第三章 在一個新紀元門口

### 兩千年的救恩史——還沒有救贖嗎？

兩千年以來，宣揚著救恩的道理，兩千年以來有一個教會，追隨著耶穌，許給我們新人、平安、正義和對近人的愛。儘管如此，耶穌基督降生二千年後，總結似乎微薄，是從前所未有過的。美國作家 Louis Begley 甚至稱二十世紀是「撒旦的安息所」。他說，二十世紀是謀害和屠殺，破壞和殘暴的地獄，集一切恐怖之大成。二十世紀所謀殺的人比以前任何時代都多。猶太人大屠殺，原子彈的發展都發生於此世紀。當時人相信世界二次大戰後會開創一個昇平的時代。可是一九四五年以後，來了一個戰禍連連的時期，是前所未有的。九十年代歐洲有多起戰事和一些宗教戰爭，全世界饑餓、排外、種族主義、犯罪率、惡的霸權有增無已。的確，在這一千年快完時，也有一些重大的積極改變：在老共產國家官方的極權主義的結束及中歐鐵幕的打開，在某些有危機的地區有交談的希望，近東的和解。不少人想到在此塵世的天主行動和人的行動時，不小的疑慮會湧現心頭：世界真實地被救了嗎？基督來臨後的這些年月真能稱為救恩之年嗎？

你看，觀察點和問題實在不少。其實，基本的問題是這個：基督信仰真帶來了救恩、救贖，或者事實上徒勞無功？這期間基督信仰是否已失去了它的活力？

我想首先應該答覆的是，救恩，那來自天主的救恩，不是量的大小問題，也不能予以加減。在各種技術的知識上，人類的進步偶然也會停頓，但這樣或那樣總是延續的。純量的東西是可以衡量的，能驗證整體是增是減。反之，在人性的改進上不能有量的進步，因為每個人是一個新的存在，而歷史由我們每人開始。

學習作這種區分是很重要的。能這樣說，人之善不是可以用量衡量的。因此不能評估基督信仰由一世紀到另一世紀改善了多少，說它零年開始有如一粒芥菜子，到結束時應長成一棵大樹，全世界都看得到。信仰常能後退和破碎，因為救恩常交付給人的自由，而天主永遠不會奪去這個自由。

啟蒙的世紀曾發展了一個意念：文明的進步幾乎必然地把人類引入真、美、善。結果是，那些野蠻的行動在未來將是不可思議的。

救贖常和自由連在一起，這就使前者也是一個冒險。因此救贖從來不是由外在注定或建立在不可動搖的結構上，而是裝在人的自由這一易碎的器皿中。當人相信人性已到達更高的等級時，那時該考慮到，這一切能再度坍塌，打得粉碎。我能說，這正是耶穌所受的那些誘惑中所遭遇的爭論：救贖應該是一個世間的堅固結構，負責保障一切人的糧食，使得以後無論何處不再有饑荒？或者它完全是另外一個東西？因為救贖與自

由相連，因為它不是強加於人，而是走向人的自由，又因此自由，救贖到某一程度是可被毀的。

我們也該承認基督信仰釋放了很多愛的偉大力量。若看一下事實上因了基督而進入歷史的事，會發現已很可觀。哥德說過，有了祂，才會對那低於我們的人表示尊敬。事實上，多虧基督信仰才規劃了對病人的照顧，對弱勢者的負擔，並創立整個一套愛的組織。也多虧基督信仰對各種情況中的所有的人發展出一種敬意。有趣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在批准基督宗教後，覺得他該作的第一件事是修改法律，讓大家可以慶祝主日，他也關照要給奴隸某些權利。

或者我想到亞大納削的例子，這位第四世紀的亞歷山大里亞大主教，憑自己本身的經驗回憶那些部落，原是持刀相向，直至基督徒引進某種平安措施。但這些事，本身並非因了政治帝國的結構而發生的。它們也能再度崩潰，如同我們今天所見的一樣。

人一旦放棄信仰，無信的慘事便接踵而至。我想，我們真能看出，天主介入歷史，其脆弱遠比我們所要祂有的更大。然而這裡有祂對自由的答覆。假使我們願意並肯定天主尊重我們的自由，那麼我們也該學習尊重並愛慕祂行動的脆弱。

基督宗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擴展到整個世界。但它的傳播不一定帶來世界的救恩。

其實，基督宗教量的傳播是以那些宣認者的「數目」來衡量，這不會自動地引來世界的改善，因為那些自稱基督徒的人不一定是真的。基督信仰對世界的形成是間接的，透過人，透

過他們的自由。這信仰本身不是一個政經新體系的組織，用以消除一切不幸。

**惡的存在與救贖或不救贖的關係有什麼意義？**

惡在前進中對人的自由操作權力，並且即刻創造其各種結構，因為顯然有多種惡的結構。它們沈重地壓在人身上，也能堵住人的自由，並在天主進入世界的路上築起一道牆。天主透過基督征服了惡，並不意味人的自由不再受到誘惑；祂建議牽著我們的手，給我們帶路，但祂不強迫我們。

**這是說天主在此世的權力太少？**

無論怎樣，祂不願意按照我們所想像的樣子操作這權力。這當然也是我自己要「以世俗精神」所提的問題，正如你開頭所擬定的：為何祂顯得如此無能？為何祂以這種奇怪的樣子做王，被釘十字架的，好似失敗者？不過顯然祂就是願意如此做王，這是天主對權力的講法。另一種方式，即用強迫和暴力，顯然這不是天主的作法。

**回到我起初的問題上：此世的現狀，二十世紀的「撒旦安息所」這句話所表達的不該使你有所激動嗎？**

既然我們是基督徒，我們知道世界常在天主手裡。即使人脫離天主，走向自己的喪亡，祂會在世界絕處引發新的開始。但我們相信天主的人，我們盡力使人不要遠離祂，這樣盡我們力所能及，讓世界重新承認是天主所創造，而人也活得像天主的受造物。

但是悲觀的診斷也是可能的。正因天主的「缺席」——默茨用一奇特的字句說「天主的危機」——變得如此嚴重，人才跌入道德的漩渦裡，而我們亦就面臨世界的毀滅，末日的來臨，及一切的終結。這一點我們也該算在裡面。世界末日的診斷不能排除，但連在此時天主仍會保護尋找祂的那些人；總而言之，愛總是比恨更有力。

若望保祿二世覺察到：「在第二千年結束時，教會再度成了殉道者的教會。」你本人，樞機大人，也曾作過類似的結語：「如果我們不找回我們基督徒身分的一部分，在時下的許多挑戰前我們將難以存活。」

我說過，教會該採取一些別的形式。它將不怎麼像大公司，而更是少數人的教會，它將在小的生活圈裡持續下去，其中心服誠信的人會按照他們的信仰處世為人。正如此，一如聖經所說，它將再成爲「地上的鹽」。在這翻轉中，那恒常的原則——人在其擁有的本質上並未被毀——取得更大的重要性，而那些支持者，能將人當人來肩負的力量同時變得更加重要。

爲此種種，教會必須一方面有彈性，以能接受社會中意念和規則的改變，並與以往有過的互賴斷絕關係。另一方面，它更需要忠貞，以保持人之爲人，使人存活並保持其尊嚴的一切。教會必須固守這一切，並把人載向天主，守住他向天主開放；因爲只有從那上方有和平的力量能來到此世。

今天很多人相信，多世紀來，在許多點上，教會的作風與啟示無法協調。這兩千年的歷史，有過一些「有罪的

深淵」，例如以宗教之名排斥異己，成為相反人權諸罪的同謀。教會現在更頻繁地說及它與猶太人的關係及其與女性關係上所犯的錯誤。直至目前這些招認更被視為對權威的減弱。豈不該以還要更大的坦率說說這些在教會本身所犯的歷史過失？

我想真誠常是基本美德，也正是它使我們更好地知道教會是什麼。在此意義下，新的客觀性，如果能這樣說的話，不再掩飾教會歷史所隱匿的陰暗地帶，是真實和說實話的很重要表示。如果認錯，將一些發現並承認公諸於世自己的有罪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部分，因為這樣我才對自己真實而成義，那麼教會的集體位格也不能免除將一些發現和承認公諸於世。教會恭誦「悔罪聖詠」的確必要的，它應坦誠出現於天主和世人面前。

可是我相信我們不要忘記，儘管有這一切缺失和軟弱，天主的聖言一直被宣講著，聖事在施行著，這樣，救恩的力量繼續行動著，也是這些力量擋住了惡的泛濫。這也是天主的力量，當基督宗教好像全變為灰燼，當火種要熄滅時，祂激起一些新的活力起飛。比方第十世紀時，教宗職在其最低潮時，人們相信基督宗教要在羅馬消滅。那正是修道制度再出發的時刻，而產生了一個全新的信仰活力。可見教會內基督信仰的衰退是可能的，有可能它在形式上繼續存在，但已不把它當做事實活出來。另一方面，基督臨在的內在活力也在操作，而在人不期待的地方引起革新。

壓在教會肩上的歷史重擔似乎仍然是可觀的。在紀念哥

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的機會上曾有過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反對基督宗教的傳教工作——以致能令人相信那是昨天才發生的事。

也實在有過一些綜合性的判斷，不是建立在歷史的真理上，而是出自一時的激情。我不是要否定缺失，甚至在那裡所犯過的重大缺失。但正是有關此點，作過新的和密集的歷史研究，得以證明基督信仰及教會也曾扮演過保護者的角色，以反對那些貪財的探險者對當地文化和人民的野蠻踐踏。保祿三世及其後的教宗們堅決地保護土著的權利，並採取了法律措施。西班牙王室，特別是加祿五世也曾頒佈法律，雖然大部份不適用，但為西班牙王室是光彩的事，因為那些法律清楚肯定原住民的權利，明白承認他們是人權的主體。在此西班牙的黃金時代，人權的概念產生在西班牙的神學家和法律學家之中。較晚曾受到另一些人的攻擊，但最初的人權概念是西班牙維多利亞神學們構思出來的。

那些大的傳教運動，方濟會士及道明會士真實地顯示為人權的辯護者。不僅是巴多羅茂 **de Las Casas** 如此，還有很多別的無名氏亦然。最初的方濟會士前去墨西哥福傳，以十三世紀的靈修神學為靈感，傳揚著很簡樸的基督宗教，制度不多，也很直接。這種方式，不管怎樣，不足以引起那樣大的皈依——就是在墨西哥所見到的——，如果那些人沒有感到這個信仰是一股解放的力量。解放也針對先前有的那些宗教信仰而言。墨西哥能被征服，因為那些受壓迫的人民跟西班牙人結了盟，為從這一統治中得到解放。為此，畫面的整體鑒別入微，雖然塗

抹一些缺失。今天在中美和南美大部份印第安人能存留下來，是因了一股能保護並拯救他們的力量，假令這股力量不存在，那一切的發展會是另一個樣子。

如何能解釋，需要好幾個世紀才讓伽利略得到平反？

我能說這裡曾採用讓時效使事件消失的原則。當時無人感到需要來刻意平反。只在啓蒙時代伽利略案才成爲教會與科學衝突的典型例子。這一衝突有其歷史的重量，但開始時並不荷載那麼大的緊張，以致幾乎成了神話。啓蒙運動的人有意把它作成教會對待科學的態度的一個徵候。這樣，伽利略案被勾勒成一個風格，用以象徵教會的陳舊及它對科學的敵意。慢慢地終於想到：這不是屬於過去的一樁單純事件，它繼續在折磨人的心靈，因此必須再一次刻意地予以調整。

我們不能知道世界沒有教會會是什麼樣子。倒過來說不難看出教會的信仰拯救和培養了世界，透過發展人權，藝術與科學，道德教育。沒有此一「授精」歐洲是不會受孕的。猶太政論家方濟·俄本亥美爾寫過：「各種民主是在猶太-基督世界裡誕生的。它們誕生的歷史是我們多元世界的基本先決條件。直至今今天，我們的各種民主得以受到控制、批判及糾正的那些標準也是我們欠給這一歷史的。」你本人也表示過，許多民主的存在多少跟基督信仰的價值有關。

我贊成俄本亥美爾所說的。今天大家知道，民主模式是由

修士的會規及他們的開會時的投票發展出來的。這樣大家有平等的權利概念才找到它的政治形式。不錯，在那以前有過希臘民主給了民主一些決定性的推動，但在諸神的黃昏後又必須予以恢復。眾所周知，美式和英式兩種原始的民主是基於對基督信仰的價值的同意，除非對這些價值有基本的協議，英美民主過去和現在都不能運作，否則二者必鬆開而崩潰。準此，也可由基督信仰引出積極的歷史總結，它讓人對自己有一個新關係和一個新人類。古代的希臘民主建立在諸神的神聖保證上，現代基督信仰民主則建立在信仰所保證的一些價值上，置於大多數的裁決之下。你以前說過的第二十世紀的總結也顯示，若把基督信仰取消，被這信仰驅散的那些惡的古老勢力會立刻闖入。由純歷史的觀點來看，能說沒有宗教的「神聖的」基礎，就沒有民主。

關於教會在世界的使命，紐曼樞機一次說過：「只因我們這些基督徒在這裡，因為有一個團體連絡網擴散在全球各地，世界的衰落才被控制。世界的存在繫於教會的存在。一旦教會病了，世界會呻吟。」

這些話無疑是很有力的，但我寧願說，我們這世紀無神的大獨裁，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顯示，教會的黃昏，作為顯著力量的信仰的衰退和缺席，的確把世界拋入無底的深淵。基督信仰前的異教還有過某種清白，與諸神的連繫也曾製造一些基本的價值，給惡畫下界限；但如果今天對抗惡的各種力量都倒下來，那種崩潰必是極可怕的。

憑著經驗證實的確定性我們可以說，如果基督信仰所代表

的道德勢力忽然由人間奪去，那時人類會像被冰山擊碎的船搖晃不定，它的幸存也會遭到極大的危險。

### 淨化、世紀交替、斷層後的諸多考驗

在這千年之末，時間好像過得更快，能說是一些神秘接合的效果。就像一車沙，在「沙時計」迴轉以前，到最後由出口大量湧出，速度十分驚人。很多人深信我們正在看一個新世界新社會誕生，與迄今有過的一切社會徹底地不同，就像在工業革命後，世界與那以前有過的長期農業時代不同一樣。這是社會學家所稱的分水現象，即在一定點河流轉向——之後在新世代裡僅有幾個少數的重要價值繼續存在。這些時代裡沒有真正的今天，而只置身於已不存在的昨天和尚未到來的明天之間。我們須等待一個根本的變化？

我的確體會歷史的這一快速變化。有些發明一旦完成，其餘一切接踵而至，速度驚人。當我想到最後這三十年世界變到什麼程度，幾乎可以用手摸到歷史的速變及由之而生的種種變化。這個變了的世界已經滲透我們的現在，到一定的程度它已在此。我們發現這一過程正在進行，我們尚不能有整體的有關其方向及出路的遠景。

可以看出各種集體化佔據越來越多的地盤。有歐洲各種聯合，有伊斯蘭世界的重組，及在聯合國打算透過各種會議創造

世界良心的嘗試。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各類個體日益尋求肯定自己，其頑強有增無已。劃一與劃分互相依賴。吊詭的是，在普遍劃一及其不斷擴展的內部，人越來越互相抗爭。將來會出現什麼形式，一時無人能預言。我相信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在一個無止境的變化的世界中，人性的基本因素的恒常不變顯得更加重要。

地球存活的條件明顯地惡化下去。八十年代以來，災難的數目和幅度在全世界繼續增長。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並非大自然，而是人引發了大部分的災難。或是干預大自然的體系，或是人自己的體系失控。很多人在此已見到天主憤怒的記號。可能這裡也產生某種洗滌、淨化。也許老世界應該先消滅，讓新世界成為可能，也許應該在火山上跳舞，最後一次吵鬧的宴會，這一放蕩，這一沸騰來刻畫時間的結束，世界史的這一關鍵世代，好讓我們能作一次新的開始。這就是默示錄的真實使命嗎？

這難說。無論如何，我們該由創造和救贖的力量出發，努力使一個新的開始成為可能的。也應解開那些教人限制自己的力量。因為這是很明顯的事：人不得作他能作的一切——他可以自毀，也可以毀滅世界——，而他應該知道，在知識前有該作的事，有具權利去作的事。人也須承認，在一些物理的不可能之外，還有另一些不可能：即道德所界定的那些不能。教育人類以能抵抗吃禁果的誘惑毫無疑問是第一需求。

教會應該努力把把人提升到可說是他自己的高度，讓他的物理知識配上相稱的道德知識。同時我們知道，這不會只來自道德，更來自與生活的天主的內在連繫。只有祂在時，祂，作為我們存在的力量，道德才能有力地存在——而不是透過什麼特殊的伎倆，那永遠是不足的。

大概已真實地不再可能由外在治療，而只能由內在，就是說救恩所來自的那個良心並不在「我」內。你剛才指出：聖經在提防我們面對生命的不吉祥的轉變時，也許要說的是，我們的精神狀況影響著大自然。

是的，事實上是人對大自然的生命氣息予以威脅，想要奪去，這為我是很清楚的。我們所承受的外在環境的污染是一面鏡子，照出內在污染的過分滿盈，而我們對此不夠注意。我想這也是環保運動所缺乏的。他們出發征討，情理兼有，滿懷熱情地反對環境污染，反之，卻把人的精神污染看做人對自由種種的權利之一。我們願清除可測量的污染卻不注意人內的精神污染，忽視他受造物的身分，好能作出人性的呼吸。我們反以一個完全錯誤的自由概念保護人的任性所作出的各種產品。

只要我們維持著這種自由的諷刺畫，即內在精神破壞的自由，其對外在世界的各種後果就會源源不斷。不僅大自然有其規章及生存形式需要我們尊重，假使我們想靠它並在它內生活的話；人在其內在生活上也是受造物，並按照某一秩序受造，他不能作他所喜歡和要作的一切。為使人活出內心，他必須學習自認是受造物，並記取在他身上也該有受造條件所需的純潔，如果願意的話，就是精神生態。如果生態這一基本因素不

被明瞭，一切都會繼續惡化下去。

致羅馬人書第八章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那裡說，內在受到污染的人——亞當，把受造界當奴隸對待，踐踏它，使它在人腳下，爲了人的原故嘆息。我們今天聽到的受造的嘆息是以往從未聽過的。保祿加上一句說受造界等待天主子女的來臨，而當那些帶著天主之光的人來到時，它將呼吸——只有那時能重新呼吸。

我們顯然應該等待要跟未來發生的新衝擊及由我們一方面的強烈反應，因為我們不能作自我適應，而損害世界將承受的多樣和徹底的奇怪改變。問題是，有了基督信仰給我們的基本認識，能否在今天對這一切新發展，這些挑戰和這些未解釋的事還能找到一些好的答案嗎？

這一基本知識當然應該用在全新的應用領域，而這不能沒有努力，沒有共同戰鬥，沒有學習和忍受，沒有經驗的交換。但基督信仰的一些重要觀點確實指出應循著什麼方向去找解決之道，然後必須按照事實的數據在戰鬥上予以具體化。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基督信仰繼續是一個恒常的課題，而不是一劑有效的藥方，只須服用就夠。這信仰給我一個方向，一個需要的照明，我能藉以看見、行動、辨認，並找到答案。首先，如果我知道人是天主的肖像，認識十誡所代表的原則，我已擁有重要的方針，下一步要看我如何針對新問題予以具體化。這裡就需要很多合作，共同尋找最恰當而毫不走樣的應用方法。

## 為第三千年來臨的「人文新春」

在這世紀之末，一度曾大有希望的許多社會學理都崩潰了。比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心理分析學（佛洛伊德的「宗教是人類的神經症」）；社會學家的倫理及能有超乎制度的道德理念走了同樣的路。此外還有一些改革的主題：兩性關係的全然重鑄，關於反權威教育的現代理念。你自己十年前也曾拋出下面的預測：「新時代已到達了。」你對這新時代及其特徵有什麼概念？你那時要說的是，後現代文化存活了——這文化你曾界定為「遠離人的原始記憶的文化」，這記憶是「天主的記憶」。

我當時如此表達這希望。我要說的是那些疑難和內在矛盾，那些學說的內在謊話，最後會消失，後來大部分也真是如此。我們看到，許多意識形態被剔秘了，馬克思專以經濟解釋世界的嘗試，起初顯得十分邏輯，十分有力，並能發揮很大的魅力——尤其因它與道德倫理相連——，並未捕捉到全部事實，人沒有被描述的完整，卻意識到宗教在人身上是一個原始事實。其餘的一切也一樣：例如，反權威的教育於人不宜，因為權威的需要是人性固有的。這是我當時願意表達的希望，現在也一直蘊育著：透過歷史的多番經驗達到可謂意識形態的自我批評。希望如此興起新的反省，而由那些歷史經驗出發作出的意識形態的自我批評獲得成果的一刻，向基督信仰投下新的

一瞥，讓此信仰能重新被了解，因為在這些事故裡所包含的真理的一切碎片也揭示基督信仰的內在豐饒。

儘管如此——我們已經講過——我們看到失敗，衰退不一定產生積極的出發點。比方在那些老的共產國家，如果經濟和政治情況的不斷惡化未引起共產主義的更新，也未造成一個回歸基督信仰價值的大運動。出現的毋寧是心靈的疲憊、枯燥無味、屈從委順——一個不斷增長的失望。一些從前的意識形態的衰弱不必定引發基督信仰的復興，連一些活的、積極性的衝激也不一定出現。人所看到的開展是我所稱的一些失望的空間，它們能造成另一些衰落，但也是一種開放，讓人們被基督信仰的力量擊中，而跟著發生一些新生。但，如我說過的，這些新生不是按照大自然的需求而產生的。

此刻能觀察出來，給本世紀留下痕跡的世界畫像，純科學的、理性的、物質的畫像已日益枯竭而為別的畫像所取代。第三個千年的人該重新把神話包括在自己的生命裡嗎？那些神話，不久以前尚被控告為隱蔽真理，現在會被邀來給我們打開一個更深的事實，一些新的連結？例如像中世紀，當人生活在充滿記號的世界裡。沒有一物原樣地存在，一切都有一個來自彼世的意義。偉大的歷史哲學家約翰惠金卡曾說：「人生活在許多幻想裡，因為一切是幻想，他才懂得形上學的晦澀。」

到處能觀察到人在重新追尋一些神話，甚至要回到基督信仰以前的古老神話——希望再度找到生活的模式和原始的力

量，但在那一切裡面也有很多浪漫主義。總不能簡簡單單地重登歷史的過程，總不能在你對現在不滿時追回已過去的事。在這種追逐那些前基督的神話中，在這不再求助於基督信仰的事實上——此信仰已顯得太理性，太衰弱——，首先必須看出一種逃避基督信仰的要求的途徑，一種企圖，盡量由各種宗教源泉吸取最多的力量，卻要盡量少付出，盡量少介入。

我無意說這些神話不真正揭開許多隱秘的事，能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些洞見是人類用來窺視真理並找到生命之路。但如果我們自己選擇這些神話，專為適應於我們的用途，它們就不能發揮其力量了。宗教——詞意，*religare* 指連結——不能沒有連繫。若無意接受這連繫，也不屈服於真理，那一切的一切最後無非是一場遊戲。你以前說過玻璃球的遊戲。這個新的追尋冒著達不到根底的危險，那麼所期盼的那些新力量就不會來。那勿寧是一個夢想，不讓人解決那些實質的大問題，抵抗現代世界的大權勢，並把人引歸正路。對宗教的懷念是有的，想重新吸取它的力量，也意識到我們需要宗教，沒有它我們的生命遭受損失。這確實是積極的，但還有太多的個人權威。還很缺乏的是承認真理的謙遜，這謙遜向我有所要求，並不讓我自己選擇。

你能想像人類也許來一次啟蒙的新紀元，容納一些好的自由創舉，同時把破碎戒指的兩頭溶接起來，重新在生活及思想上放進信仰的向度？這樣，安德壕溝（大約指一位奧國英雄對拿破崙的抵抗——譯註）也許可以填滿，而人間的分裂能以結束。這可能是一個新的整體的

遠景，這一整體一定不能放棄天主。

有信仰的人常會希望在黑暗和整體感消失的時期後會有一個新回歸接上來。不過如同我上面說過的，這是一個向前進的回歸。我們不能參照那些古老時期。你也說及一個新的整體風，一個啓蒙的新紀元，它容許人重遇根底，並把它與現代化整合。這一希望，我想，不會在近期實現，因為各種精神力量分歧的潮流還太強，一方面這一對整體的認識確有魅力，另一方面對其缺乏又感無奈。這一切能牽連的獻身所引發的恐懼也還太大。我相信我們首先跨越一段相當長的持續混亂的時期。但基督在這日益分化生命的知識的分裂之後，會使那來自天主的人性整合再成為明顯的，然後把各環節溶接起來。首先須朝此方向嘗試，至於要知道其進行的速度，那是無法說定的。

無論如何，教宗一九九五年於紐約，在其向聯合國作的演講中提及世界新秩序的基礎，他也說到為第三千年的新希望。教宗說：「我們將看到這一世紀的眼淚為人類精神的新的春天準備了土地。」這個「新的春天」指什麼？人的一個新認同？

這是另外一章。事實上，教宗很希望在分的一千年之後，來一個合的千年。按照他的看法，基督信仰的第一個千年是合一的。雖也過一些分裂，東西教會常是合一的。第二個千年是大分裂的千年。現在，正當這個千年結束時，我們可以在共同的反省中，找回一個新的合一。他的整個大公努力座落在這一遠景中，這也屬於歷史哲學範圍。他深深信服，梵二大會以其

對大公的肯定及其為大公主義的呼籲，位於這個哲學-歷史的運動中。

大公主義進入梵二已是走向新的合一的記號。這樣縈回於教宗腦際的希望是，各個千年有其自己的面貌；這個世紀的一切失敗及其眼淚，如他說的，終將會採集起來，變成一個新的開始。人類的合一，各宗教的合一，各基督教派的合一：這是應該嚮往的目標，好使一個更積極的時代真實地重新開始。必須有一些夢想。剛才說的就是一個給人靈感，推動人朝此方向前進的夢想。教宗走遍各地的不倦的熱火其實是來自他懷有的夢想之力。讓一個完全消極的打算來領導我們是凶多吉少的一一不如讓具有積極內含的夢想那樣有用，足以給予行動的方向及實踐那內含的勇氣。至於接下去知道那夢想是否正確，就得整個放在天主手中了。暫時我看不出這離我們怎樣接近。

## 教會發展的一些重點

### 1. 教會、國家和社會

透過教會與國家的分開，第十九世紀曾聲明，信仰是件主觀的事，因此是私事。很多人想，俗化的繼續進程威脅信仰及教會的生存。如果國家管理宗教的時代已成過去，那麼為教會和信仰不也是一個新機運嗎？你說過：「教會與國家分開合乎教會的本質，而其信仰不該由國家強加於人，卻該建立於自由獲得的心悅誠服上。」

教會與國家分開的理念多虧基督信仰才進入世界。在那以前，只有政治憲法與宗教的等同。為一切文化，國家明顯地身負神聖特質，且是神聖世界真正的和至高的守護者。新約中所述的基督前的歷史也是如此。在以色列，政治與宗教二者起初是溶在一起。只當以色列的信仰走出以民而成為一切民族的信仰時，這信仰才脫離其政治認同，而代表一個高於政治區分和差異的因素。這也是基督信仰與羅馬帝國間對立的真正焦點。國家完全容忍各種私人宗教，但有一個條件：它們得承認國家本身的敬禮，天上諸神團結在羅馬的保護之下，而官方宗教像大括號加在所有私人宗教之上。

基督宗教沒有接受這一點，反而取消了國家對神聖世界的專營權，這樣給羅馬帝國，也就是給一般的古世界的基本觀念打了一個問號。講到最後，政教分離是基督宗教引起的一份遺產，也是自由的決定性因素。從此國家本身不是神聖的勢力，而只是一個秩序，這秩序在不朝拜國家而朝拜天主的信仰裡遇到自己的限度，因為天主會對付國家，審判國家。這使人耳目一新。當然，它能按不同社會的不同憲法而採取不同的形式。在此意義下，啓蒙運動以來所導致的發展，開啓了教會與國家分離的模式，有非常積極的一面。消極的一面是隨現代化帶的宗教純為主觀的縮減——這樣又把絕對的特質還給了國家，這一點在黑格爾哲學裡是十分清楚的。

一方面，基督宗教從來無意把自己視為國家宗教，至少起初時是如此，反而與國家畫清界線。它甘心為皇帝祈禱，但不給他們獻祭。另一方面，它常正式認為不是主觀的感覺——浮斯德說「感覺是一切」——而願是傳到輿論核心的真理，這真

理給人一些價值的判準，並在某種程度上使國家和此世的在權者也投入。我想在此意義下，現代化的發展帶來了消極的一面：回到主觀性。但積極的因素則是有一個好機會讓自由的教會存在於自由的國家，如果能這樣說的話，一個更生活化的信仰的可能就在此生根，因為它更深，更自由地紮下根。這信仰一定該自衛以免回入主觀，並繼續設法讓輿論聽到自己的聲音。

伯鐸保祿巴索里尼在教會的分化及其徹底反對的角色中曾看到教會的機會。一九七七年夏他給教宗保祿六世的信中說：「在一個徹底的，也許是烏托邦或指向世界末日的框架裡看，教會該作的事不難知道，以逃避不光彩的結局。在這樣一場戰鬥裡，它可以追溯一個漫長的傳統，直至教宗國與俗世帝國的爭戰——教會可以集合一切不願屈從消費主義新統治的力量。教會可以成為這一抗拒的象徵，而重返它的源頭，重返抗爭與革命。」

這裡面有很多真東西。教會的不踏實特性確實造成它的弱點——它被擠壓到一邊——，但也能是它的力量。人們無疑能感覺到，必須抵制主宰世界的平庸意識形態，而教會正因它反「現代」化，抵制一般輿論，而能是現代化的。教會須扮演先知的角色，並有如此作的勇氣。那是真理的勇氣——即便一開始勿寧是傷害：降低教會的名望，並能說把它擠向少數——這勇氣事實上是它的力量。

但我不願把教會的使命縮減成單純的反抗。教會基本上一直參與積極的建設。教會也會常常尋求採取積極的行動，好使

事情找到它們的真實形狀。因此教會不該退縮到一個普通的對抗態度，卻該很準確地看出在哪些點上它該抵制，哪些點上該幫忙，給以支援，協助負擔，那裡說是，哪裡說不，以維護自己固有的本質。

## 2. 大公主義和統一

你曾說過，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基督徒的合一是一千年来之大夢想。羅馬公教會對此主題已作出開放的建議，在神學的層次上組織過各教派間的交談。在一九九五年公佈的《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裡，有關大公主義問題，教宗希望：「在新的千年的門檻前，……所有基督徒之間的合一能發展成一個完美的團體」。因為「分裂很清楚地相反基督的意願，為世界是一可恥事件……」。這一基督徒的合一可能嗎？因為在我引用的同一道通諭裡也說，要絕對避免「任何形式的縮水或膚淺協議」。

能按照哪些模式達成合一是個大而難的問題。首先該問的是：究竟什麼是可能的？我們能期待什麼？我們不應該期待什麼？其次：真實好的是什麼？我不敢期待在歷史內有基督宗教的絕對統一。我們都看到，今天在許多尋求合一的努力的同時，分裂繼續在發生。不但新派別不斷地在形成，其中有些折衷派別混合異教，已非基督宗教——連教會本身，決裂也在加重，在諸改革教會如此，這裡分更福音化的因素和現代運動

（在德國新教我們見到，有著其兩翼的分岔漂流），在東正教會也如此。這裡，在那些分頭自主的教會間統一常不大，反而也有些分裂的運動，我們也見到同樣的酵素在工作。在天主教本身也有很深的決裂，以致有時真會感覺到，在一個教會內有兩個教會肩併肩地存活著。

在此有兩個同步的運動：一方面分離了的基督宗教趨向彼此接近，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內在決裂同時形成。必須防範一切烏托邦的想望。重要的是我們常反省基本的東西，每個人盡力脫去自己的皮，容我如此說，而靠信仰的助佑抓住事情的核心。如果不再有其他的決裂發生，已很不少了。我們也得了解，雖然我們分離著，在許多點上仍繼續合在一起。我不相信我們能快速達成一些大型的「教派間的重合」。重要得多的是我們以大的尊敬，甚至情愛，互相接受，承認我們是基督徒，並努力在那些重要的事上，在人間作共同的見證，既爲了世界秩序的重整，也爲了答覆有關天主和人的各大問題——人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

### 3. 伊斯蘭

浪漫的東方主義給自己鑄造了一幅東方和伊斯蘭的畫像，與事實並不常吻合。但實在不可能不看出，伊斯蘭，在其自我意識上，與西方的各種社會價值有基本的不同。只消說，個人的地位，或男女平等的意義，在東方跟在西方就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今天，回教極端分子那些暗設炸彈者所造成的恐怖主義，再度使伊斯蘭失去

可信性，而歐洲對那些瘋狂的殺人犯的恐懼也與日俱增。誰也不否認在各文化間有更好的認識和諒解是重要的，但這些認識和了解能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呢？

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我想首先應該知道伊斯蘭不是同質的整體。也沒有單獨的當局，致使與伊斯蘭的交談常是跟該教的某些集團的交談。誰也不能以整個伊斯蘭的名義說話，可以說，他們沒有正統的共同規章。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雖不能說有真正的決裂，但他們是在不同的說法下呈現出來。有一種「高貴的」伊斯蘭以摩洛哥國王為範例，也有極端的，用恐怖手段的伊斯蘭，但不可將它與全體伊斯蘭等同，那將是不符事實的。

重要的一點是如你所指出的，伊斯蘭在整體上是按照完全另一種模式來組織社會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今天在西方討論創立回教神學系的可能性，或把伊斯蘭呈現為一個公開權利的道德位格，這假定所有的宗教都以同一方式結構而成，都進入一個民主系統，有其法律規章，和此法律秩序所保證的自由空間。但這必然與伊斯蘭的本質發生矛盾，伊斯蘭絕對不認可政治領域與宗教領域的分開，像基督宗教一開始就具有的。古蘭經是一部宗教極權的法律，它支配全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並要求生活的一切組織受伊斯蘭的指導。回教法律給社會從頭到尾留下它的烙印。伊斯蘭一定能使用部份的自由，像我們的憲法所給的一樣，但其最後目標不能是說：是，現在我們也是公開權利的一個道德位格，現在我們出席如同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一樣。還沒真實地達到此點，這一直是分歧的一點。

伊斯蘭對生活的各種規則有全然不同的看法，它乾脆地囊括全體，它的法律跟我們的不同。女人很清楚地屬於男人之下，有刑法；生活的所有關係都嚴格地固定下來，而與我們對社會的現代了解對立。必須懂清楚，它不僅是在一個多元團體的自由空間裡所採取的一個宗教宣信。像今天這樣懂它，就是把伊斯蘭按照我們基督信仰的模式予以變化，這不是它真實的面目。準此，與伊斯蘭對話的問題自然比跟基督信仰以內的交談要複雜的多。

可以倒過來問：伊斯蘭的擴展能給基督宗教說點什麼？

這擴展是個有許多面貌的現象。一方面財政觀點有其角色。阿拉伯各國所達到的財力容許它們到處修建大清真寺，保證回教文化機構的成立，及其他類似的事。但這當然只是因素之一。另一因素是重新找到自己力量的認同，有一個新的自我意識。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一直到六十年代，基督宗教國家在工業、文化、政治、軍事諸領域的優勢如此強大，使伊斯蘭被擠到次要層次，而基督宗教——或更好說，那些建立於基督宗教的文明——能自視為世界歷史的勝利勢力。但不久爆發了西方基督世界的道德大危機。面對西方這些道德的深沈矛盾及其內在混亂——與阿拉伯國家的新經濟勢力高漲巧合——伊斯蘭精神再被喚醒，好似在說：我們也有地位，我們的身分比你們的更好，我們的宗教站得住，而你們，你們不再有宗教了。

今天回教世界的感覺是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再能宣講道德訊息，它們給世界的只是一個 know how（技術）；基督宗教

業已讓位，作為宗教來說它已不存在；基督徒不再有道德或信仰；他們有的只是啓蒙運動所啓發的一些現代思想的殘痕；但是我們，我們有一個立得住腳的宗教。

回教徒現在意識到，伊斯蘭終於成了生命力最豐富的宗教，他們有話給世界說，甚至他們是未來的宗教主力。從前回教傳統及其餘一切都多少走出了世界舞台，現在卻興起新的自豪。這樣喚醒了一股新衝勁，要活出伊斯蘭精神的意願。他們的強勢在此：我們有一個道德訊息，由諸先知至今原封未動，我們會告訴世界應該怎樣生活，基督徒卻作不到。對這一股伊斯蘭的內在力量我們自然不得不面對，它在大學氛圍中也發散著魅力。

#### 4. 猶太教

我們來到也許是這席討論中最重要的一點。很久以來大家承認基督宗教與猶太教之間的衝突是在宗教核心處規劃過的。信理部部長曾覺察到：「六角星指點耶路撒冷。它熄滅，又重新升起在天主的話中，在以色列的聖經中。」這要說的是什麼？難道是與猶太教的一個全新關係？

毫無疑問的，我們該重新思考並活出我們與猶太教的關係，這一點也正在著手作。但區別並不因此一筆勾消，甚至在某種方式下我們會感受的更強。不過這區別在生活上應表現在互相尊重和內心接近上，我們是朝此方向走。我要說，多虧舊

約的存在，因舊約是基督宗教聖經的一部份，在基督宗教與猶太教之間常有一種深度的親屬關係。可惜正是這一分共同財產本身成了不和的原因：猶太人好像感覺到，我們偷了他們的聖經——而又沒有把它活出來。他們想，聖經的真正物主是他們。反過來，基督宗教又覺得，猶太人對舊約的讀法是錯誤的，因為除非向基督開放，不能正確地閱讀舊約。猶太人能說是關閉了自己，而失去了通向聖經的內在方向。這樣一來，基督徒擁有舊約推動他們反對猶太人，以致對他們說：你們確實有聖經，但你們沒有恰當地加以運用，你們還該走這另外一步。

另一方面，由第二世紀以來，在基督宗教裡常有一些排斥舊約的運動，或至少縮小其重要性。雖然這從未成為教會的主流立場，對舊約的低估確曾在教會裡廣泛地流傳過。當然，如果只按字義讀那些法律規定或殘酷歷史，會結論說：「這怎麼能是我們的聖經？」，由此也會起反猶太的念頭。近代基督徒放棄了寓意的解釋，他們的先人是用此解釋使舊約「基督化」，這樣與舊約距離再度拉長，他們得再學習閱讀舊約聖經。

我們應該在亞巴郎的歷史裡重新活出我們的共同歸屬，在此同時寫出我們的不同和相同。猶太人讀舊約不把雙目盯住基督，而指向要來的那位「未識者」。因此他們的信仰跟我們的有不同的方向。反過來，我們希望猶太人能了解，雖然我們以另一種眼光讀舊約，我們仍努力分享亞巴郎信仰，這樣我們的內心生活能交流。

為什麼梵蒂岡承認以色列國，需要經過那麼長的時間？

以色列建國是迎合第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的一個決議；當時

承認猶太人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國家，有一塊自己的土地。但是按照世界公法，國界的劃定仍不無問題。如眾所周知，阿拉伯難民大批離開新成立的國家（以色列），而必須分住在不同的國家裡，在一個問題十分嚴重而又很難捉摸的情況中。在那些情勢下梵蒂岡一直等待各方法律關係的釐清。就像它曾等待德國東部先前界線的澄清一樣，直至布郎特的東進政策調整波蘭及德國間的爭論問題的一刻，梵蒂岡也未在那一帶建立新教區。我們知道跟東德梵蒂岡從未有過外交關係。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問題是雪上加霜。好似值得懷疑的是，這座三大宗教的聖城能否成爲宗教特色顯著的單一國家的首都。這裡也須等待澄清。最後，基督徒及基督宗教機構在這新國家的法律地位似乎應有清楚的協議。

這期間，連在教會內，耶穌是猶太人這一肯定已是家喻戶曉的了。那麼不是該說「天主成了猶太人」以代替「天主成了人」的說法嗎？基督信仰最後不是也該承認猶太教的歷史使命嗎？

首先，清楚意識到耶穌曾是個猶太人，確實是重要的。關於這點，我該加點說明，在納粹時代，當我上學時，「德國基督徒」的趨向是把基督作爲雅利安人：以他出自加利利來說，他並不是猶太人。相反，在我們的宗教課裡及主日的講道中，卻堅決地說：那是一個虛構，基督是亞巴郎的兒子，達味的兒子，祂是猶太人，這是許諾的一部份，也是我們信仰的一部份。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這一點上基督徒和猶太人，真正聯合在一起。也是爲了這一點，另一個肯定依然是

重要的：天主成了「人」。有趣的是在新約裡我們有兩個耶穌的族譜。瑪竇福音由亞巴郎開始，說耶穌是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這樣祂是天主給以色列所作許諾的滿全。路加的族譜卻追溯到亞當，而把耶穌呈現為人本身。認定耶穌是一個人，並且祂的生命和死亡涉及所有的人，是絕對重要的。這正是亞巴郎信仰的遺產擴展了許諾的遺產到全體人類身上。原始的那個單純的命題「祂成了人」從前和現在都是重要的。最後，第三點，應加上一句：正因為耶穌是一個忠於法律的猶太人，所以超過猶太教，並願重新解釋全部遺產，把它含括在一個新的更大的忠信裡。衝突點即在此。關於這一主題也有過一些好的交談。我即刻想到一位美國猶太教士雅各諾斯內爾的一本好書，他與山中聖訓作真實的交談。他在書中強硬地指明種種差異，但也以大愛予以領會，最後並強調對生活的天主的共同「說是」。所以我們不該掩飾差異。掩飾一定是錯路，因為路過真理而不見，不會叫人平安。我們應該學習的正是在差異中找到愛和平安。

大屠殺一定不是在教會（有勢）的世紀發生的，而是當教會已明確地對人心失去了其權力的一刻。前前後後必須討論和自問，那場災難怎樣竟然可能發生在基督徒的地區。目前，似乎在不太久之後，天主教徒在歐洲很快將比戰前的猶太人還要少，這些天主教徒當初曾阻止猶太人被殺。

這，正如你正確地指出的，這是重大黑暗的一段往事。重

要的是，大屠殺不是由基督徒，也不是以基督的名義執行的，卻是由那些反基督者，並且以之為消滅基督宗教的先聲而作出的。我本人在童年時活過那時期。那時，不斷說被猶太化的基督宗教，和透過基督宗教使德國人猶太化，特別是天主教會一方面。在慕尼黑，水晶之夜（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夜的猶太人大屠殺）次日，大家湧向總主教府。那時的口令是：「猶太人以後，輪到猶太人的朋友。」據當代資料，如《風暴》雜誌中可以讀出，基督宗教，特別是天主教，被視為猶太人奪權的一種謀略——當時稱之為德國種族的「猶太化」——而為了完全克服猶太主義，必須有朝一日決定性地擺脫直到那時所認識的基督宗教，以達到所謂的希特勒的積極化的基督宗教。

希特勒殲滅猶太人也明知故意地有反基督宗教特性這一事實是重要的，不該緘而不語。但這不改變另一事實，即那些負責的人都是領過洗的。即使 SS（Schutzstaffel 的縮寫，指納粹的黨衛隊，黑衫隊——譯註）是一群無神兇犯的組織，即便在他們中不會有虔信的基督徒，他們終究是領過洗的人。基督徒反猶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準備了地盤，這是不容否認的。那時有一種基督徒反猶主義，在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及其他國家，基於這些根蒂，才結出那些壞果。值得大家不斷反身自問。

為世界的未來，猶太人常是一個中心問題，會如同聖經裡所說的那樣嗎？

我不準確地知道你指的是聖經中哪一段話。無論如何，作為許諾的最初輸送者——且作為產生聖經歷史基本大階段的民族——猶太人依然會在世界歷史的中央。但我相信，一切時

代，特別是今天，在這民族裡總有點特殊的事，而世界史的一些重大決定幾乎常以某種方式跟它有關。

### 5. 來一次新大公會議？

好似很久以來在梵蒂岡以外進行著一個大會。救恩的訊息不受歡迎，各地在重訂信仰的原則。教會需要一個梵蒂岡第三（大公會議）來澄清一切，並指破迷津嗎？

我敢說：不，在最近的未來不會召開。關於此點，我可以說一個小故事。巴基斯坦的 Cordeiro 樞機，當我們一起參與世界主教會議時——當時慕尼黑的 Döpfner 也在場——有一天給我講述，會中一人曾說：好吧，必須來一次梵蒂岡第三。那時 Döpfner 作驚惶狀，舉起雙手說：在我有生之日不要！（Not in my lifetime!）一次大會的經驗為他綽綽有餘了。看來已達成一個信念，那些經驗有必要以長期的時間距離予以隔開。

事實上，一次大會是震撼教會內一切的一樁大事，需要很多時間進入佳境。在把握梵二以前我們尚有很長的時間，而梵三不是完成梵二的好方法。

在正規運作的是世界主教會議。我想這是更恰當，更踏實的工具。會中聚集二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主教，代表的比例相稱於不同的國家，他們必須盡力共同分析目前的局勢。一次大公會議，僅以其體積說，是一件難以把握的事。須顧及到三、四千主教。這類大型會議不容許真的交談和意見的交換。為能作出有用的決議，必須由內部加以準備。一次大會並不是一種機器神(*deus ex machina*)，可作出一些好的決定，然後一切恢復

原樣。它只能捕捉那些已存在的活生生的資料，將之重新組成一些決議。還有極需要的一點是忍耐等待事情的發展，忍耐等待時間和問題獲取生活的形式，然後才能將一切溶為決議和文本的法律形式。

因此我不相信可在一次大會裡見到任何奇跡藥方。相反，大會造成一些危機，不久該變成利於健康的機緣。時下，我們所關注的是把梵二公諸於世。

## 6. 教會的未來——未來的教會

樞機大人，本世紀尚該等待由現任教宗公布其他的聲明，為教會的未來展示遠景和其他的發展嗎？請舉一個例子，也許是有關內部改革的事。如果是的話，你想教會有哪些新措施？

我相信我們還能期待由教宗而來的一系列的訊息。我想他將繼續推動基督徒合一，宗教間交談。自然還有社會和政治倫理的整個問題圈。而在一切之前，中心源泉，福音本身，應該不斷宣講開來，這福音容易變得暗淡無光，如果只著眼於輿論的時興。

此外，在準備全美洲的主教會議及亞洲主教會議，我相信，這包括兩個重點：如果教宗故意地要開全美洲的主教會議，雖然南美北美彼此不同，他所要的是讓這個大洲在其本身內，在其各種區別中，找到互補，找到自我糾正的方法和共同福傳的力量。同時將討論拉丁美洲的文化與貧窮問題，古文化

及文化認同問題，拉美諸文化在北美安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公教性裡相遇的方式及形成一條共同的路。我相信在此我們面對的事非常重要。

為亞洲主教會議，在於知道基督宗教如何能進入亞洲的具體宗教脈絡裡，如何亞洲諸宗教的「大力量能和基督宗教的力量，在第二千年快完時所要求的大努力上聯合起來。我認為這任教宗的下一步會密集地專注於這兩個主教會議。

我們的節目也附帶包括教宗所宣佈的二千年的準備，分為三年：一個基督年，其間基督的品位應突出於第一線；一個神學年，其主題單純地是一般對天主的信仰；和一個聖神年。這一切將跟深度的對洗禮與感恩祭的反省同步進行。然後在第二千年出來，與所有的基督徒團體會晤，也和猶太人及伊斯蘭會晤，就是所有的一神宗教。我相信這個節目——兩大洲的主主教會議，為準備二千年的三年共同節目，其中心是天主，有三個位格的天主，最後與那些信天主者的會晤——，我相信這個節目已具有使世界感受其效果的一些重點。

一九七〇年，在《信仰與未來》上的一篇報告中，你談到一個也會承認其他職務形式的教會，或者教會將讓一些成年的，被考驗過的基督徒晉鐸，他們繼續操其職業。

我當時預見，如果能這樣說的話，教會要變小，有一天將是少數人的教會，以後它不能再在其碩大的空間，廣闊的組織裡生存，卻該以更簡樸的方式組織起來。那時，我想，在這些自幼晉升的司鐸外，能召叫一些被考驗過的人當司鐸而操職業，所以司鐸職務能以多種不同的形式來執行。我相信當時這

一意念的正確處在於，教會應該逐漸適應一個少數的情況，在社會裡佔另一個位置。另一點正確的是眼看慈善性的服務在增加。至於 Vir Probatus（「禁得起考驗的人」來自另一行業）哪裡去找是不同問題。我要說的是，整個古代教會都靠 Vir Probatus 活過來的，因此一般情形它召叫一些從前操過其他行業的人當司鐸——因為那時還沒有準備鐸職的修院——，這些人由第二、第三世紀以來，必須放棄婚姻。將來的鐸職會有哪些形式，這個問題是開著的。但會繼續留下的是司鐸的不可取代的特質，及鐸職與放棄婚姻之間的深度的內在關聯。

跟著世代的交替，會有新文化進入教會嗎？在教會內部會有教會生活的一些新形式嗎？

我想會有。每次大的文化轉折都會在教會內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及信仰的新形式。只須看看藝術的變化：羅馬式的、哥德式的、文藝復興、巴洛克和洛可可，還有十九世紀的教會文化，跟那些青年運動一同興起的修會生活的新方式。梵二後所產生的現象幾乎可稱之為雨後春筍似的「文化革命」，當我們想起那不幸的極端熱忱，把教堂的佈置洗刷一空，並想到神職與修會的面貌改變到什麼程度。今天很多人為這些倉卒行動感到悲痛。但在一個活生生的教會裡一定會產生一些新的表達方式，這一運作正在進行。必須重新，像一直在作的，打一場分開佳禾與野草的仗，按照宗徒所說的：「不要熄滅聖神……要考驗一切。好的，要堅持」（得前五 19,21）。

你相信教宗職會像目前這樣繼續下去嗎？

在其本質上會繼續下去。這是說，必須有一個人當聖伯鐸的繼承人，承當最後的責任，由世界主教團予以支持。個人性原則是基督宗教必然具有的，使它不致失落於一系列的無名氏之中，卻由一位本堂，一位主教代表，而連在整個教會的統一上也得到一個個人的表達。這就是那要繼續存在的，即梵一和梵二所說的信理責任，爲了教會的統一，及其信仰和道德秩序的統一。實踐的種種方式可以改變，如果至今分開的一些教會團體再度與教宗聯合，方式一定會變。此外，目前的教宗——以其走遍全世的旅行——給教宗職全然另一個方向，不是比約十二世所作的。究竟會有哪些具體的變化出現，我不能也不願想像。這一切準確地將會是個什麼樣子，不是我們現在所能預見的。

還能有新的神學發現，足以改變教會，使信仰變得更易了解，或反過來，使信仰變得更難懂呢？

這都是可能的。本世紀我們看到許多神學發現，多虧像 de Lubac, Congar, Danielou, Rahner, Balthasar 等這樣的人。在此，神學界開放了一些全新的遠景，無此，梵二不可能召開。信仰所觸及的向度是如此之深，以致下面常隱藏著新的透視。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未能預見的問題也能突然介入，本世紀我們就體驗過：有歷史批判方法的進軍，各種人文科學進入神學等。我們必須常考慮到這類事件。信仰能變得更困難，也能變得更容易，更可直接予以理解。

許多問題之一能是，由神學一面亦然，人日益堅持地在

問，如何使天主降孕合理化？這事是在單獨耶穌身上完成，而不是像在亞洲那樣，是以一些神明的形式。怎麼可能單獨一人在歷史的進程裡能是絕對的真理？

首先必須說明，在宗教史裡沒有真正的對比，像基督信仰那樣奉納匝肋耶穌為天主。最接近耶穌的是印度教的神 Krishna，被尊為 Vishnu 的 avator（神之下凡），他以不同的異體穿越各宗教的歷史。但這是一個與基督信仰十分不同的概念，此信仰確認唯一的天主與一個確定的，歷史中的人決定性地合而為一，透過此人天主吸引整個人類歸向祂。基督信仰與對唯一天主造物主的猶太信仰緊密相連，是祂跟人一同作出歷史，他把自己與此歷史相連，並在其中無可挽回地為大家做事。可見不必在基督與 Krishna 或其他一個神明間作選擇。選擇只在一個天主——祂不能差錯地將自己顯示為眾生的唯一天主，並與人連繫到有人的肉體的程度——與另一種了解宗教的方式之間，即神明常在不同的圖像和形式下顯現，其中沒有一個是決定性的：在此人所參照的一直都是無名可稱的。在這兩種情形，了解真理、天主、世界、人的樣式都不同。基督徒同時仍能在世界各宗教的許多宗教圖像裡認出一些摸索和嘗試，都指向基督信仰。他也能在這一切背後發現天主的隱密行動，祂透過其他宗教接觸人，將人納入正軌。但祂永遠是一樣的天主，耶穌基督的天主。

一部分給教會提出的問題及它所冒的危險已眉目清晰了。我已說過，人責怪它的基要主義。他們說，教會事

實上反對民主社會，阻礙言論和信仰自由，並為建立天主的國家而操勞。即便不說這一譴責，聖經信仰的本身要旨也已日益受到威脅。死在十字架上、昇天、救贖的訊息基本上都被人懷疑。其實耶穌的門徒只見過一些異象罷了，連山中聖訓也並沒有宣講過。至於說教會應取締自己，以讓位給後基督的宗教情操，這一意念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贊同。

與此抗衡的是教友由信仰得到的力量，即便今天還有為數眾多的信者在教會裡找到讓他們真正做人的路。在本世紀的那些大獨裁統治的歲月中基督信仰多次被宣佈已死了；當時的流言是只有那些不可救藥的，無法糾正的人還會相信。這些統治者失敗後，我們見到那些被公眾鄙視的信者倒是人性的真正見證人，也是他們開拓了重建的路。基督信仰遠比那些要求它自我取締的意識形態更有前途。

## 7. 中道的再發現及新興教會的諸異象

人往往責怪教宗想引起一個專門後退的運動，不顧最後大公會議的成果。現在若望保祿二世拋出一個意念：「為二千年轉折點的最好準備」是「盡可能以最忠信的方式把梵二的道理應用在每一個人和整個教會的生活裡」。

他一直明示自己是梵二的教宗，為他那是一個決定性的經

驗。他到達大會時，還是個年輕的主教。在大會期間，如果我記得的正確，他成了總主教。然後他很有建設性地參與了《喜樂與希望》憲章的起草，討論教會與世界的關係。他對大會的重要經驗無疑是來自此一文本上的合作，而爲了提供他的哲學思想他確有充分的準備。這樣，此一文件，無疑是大會最有活力，也是最具未來性格的一個文件，爲他成了一生的座右銘。他深深信服梵二內出現的天意的重要性，他想聖神在此給了教會新使命。這由禮儀運動到大公運動，中間經過宗教自由，各宗教的交談，與猶太人的交談，與現代世界的相遇。我難以想像另一個像他那樣爲梵二所感動，所戳印，以致將之作爲自己個人生活的方向者。說他願走回大會之前簡直是荒誕不經。教宗對那三年的特殊重要性心悅誠服的程度遠超過一個天主教徒所必須有的，他親自活過那三年，並對其塑造有所貢獻。當然他也越來越感覺對大會的解釋能有不同方式，甚至互相對立。他說出這點，當他聲明必須「忠於」大會，這忠信當然該是有活力的。應該確定我們的道路的不是我們喜歡要大會說的，而是大會真實說過的。

信仰的傳統也有一個新調子、一個新重音的必要嗎？

我想是的；因爲假使至少在歐洲，教友們那樣疲憊不堪，表示確有一個新調子的必要了。我讀過一位東正教司鐸的故事，他說：我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人們還是不聽我，他們打瞌睡，或乾脆不來。無疑，他是不會講話的人。這是一個典型例子，其他的人也有這經驗。重要的是，講道者本人該與聖經，與基督有內在的往來，由這活生生的話出發，再以他所生活過

的，他所擁有的、他不逃避的時代之人的心態內在地消化其信仰。此後，他若真能個人化的，深刻地說出，那時新調子自動地就譜成了。

現在我們見到一些新的衝激，尤其在第三世界，這些衝激，如同你曾說過的，能制衡「歐洲的地區主義」？未來的教會將是非洲的、亞洲的或美洲的，無論如何不那麼歐洲的？

一定是這樣。因為純由統計的觀點來看，其他的大洲比起歐洲來會越來越重要，他們日益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文化。可以跟我關於伊斯蘭所講過的作一小小比照。就像伊斯蘭因了歐美國文化的危機而贏得新的自豪，同樣因此一危機，其他的大文化世界走入其新的自我意識，對自己過去的新自豪：我們有東西提供，是新的和充實思想的。非洲人，一方面強烈地意識到他們還在路上，還該學習，但也有東西給出，他們信仰的清新，他們流露出的愉快值得欣羨，他們知道在他們的文化遺產裡有許多寶貝，有待具體化。這一意識在南美很強烈，在亞洲亦然。因此可以完全確定地說，在教會內文化的眾多將成爲眾目昭彰的，而各大洲的貢獻將會塑造教會的未來。

很久以來，有一個意念已不再使人吃驚了，就是一位非洲的或拉丁美洲的主教會登上教宗的寶座。

不會吃驚的，無論如何，樞機團的每一位樞機可以想像選一位非洲人之可能，或任何一位非歐洲國家的新教宗。至於歐

洲教會如何吞得下，那是另一個問題。因為，不管那許多有關種族平等的宣信和那些對種族歧視的判決，還是存在著某種歐洲身分的意識，在一些關鍵時刻上會暴露出來。但是我想樞機們要問的只不過是：誰最稱職，而在這一點上皮膚的顏色和來源不是決定因素。

也能想像某些信理，甚至聖事將恢復到古老的形式，予以修改，或至少重新表達，因為我們看到教會的邏輯已經變了？

真正成了信仰內容的「信理」事後不能變成假的，就像科學裡一次建立為正確的會繼續有效，但能被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脈絡，而顯示不一樣的意義。這裡也一樣。真的常是真的，但能由別的一些角度予以構思，將它放在新的光線下。七件聖事。毫無疑問地會存留下來，七的數目相稱於人生的邏輯。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將以不同的方式活出來。一百年以前，連很熱心的人一年也不過三、四次辦告解、領聖體，今天日日領聖體是經常的事。懺悔聖事在歷史中有了很多變化。特倫多大會(1545-1563)的聖事神學和有關聖寵的道理（與宗教改革者有關成義的爭論！）沒有變成假的，也不能變成假的，但它繼續發展。在此範圍內，持久性與機動性完全可以協調，像歷史所顯示過的。

在第三千年之始，一個宗教的新理念業已繪出。它包括由一些大文化吸收的內涵和層面，佛教的、無神主義的、原始民族敬禮等許多因素。因著這些世界潮流及其

他許多宗教帶來的衝擊基督教會有一次新的「受精」嗎？

跟其他宗教的交談已在進行中。我想，我們都深信能從像亞洲的神秘經驗學習，大的神秘傳統提供許多相遇的可能，這些相遇在考據神學裡不是那麼清楚。這方面Eckart大師，整個中世紀的女性神秘家，特別是西班牙的大神秘家所留下的遺產，在今天的宗教交談中有實質的重要性。就是說，一方面發現神秘學（消極神學）的共同因素，另一方面在佛教神秘家與基督宗教神秘家之間的那些差異現在或將來也不能置之不顧。現在已看到由那些神話的，亞洲宗教哲學的許多內涵中，一些全新的因素能流入神學思想裡——雖然至今所完成的那些努力為控制這一切，尚不大令人滿意。但許多可能的確呈現在我們眼前，給予神學思想及宗教生活一些新的機會。

為了穩妥地傳遞信仰，並有一個基督信仰的教育，幾乎五百年之久曾經須有一個基督徒環境的支持框架。今天，在學校、媒體社會各種機構中，這一環境已不存在。教會的那些價值跟現代世界的種種表現好像彼此越走越遠。在未來如何還能使教會有關生命和救恩的種種訊息得到大家重視？

你說須有一個基督信仰的環境是很有道理的。我可把它如此表達：一個基督徒總不能單獨地生活，做基督徒意謂跟別人一同走路。即便隱士也屬於一個行路的團體。教會該關心的是建立一些團體。歐美的社會文化對此已不再提供什麼。這把我們引到前面的那些問題裡：教會如何在這日益非基督化的社會

裡活下去？它的確應該形成一些新的團體，同旅途中的伙伴應該合成一個個小組，更堅強地彼此提攜，並憑信仰而生活。

今日社會的普通環境已不再有一般的基督信仰氣氛。因此基督徒應該真實地彼此支持。已有一些其他形式，不同類別的「運動」可供旅途中的伙伴結成小組。教理學習的革新，讓人操練、研究基督信仰是不可少的。為體驗此信仰，比方可以歸屬一些隱修士的團體。總而言之，如果社會在其整體上不再提供基督信仰的環境——在最初四、五個世紀裡社會也未曾提供——，教會自己應該形成一些細胞，在其中把教會生活的大空間在小空間裡體驗和實踐出來，彼此支援，互相擔待，共同前進。

那麼與歐洲大部份地區不再能維持的這個民間教會對立的模式具體地像個什麼東西？這團體應採用什麼形式？能想像在德國建立一些基督徒的基布茲（以色列的農業公社式的組織）嗎？

為什麼不？將來會看出來。今天把一個多少已完成的教會模式投到明天是錯誤，甚至是傲慢的，因為明天的教會比今天更清楚地將是一個少數者的教會。但是我想不少人外在與教會共同生活，也按照他們的樣子內心參與的，多少將依賴教會。不管所能期待的一切變化到什麼程度，我相信，堂區會存留下來，它是共同生活的基本細胞。但將來不能維持目前的全部堂區系統，它一部分是最近才有的。該學習堂區間彼此多多往來，這將是一份財富。像在歷史裡常常發生的，在堂區旁邊將有一些團體，它們透過一個特別的神恩，一位創立者的品格，

將遵循一條專事靈修的路。在堂區與「運動」之間一個更有成果的交往是必要的：運動需要與堂區的連繫，以免變成小支派，堂區需要一些「運動」，以免變得僵硬。新的隱修生活方式已在世界某些地區形成。注意看的話，會發現今天基督徒生活的樣式多得驚人，多虧這些樣式，明天的教會已十分清晰地臨在於我們當中了。

## 8. 「潔、潔、潔」：精神革命

今日教會內有不少官療作風，畏首畏尾、典型的人間計劃。必須再有更多的直觀以對抗理性的霸權？必須補償默觀的缺乏和長期對精神價值的疏忽？巴黎的老樞機 Veuillot 說過：「一切該是清潔的——潔、潔、潔。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真實的精神革命。」我們能說，教會不會再有後代，除非它真是純潔的，真是貞女。

以某種方式，你的問題已經是個答案。我說過很多次，我們有太多的官僚作風。準此，一些簡化勢在必行。不必一切都經過委員會，也須重新製作一些個人的會晤。也不能一切都靠理性來掌控。基督宗教強烈爭取理性，並願向它招呼有其道理，但事實的領悟有些其他的向度，也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剛談過宗教間的交談及神秘主義——這個收斂，這個內在聚斂的向度在一個瘋狂快速的世界裡變得特別需要。拉內有句名言說：「未來的基督徒將是神秘家，或者什麼都不是。」我不敢提出這樣大的要求，因為人常是一樣的。我們將繼續是軟弱

的，我們不會都變成神秘家。但那句話裡有一點是準確的：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把信仰內在化、讓信仰以個人的方式降到每人生命的深處，並一生支撐我，光照我，那麼基督宗教注定會窒息而終。單有行動，單有腦力的建構是不足的。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對單純，對內在化作反省，也反省到領會事實的一些超理性方式。

對神秘主義的這一回想是否也意謂應該記起信仰的單純，遵照基督信仰的一些基本因素？

有時這好像十分複雜，人們相信只有那些飽學之士才能享有一個全景。詮釋學給了我們很多積極因素，但也造成一個印象，就是普通人不能讀聖經，因為聖經中的一切都弄得很複雜。我們得重新學習：聖經有話說給每個人聽，並且聖經正是提供給純樸的人的。在此，我認為解放神學裡的一個運動是有理的，那裡談到「人民的解釋」。依此運動，人民是聖經的真實業主，因此是聖經的真實詮釋者。以原則說，這是正確的，因為聖經就是賜給了單純的人。他們不必知道一切的批判細節，他們能了解聖經的基本訊息。神學挾其偉大而廣博的知識不會變為多餘的，甚至在與世界各文化交談中會更重要，但神學不該把信仰的單純性打發到黑暗的角落裡，因為此信仰把我簡單地放在天主面前，一個自己成了人離我很近的天主。

你能想像在信友大量流失，不再有任何靈性的旨趣把他們與基督宗教連結在一起，此後會有基督宗教的一個新品質集合其信仰的那些內涵嗎？巴黎魯思底克樞機說，

當代文化並不斷定宗教的結束，因此也不必是基督宗教的結束。它反而提出一些草圖使人預感一些發端。魯氏說「人類除非願意活，不會活下去。今天每一刻，人類都被置於最後審判之前。」但要基督徒的自由又不要義務，目前是如此囂張，以致成了專靠我們的能力，就能毀滅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自由。魯樞機加上一句說，今天獨特的境遇是被放在「基督紀元的一些開端」面前。你能贊同這一看法嗎？

我不敢說我們是在基督紀元的一個開端處。基督紀元到底是什麼？我真能贊同這是基督信仰常有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一意念。我曾寫過，基督信仰常常同是芥菜子和大樹，常常同時是聖週五和逾越節。聖週五總不會單純地留在我們後邊，它一直在這裡，而教會總不是一棵已成長完畢的樹，將要乾枯，然後任何一刻會停止存在，教會也常在芥菜子的狀況。我完全同意於這一思想，即我們再度面對一個開端，因此我們可寄以希望。出於自由和爲了自由而全然相信的這一課題，及朝著一個衰竭的世界以信作見證的課題，本身載有新希望，有一些表達基督信仰的新可能。正是在基督宗教量一方面減少的世紀裡，它變得更有意識，而能重新獲得生機。在此程度上，果然能說，我們是面對基督紀元的一個新樣式。我不敢對未來說些預言，聲言這會來的慢或快。但我真同意下面這點：基督宗教常在重新開始的狀況中。這類開端已經存在了，並將繼續發生。它們將產生許多新而有力的基督信仰生活形式。

多年前你曾表達一個願望，繪出像「教會內的五旬節」的東西。你那時說，有成群的青年人公開聲明決定依附教會的全部信仰，即「完美的和分裂的公教性」。必須有一些新的基督徒，更果敢、更自豪嗎？另一次你曾肯定，今天教會不需要新的改革家，而更需要新聖人，來自他們自己，由信仰的內在生命力所推動，這樣他們將再度發現信仰的富饒及其不可轉讓性。

首先可停在「改革家」和「聖人」兩個詞上：每個聖人都是改革家，意指他重新振作教會，也煉淨教會。而「改革家」一詞較多指謂一些意圖改變結構措施的人，也可說他們是在結構的領域活動。是針對這些人我說我們一時不是那麼迫切的需要。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內心住著基督信仰的人，他們把信仰活成一個幸福和一個希望，而這樣成了會愛的人。我們稱他們為聖人。教會的真實改革家一直都是那些聖人，多虧他們教會再度變的單純，並給信仰開了新的門路。我們只須想想聖本篤，他在古代末期創建了的生活方式，讓基督信仰跟著各民族的遷移而擴展。或者想想方濟和道明——在一個封建而超向僵化的教會裡爆發了一個福音運動的全新飛躍，活出福音的貧窮、單純、喜樂，然後開展了一個真實的群眾運動。我們也可記起第十五世紀。特倫多大會固然重要，但它之得以被承認為「公教大改革」，是因為它有大德蘭、十字若望、依納爵羅耀拉、加祿波羅麥及其他許多這樣的聖人。他們內心被信仰打動，各人按照自己的樣子把它活出來，然後他們的榜樣推動了

那些必須的和有救恩性的改革。所以我才說，今天那些改革一定不來自論壇和會議，雖然它們有其存在的理由，有時是必要的。改革將來的那些使人悅服的人物，我們能稱之為聖人。

### 9. 拜賜教會世界的一些新機運

教宗在其為千年轉折而寫的宗座通諭裡曾強調說：「教會……以其枝葉能給整個人類蓋一個頂」。在此意念裡我認為重要的是：既然我們的時代所缺乏的是知識和決心，就需要一些可信的顧問、人物，但更需要的是一些機構，一些更高的當局，它們在混亂的時候能屹立不搖。我們心底願意保存的自由社會向我們要求的太多，並一天比一天多。這社會將其大量的可能丟給我們不管，又強迫我們作出決定，其種種自由每每是無益的或有害的，我們不再能予以控制。為保存開放社會的那些機會，也為保住我們自己不滑落到那些獨裁的體制裡去，一定需要保護民主，途徑是透過一些封閉的次級體制，就是透過一些獨立存在的模式，它們也不管那些當代的意見和選舉的風險作出獨立的判斷。

這樣你提起了教會在社會所該安排的自由上佔有的位置的問題：這位置有何價值，它在哪裡，它為社會能有什麼意義？我相信你在此說出了一件重要的事。教會不是許多組織中的一個，或國家內的一種國家，因而應該準確地像一個國家的樣子

按照同樣的一些民主規則形成。教會是另一類東西，是一股精神力量。它有其社會形式及其組織者的作用，但基本上它是一道力量泉源，供應國家本身所不能有的東西。有句名言已成了格言，是 Böckenförde 所說的：民主社會賴以生存的那些力量不是它本身所能產生的。你在說及一些支撐的體制時就曾指出這一點。

這裡觸及一個我現在不想多談的問題：教會內的民主。如果想教會應該仿效國家，是誤認了教會的本質。因為我們知道，民主本身能說是一個有危險的嘗試，也知道按照多數的原則來決定只能正確地調整一定限度的人事問題，把這原則擴展到有關真理，善惡的那些問題是荒謬的。另一個荒謬是不斷勉強一個少數，其人數也許很大，非服從不可——這樣達到一種寡頭政治，由一小群人統治。因此民主本身需要一些補足它的事實，它們給民主的各種機制一個意義——這些事實的本性，由它們一方面，該符合民主的內部使命。

所以為教會十分重要的是不把自己簡單地看得像一個自我管理的團體，獻身作某些服務。教會應該知道它賴以生活的東西不是它自己作出的，它以忠信、活力把這東西活出來，這樣給人類全體一件人憑自己的決定不能有的東西。教會不能給世界出命，但在慌亂的情況中，教會能有些答案供世界使用。聖經中地上的鹽、世界的光這些圖像暗示教會有一個代表的作用。地上的鹽，不是指全地都是鹽。教會作為教會而言，有一個代表全體的作用，要滲入全體的心，而不只是國家的一個副本，連一個國家也不是。這一切在教會的生活裡都該臨現。它該意識到它的特殊使命：可以說要擺脫世界的特色，進入天主

的光輝，並且把持這出口自由順暢，為使那生的氣息能滲透這世界。

教會作為整合的力量，作為意義的創造者，不是應該加強它的抵抗，針對權力、針對時髦的獨裁，以及針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後者的泛濫成災長久以來已不可估量？它不是也該更加努力充當尋求保衛創造界運動的前哨？那時這一運動的方向可由一個富於傳統和智慧的機構來指導，在它後面還有天主呢。

我們又回到一些同樣的問題：教會到何程度應向新奇開放，並防範僵化而與過去劃一道壕溝？到何程度它該與現代化同步？關於這點人們用先知性的對抗或其他的關鍵詞。這又把我們領到另一問題：誰是教會或教會是什麼？毫無疑義的是，所有以教會名義說話，那些向各階層宣講教會道理的人，都該有這種抵抗的勇氣。

但不該為此而忘記「我們是教會」這句話的真實意義。不僅是那些身負職務的人，不僅是那些傳授道理的人是教會。要使這句話有效地，可信地進入世界而成為行動的源泉，它不該單純地停留在道理上，只顯示在羅馬的文件或一些牧函上，但宣講者的話該是活生教會的共同聲音。因此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這些話不要只是由上而來的一些規定，而是信徒們自己一同學習，他們在很多事上應該是一股抵抗的力量。

訓導權要想說得可信而有效，所說必須在教會內已臨在且是生活化的。反過來亦然：教會的那些活生團體常需要協助，

以穩住它們的身分，並給它們必須有的刺激，來活出它們的所是。當我們說：「教會應該是一個抵抗的力量」，那該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義務，而不只是那些教人道理者的看法。一如我曾說過的，神類的分辨——凡是現代的不一定都是壞的，凡是現代的不一定都是好的——，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德行，無此教會不能正確的說話或提供它的服務。

我還想再次回到我們目前西方的經濟體系。你相信這只認可德幣(DM)的重要性的體系將存活，能像目前這樣存活到今後的十年嗎？

我對世界的經濟局勢沒有足夠的認識。但不能這樣長久繼續下去，是無可置疑的。已經有一個內在的矛盾，即國債問題。這些國家活在一個十足的吊詭裡，因為一方面它們不怕花錢並保證錢的價值，而另一方面，如果債台一直上升的話，它們將破產。當然在北半球與南半球間債務也參差不齊。這一切都顯示我們生活在許多虛構和矛盾的大網裡，而這一進程不能這樣永遠繼續下去。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們剛見過美國的這個奇怪的局勢：國家忽然失去支付的能力，而可以說應該關閉店舖，遣散公務員，這是一個明顯的矛盾，因為國家擔負使整體凝聚的責任。這一事件也顯示我們的體系有許多粗俗的缺陷，為找到糾正的途徑，必須作出實質的努力。但，除非達成甘於放棄的一個共同態度，不會找到糾正的路，因為那些糾正不能單靠政府的法令來完成。這是各種社會的大考驗：不被牽著走。我們該學會想，不是我們所想要的一切都能有，我們也該由我們已達到的

水平降低一點。我們必須找出方法，由目前的財產、權利及要求的自衛中解救出來。這種心的改變，我想，是我們各種體系的真正考驗，但爲了甘心放棄，爲了未來和他人是不可或缺的。

樞機大人，爲這一任教宗職已能作一個歷史總結了嗎？這一時代的結束爲教會，爲世界將有什麼意義？不致於這個教宗過去了，一個紀元也就完了吧？古世界也將與若望保祿二世一同結束，因為他代表西方世界？

我們再度面對未來的一些遠景，對這些主題我常很謹慎。教宗本人來自波蘭已經引發了很強的遠景移動。有了波蘭，西方的界線朝著東方退了很遠。視野打開了，並容許更向前滲透東方諸文化。若望保祿二世以他許多的旅行明確地在教會生活中引進了跨越西方空間的必要。但我也想，不管這一切，西方的遺產會在歷史中保存其重要性。因爲不僅在藝術上——羅馬式、哥德式、文藝復興、巴洛哥等——古教會給了人類將會存留的許多寶貝，那些大聖大賢也發展了一些思想和生活的方式，使基督宗教得以表達的遠大、真實，並讓人進一步完成其人性。人類永遠不能把自己與這些基本的構成部分隔開，它能作並該作的是把這成分整合到一些新的、更寬廣的視野裡。

## 10.真正的世界歷史，時間的滿全

為了二千年的禧年在寫給主教、司鐸及信友的宗座文告《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中，教宗說到「時間的滿全」。

那裡說時間的概念在基督宗教裡有「基本的重要性」。事實上，有了基督的來臨，「時間的末期」即最後時刻已然開始。現在開始「教會的時間」，它一直延伸到「基督的」再度來臨。你如何解釋這一點？這齣戲的收尾早已寫好，而我們終於枯竭了嗎？

在這文告的引論裡有講聖經的一章。「時期的圓滿」這一概念是借用於聖保祿。而「時間之末」，歷史的末期這一思想在聖經裡表達的非常清楚。但路加福音，用一個令人吃驚的廣大目光把這末期擴延了，他說：「耶路撒冷將被外邦人踐踏在足下，直至外邦人的時間過足」（路廿一 24）。

教父們了解這一點，他們把歷史比作人生經過的六個階段。他們說，人類歷史也進入了第六個和最後的生命年齡，這一意識直至現代的來臨都沒有改變。文藝復興時暴發了一個意念，這一次，一切方開始。活到那一個時期的不是第六階段，而是中古世紀，現在我們才在真正的歷史裡前進，我們重新往前走。此外加上那新發現：世界已經過無限遙遠的時間。世界及人的歷史不只有六千年，而是老的不可測量。這樣「時間之末」的概念消失了，而時間本身可以說已伸展到無限。

就是必須在這樣一個文化脈絡裡重思聖經的遠景及教父們的觀點——它是以古老和清楚的六階段圖表為基礎，每一階段略對稱於一千年。至於聖經裡流行的基本概念就是基督之來使歷史進入它決定性及最後的時期，在上述脈絡裡，我們必須以全新的方式了解。我能說，最後這幾十年的發展，由於世界史的加速及壓於其上的日增的威脅已使時間之末的概念更強烈地

進入我們的前景裡。不僅如此。我們重新明瞭，基督運動——它從一開始就力求世界的重新合一，教會與國家的分隔，並在剔除世界原有的神明特性時引進了某種自治——這個基督信仰使歷史開始了一個新而有決定性的階段。這一階段現在懷有一個意識，即末期接近了，不是按照千年的計算，而是想，歷史所走的路是由基督來給它來開創結局，並且想，世界在遠離祂時，正在重新走向祂。

教宗文告所討論的就是這些問題。文告說，基督不但給世界史設立了決定性的里程碑，並且在此歷史旅程的日益戲劇化的許多不確定中，祂不僅是出路，還是目標。我們在轉向祂時，就是走向一個結局。一個不單是毀滅的結局，還是完成，它賦給歷史內部的完整。

在我剛提過的宗座文告裡，教宗還觀察到，按照教會的信仰，第二千年不是無關宏旨的日期，值得關懷的不僅是世紀的、千年的更替，而是一個「恩寵之年」、「上主的」特別一年。這指的是什麼？將有些特殊的現象，會有些特殊的恩寵加諸我們嗎？禧年一定也該有助於社會正義的重建，應該是罪和罰都蒙赦免的一年，與所有仇敵和好的一年，許多歸正及透過或不透過聖事悔改的一年。或者教會在準備作什麼別的事？有句話說的模稜兩可：教會不能「跨越新千年的門檻，而不要求其子女淨化自己，悔恨各種差錯、不忠、輕率、延誤」。

我想有必要弄清楚這日期指什麼，又不指什麼。首先必須

清除一切巫術式的期待。不該企望看到一些宇宙的、文化的、宗教的大事故自動地產生。也該擁有足夠的理性，以了解單獨一個日期本身有其風險的部份。小德尼（公元五〇〇～五四五）在計算基督出生的年月時弄錯了幾年，但他的計算卻成了我們估計時間的基礎。事實上，基督的誕生約在公元前七年。二千年的慶祝因此本該早些。這首先要說的是不該給這數字負載過多的巫術性的故事。

但歷史認可了這數字……

這一年代推算是進入了習俗，我們也與之相安無事了。但它並不來自一個形上學的必然，嚴格說來，也不是一個歷史性的必然。因此，這裡要說的第一點是：不必等待什麼巫術出現。第二個問題是：那麼，這個千年到底是什麼呢？教宗說的有理，它首先是個紀念的日子。這日子指向我們的記憶，是基督誕生的紀念，這一事件如此重要，以致終能使全人類，或至少部分人接受，用以計算時間。首先在於記起所發生的事，不只是過去的，也記起在我們本身內的祂，因為祂確實臨在，跟我們有關。

爲了這點，教宗給人類，或至少給基督教界提供一個協助，作爲革新自己的方法，即刷新自己的記憶。他建議我們上面說過的三年步驟，這該是僅有的一次努力，以回到我們記憶的深層，及藏在我們內的認識和真理。這是第一點，教宗好像給我們指出一條路，好能憶及過去，並把現在和未來的力量聯合起來。

第二點，教宗採用舊約禧年的預象，每四十九年即七個七

年，歷史重新開始。特殊狀況都取消，一切重新開始，連帶普遍赦免，回到原初。教宗說，如果真有過這種意義的禧年的話，那麼第二千年為我們正該是這樣的禧年，用我們能用的方式，並藉此禧年我們努力回到這個稱為基督的原初。舊約的那些圖像也要求我們審核舊債，真實的解放我們，包括這個凍結的經濟體系所代表的重擔等，並嘗試一個新的開始。

這不會由一些宇宙的能力直接掉下來，而是落到我們的記憶的一個課題，給這記憶的一個可能，或由它生出的一個效果。我們必須講理，並守住兩個基本的字詞：紀念和記憶。如果講理，就不該結論說，這一切都不重要，卻認出向我們所作的要求，努力釋放那些支持的力量，好讓這個紀念的努力有其效果，並導致一個新的開始。

教宗在講到這逼近的千年轉折時走的太遠了。他說：淨化你們吧，作補贖吧！當他旅遊到澳洲時，他說也許應該走入曠野，在那裡等待主的再來。

我不知道這一文本，但他一定不是說主將於二千年重臨。因為那跟我們不知道末日之時日的事實相矛盾。能說基督重臨，當記憶重開時，而在此意義下，整個歷史過程中有許多的基督回程，即祂重新臨現於歷史的那些時刻。因此我們不必答覆這一問題：何時歷史會與祂決定性地重聚，何時祂決定性地掌握歷史，並使之動盪，我們不必用任何時間的計算來確定這一切。但我們所需要，所該準備、願準備的是，讓祂能重新進入這個時間，而這時間應該不斷由內部開放。我相信，必須在此意義下懂教宗的話，就像那句「走入曠野」也是一樣。不過

在整體上，這句話所指的是，在這個時代我們真該走出這個傢俱超載的世界，到處是傢俱，為進入這內在的自由，這警醒和悔改，無這種種不能有新的開始。

社會學家、未來的探索者、文化的評論者，都狂熱地尋找對我們所面對的這個時代的一個解釋和可了解的版本。我們有現代、後現代，甚至已有後後現代，以致好像不易再加上一個「後」字了。也許是思鄉病將裁決應該來個什麼，也許這思鄉病將找到一個新的概念來界定這個時代。應該給它一個什麼名字？你有建議嗎？

我沒有名字好建議。我一直拒絕談現代的結束，談後現代，這都是些過早的區分。為看清如何分割各時期，必須有某一種距離。不錯，文藝復興鑄造了「中世紀」的概念，以說出過去那些年裡產生了一些東西現在已壽終正寢了。文藝復興如此命名中世紀，是要把自己繪成一個新時期，也有部份道理。現在，因歷史的速度加快，會產生一個斷層，由之出現與過去四、五百年的近代不一樣的東西，那是不難看出的。但是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各期的劃分，這些時期依其現有的樣子，基本上也是西方性質的。因為不大容易把印度歷史或中國歷史納入這一估計中，雖然有些可比照的。雅士培曾暗示過可稱之為門檻的時間，這時間穿越一切文化。無論如何，我想我們不該現在就給我們所不認識的東西取名。反之我們該保持警覺，面對斷層，並盡力在它發生時準備好各種因素以指導我們的方向——好使這個由過去新、現在已老的時代突出的新時代是屬

於人的時間和天主的時間。

最後一個問題：樞機大人，世界的真正歷史是什麼？還有：天主真向我們要的是什麼？你曾寫過：「歷史的特徵顯示在愛與不會愛的交鋒上，這一心靈的『沙漠化』在於除了能夠量化的價值外，人不能認可任何價值和事實……愛的能力的這種破壞生出一個致命的煩惱，這是人們的中毒。如果這一趨向得勢，人及世界將同歸於盡」。

這一點上我以聖奧思定為據，他自己也是參照基督信仰的傳統，把整個歷史說成兩個國家，兩個團體之間的論戰。哥德重拾此點，而說歷史無非是信與不信之間的戰鬥。聖奧思定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說是兩種愛之間的戰鬥：愛天主至於放棄自己，和愛自己至於否認天主。所以他把歷史描繪得像兩愛之間的戰爭劇。我曾嘗試把這思想略加澄清，而說反彈運動本來不該稱為另一種愛，它絕不配有愛的稱呼，因為它是拒絕愛。我們今天看得到，一個人，受其獨立意願的驅使會說：我不要愛，因為那使我不獨立，那妨礙我的自由。

愛，就是依賴一件東西，這東西能由我身邊撤退，愛因此在我生命裡引來受苦的危險。由此引起拒絕，說出或不說出：我寧願，在不斷冒這個險之前，在我的自我確定的官能被限制之前，在依賴一個不在我安排之下的東西，甚至倏忽間也許把我拋入空無之前，我寧願沒有愛。然而由基督來的抉擇，完全是另一種：對愛說是，因為只有愛，正因為它是受苦的冒險，

和失去自己的冒險，才把人交還給他自己，並使他成為他所該是的。

我想歷史的獨特戲劇的真實面在此：迎向它的許多鋒面終於可以縮減到這個格式裡：向愛說是或說否。

天主真向我們要的又是什麼呢？

要我們成為會愛的存有，那時我們將是祂的肖像。因為正如聖若望給我們說的，祂是愛，祂也願有些受造物相似祂，這樣由他們自己愛的自由出發，他們變的像祂，並從屬於祂的本性，而把由祂射出的光散播開來。

# 聖賢傳記

20702	懺悔錄	聖奧斯定著，應楓譯
20731	回憶錄	里修小德蘭著，張秀亞譯
20733	小德蘭神修精華	陳百希著
20760	一朵奇葩	光啟編輯部編譯
20763	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	侯景文、譚壁輝合譯
20766-1	聖女小德蘭書簡（上）	劉鴻蔭譯
20766-2	聖女小德蘭書簡（下）	劉鴻蔭譯
20768-1	百聖傳略（上）	于士錚編著
20768-2	百聖傳略（下）	于士錚編著
20769	我都選取	M. D. Molinie 著，鄭開棻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地上的鹽/拉辛格樞機 (Cardinal Ratzinger) 口述；房志榮譯--- 初版--- 臺北市：光啓文化，1998〔民 87〕

面；公分

譯自：Le sel de la terre

ISBN 957-546-354-4 (平裝)

1. 天主教-----論文、講詞

246.207

87014831

## 地上的鹽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初版三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拉辛格樞機 (Cardinal Ratzinger)

譯者：房志榮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02)2367-3627

定價：260 元

光啓書號 20864

ISBN 957-546-354-4

那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話是這麼說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對於天主教會而言，從來沒有一個時代比此時更充滿活力，各種青年聚會、和其他宗教的對話、交流，甚至是基督宗教彼此間的和好，都為教會注入新的生命。但也沒有一個時代比此時更充滿挑戰，許多敏感的社會議題，諸如同性戀、墮胎、離婚、女性神職人員……等等，對天主教會來說都是一大衝擊。從前，只要一在教堂裡坐下，積累數世紀的熱心話語馬上灌耳而入。現在可不同了，斬釘截鐵的意見已在動搖，一切傳統都像垂暮老人，毫無生機。有人認為宗教應遷就人的需要，另一些人則想，基督宗教已經過時了，已與我們的時代不合。更多人不斷地問：天主真的存在嗎？如果真有天主的話，我們還需要教會嗎？教會應該像個什麼樣子——如何能再度發現它的面貌？

甫當選為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拉辛格樞機一向被視為教會的戰士及爭議性人物。無論如何，他在早期的許多分析和評估到了日後果然成真，多次連細節也絲毫不差。這位出身巴伐利亞鄉村，家世簡樸，聰明絕頂的人，對於教會在這個時代所蒙受的損失及發生在她身上的悲劇，其痛心疾首的程度，只有少數基督徒能與之比擬。

本書是記者Peter Seewald於一九九七年訪問拉辛格樞機的記錄，內容十分廣泛而深刻，對於想要了解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人們來說，本書會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ISBN 957-546-354-4 \$260



9 789575 463540 0 0260

光啓書號 20864

定價 260元